**[日本老兵忏悔录](http://book.yancloud.red/Index/info/id/418)**

[**原 书 前 言**](http://book.yancloud.red/Index/article/bookchapterid/14710.html)

[**第一部 日本战犯“回娘家”**](http://book.yancloud.red/Index/article/bookchapterid/14711.html)

[**序章——世界史上的罕见奇迹**](http://book.yancloud.red/Index/article/bookchapterid/14712.html)

[**第一章 抚顺是我第二故乡(铃木良雄)**](http://book.yancloud.red/Index/article/bookchapterid/14713.html)

[**第二章 继承抚顺精神（渡部信一）**](http://book.yancloud.red/Index/article/bookchapterid/14714.html)

[**第二部　时代在捉弄我们**](http://book.yancloud.red/Index/article/bookchapterid/14715.html)

[**第一章　我没能抗拒侵略洪流（绘鸠毅）**](http://book.yancloud.red/Index/article/bookchapterid/14716.html)

[**第二章 　我也曾参与刺杀活靶子靶子（堀口久七）**](http://book.yancloud.red/Index/article/bookchapterid/14717.html)

[**第三章　以“试胆”为名（三神高）**](http://book.yancloud.red/Index/article/bookchapterid/14718.html)

[**第四章　同属遭受虐待之人（沟吕木清）**](http://book.yancloud.red/Index/article/bookchapterid/14719.html)

[**第三部　为了发迹？为了天皇？还是为了宣泄私愤？**](http://book.yancloud.red/Index/article/bookchapterid/14720.html)

[**第一章　南京大屠杀及三光政策——不可饶恕的罪行（永富浩喜）**](http://book.yancloud.red/Index/article/bookchapterid/14721.html)

[**第二章　我为什么那么狠毒？（久保田哲二）**](http://book.yancloud.red/Index/article/bookchapterid/14722.html)

[**第三章　强奸就像家常便饭（金子安次）**](http://book.yancloud.red/Index/article/bookchapterid/14723.html)

[**第四章　坦白强奸事实（小林武司）**](http://book.yancloud.red/Index/article/bookchapterid/14724.html)

[**第四部　宪兵、军医及731部队**](http://book.yancloud.red/Index/article/bookchapterid/14725.html)

[**第一章　最后的认罪（三尾丰）**](http://book.yancloud.red/Index/article/bookchapterid/14726.html)

[**第二章　难忘731部队的疯狂（筱塚良雄）**](http://book.yancloud.red/Index/article/bookchapterid/14727.html)

[**第三章　活体解剖　悔恨无穷（汤浅谦）**](http://book.yancloud.red/Index/article/bookchapterid/14728.html)

[**第四章　日本宪兵在亚州的滔天罪行（西谷稔）**](http://book.yancloud.red/Index/article/bookchapterid/14729.html)

[**第五部 军官的自豪感**](http://book.yancloud.red/Index/article/bookchapterid/14730.html)

[**第一章 军官的自豪感，杀害牟高轩烈士（鹿田正夫）**](http://book.yancloud.red/Index/article/bookchapterid/14731.html)

[**第二章 战争，就无法远离暴行吗？（曾田吉一）**](http://book.yancloud.red/Index/article/bookchapterid/14732.html)

[**第三章 “一门心思想当军官……”（山本成美）**](http://book.yancloud.red/Index/article/bookchapterid/14733.html)

[**第四章 难忘老婆婆愤怒的目光（金井贞直）**](http://book.yancloud.red/Index/article/bookchapterid/14734.html)

[**第六部 他们为何会犯下如此滔天罪行？**](http://book.yancloud.red/Index/article/bookchapterid/14735.html)

[**原 书 后 记**](http://book.yancloud.red/Index/article/bookchapterid/14736.html)

**原书前言**

笔者自1998年开始对“中国归还者联络会” （详见第一部）成员进行采访，并将采访内容分别撰成报告文学，陆续发表在《星期五周刊》杂志上。本书即以此为基础，加上随后采访的多位成员的经历编辑而成。

二战后的日本，主要把精力放在调查自身在战争中的受害事实上，与此相反，对于亲手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亚洲其他国家带来的深重灾难这一加害事实，并未展开深入调查。大多日本人就是在这种几乎没有总结、反省加害事实的状况下，与战后日本社会一起成长，经历了经济高度增长时期，以至今日。我认为，当今日本社会的种种难解矛盾，其症结就在于此。虽然日本的经济、科技取得了很大进展，然而日本人的精神领域在本质上并没有多大进步。正因为笔者对于日本的现实社会抱有危机感，为了给今后日本的前进方向提供借鉴，现将“日本老兵曾在中国的所作所为”的片断公布于众。同时我也希望搞清楚：当年为何那么多的日本青年竟然犯下如此众多的滔天罪行，此后他们又是通过何种方式来进行深刻悔罪的。

从历史事实中学习。笔者认为，对于当今的日本来说，这才是当务之急！历史事实不会以个人、国家的好恶或处心积虑的算计而改变。有些日本人的思维逻辑如下：“那个国家真讨厌，提起来就作呕！”由此“不愿意承认日本曾经侵略过别国的历史事实，承认就会带来不利！”甚至扬言：“根本没有侵略的事实，没干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如此非科学的观点，很可能会给未来的日本带来深重灾难。

当然我们应该摒弃上述思维，眼下对于我们最迫切需要的观点是：认清“历史事实”，在此基础上“站在人类的立场上进行考察验证”，最终“为现在和将来做出贡献”。

中国人常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虽然正视事实，有时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痛苦，然而事实是无法回避的。笔者谨以此书揭示出当年的“历史事实”真相，倘若能对各位读者有所帮助，笔者将不胜荣幸！

附记：文中所出现的人名敬称从略，所刊照片除署明“本人提供”外，均为笔者所摄。

**第一部 日本战犯“回娘家”**

2000年9月17日，在中国辽宁省原抚顺战犯管理所的一间屋子里，第二任老所长金源 正在讲话：

到这里工作初期我很想不通，为什么我们还要帮助、照料这些日本战犯呢？好几个部下都曾对我说：“真不愿意为这些日本兵工作，让我走吧！”一位名叫王兴的看守人员家里有七口人被日本兵杀害，见到所内这些日本兵的反抗态度，气得跑回宿舍，用拳头锤打自己，失声痛哭。

金源周围坐着20个80岁左右的日本原“战犯” ，正在低着头凝神聆听。在座者还有当年曾经悉心照料过这些日本老兵的看守人员和护士。

**序章——世界史上的罕见奇迹**

1950年7月21日清晨，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了自前苏联移交过来的原日本陆军官兵、宪兵，原伪满洲国官吏、警察等969人 。其中包括陆军第59师团 官兵约400人，第39师团约250人，他们占据着很大比例 。这些师团在日本战败前夜，由“支那派遣军” 编入“关东军” 属下，因此，大多是在朝鲜北部或伪满洲国境内为苏军所俘虏。而原“支那派遣军”的大部分官兵，早已于1946年6月之前被遣返回日本。

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的战犯之中，包括第39师团师团长佐佐真之助、第59师团师团长藤田茂、第117师团师团长铃木启久、以及曾任伪满洲国总务厅长官的武部六藏、总务厅次长的古海忠之等大牌人物。自那以后，管理所除因朝鲜战争爆发迁至外地避难一时外，直至1956年夏（服刑最长者至1964年3月），他们均在抚顺接受“找回自己的本来人性”的学习教育。此外，管理所在关押了日本战犯半月后，又关押了以“满洲国皇帝”——溥仪为首的伪满洲国高官60余人。

1945年日本败战后，中国国内国共两党对立，内战不断，终于以1949年10月1日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告终。此时，美苏两国已尖锐对立，东西方冷战态势日趋明朗。1952年2月，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斯大林通过苏外交部长，向正在访苏的中国国家主席毛泽东提议：“向中国移交约1000名在苏境内的日本俘虏” 。对于刚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而言，这项措施实属提高自身国际地位的一张通行证。1950年7月，从依旧关押在苏联境内的为数不多的俘虏中选出约970人（挑选标准不祥）移交给了中国。

周恩来总理是执行这项“战犯政策”的总指挥，他告诫全体所员：严禁打骂这批战犯，要求以人道主义精神对待。

1952年春，管理所收到周总理发出的一系列指示：“应对战犯实施恰如其分的悔罪教育”。依照这些指示，管理所开始对所内战犯有计划地进行教育 。曾经被“以天皇为中心的日本军国主义”彻底洗脑、犯下无数滔天罪行的战犯们在接触到管理人员的人道主义照料中，逐渐找回了自己本来的人性。这些战犯在不断学习、反复讨论的过程中，渐渐认识到自己以前所作所为的错误，痛苦而认真地面对往日自己犯下的累累罪行，将其事实公开（坦白），并进一步深入追究其根源和原因（认罪）。此时他们又被告诫“针就是针，棒就是棒”，严禁夸大或缩小自己的罪行。

1954年3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派来了约700人的“东北工作团”，参加对所内战犯的调查和讯问工作。其后，抚顺战犯管理所和东北工作团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提交了关于对罪行特别严重的70人处以极刑的报告。1955年末，管理所与东北工作团的代表为此赴京请示周恩来总理，周总理指示：“对于这些日本战犯的处理，不判处一个死刑，也不判一个无期徒刑，判有期徒刑的也要极少数” 。代表们回到管理所，将总理指示传达给全体人员。当时，许多人很难接受这样的处理方针，因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有亲人或亲戚被日军杀害的经历。据说当周总理得知这些情况后说：“下级接受不了，主要是因为你们这些上级还没接受。再过20年，你们就会明白这项决定是正确的”。就这样，周总理的这项方针坚持了下来 。

另一方面，山西省的太原战犯管理所也于1952年12月对140名战犯开展了同样的认罪学习坦白运动。这些战犯大多是日本战败后留在山西的，他们曾帮助国民党的一个派系——胡宗南部队对抗共产党军队。

对于抚顺、太原两方面的日本战犯，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于1956年6月至7月间，同时在沈阳、太原两地开庭审判。但是，被起诉者只有45人，他们的刑期分别在8年至20年不等（含在前苏联和中国的拘留期），真是一种罕见的宽大处理。其余千余人自6月至8月，分三次宣布免于起诉、当庭释放，准许他们返回日本。

的确，中国对日本战犯如此宽大处理，很大层面上系出于“政治上的考虑”。然而中国共产党自抗日战争以前便一直坚持优待俘虏政策，这样做既是上述政策的延伸，也是革命人道主义的表现 。

综上所述，在抚顺和太原的战犯管理所进行的改造教育，是以极大耐心“对被军国主义、天皇制思想彻底洗脑的日本军人实施再教育，重新唤醒其真正人性”的伟大实践，同时亦可谓世界史上罕见的、体现了“解放全人类”理想的壮举。

与此成为鲜明对照的是：日本战败后，以美国为首的战胜国（联合国）在亚州各国进行的法庭审判中，被处决的BC级（乙级和丙级）战犯多达930余人。

经抚顺和太原管理所的学习改造，并能真正面对自己罪行的旧日本军人，回国后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简称“中归联”），公开讲述自己的罪行，宣传“反对侵略战争”、“促进日中友好”。现在这些人中，半数以上已经过世，健在者也都超过75岁。值此参加“纪念抚顺战犯管理所开设50周年”之际，他们中的20人重返故地——这所曾令他们“彻底告别军国主义思想”的地方。

铃木良雄（现住埼玉县，80岁）一直在认真地聆听老所长金源的讲话。座谈会刚一结束，他便立刻跑到曾经照顾过他的老班长徐泽身边，紧紧握住他的手，低着头说：“当时多蒙关照，谢谢您，真是感激不尽！”开始时还面带笑容，渐渐地已经泪流满面。随后他又跑到当年生病时，曾经忘我地为他诊治、护理过的温久达医生和赵毓英、关慧贤两位护士面前，紧紧握手祝贺重逢。他痛苦地紧闭双眼，边点头边说：“按我的罪行，本来是不该受到那样亲切照顾的。真是不知该怎样感谢你们才好！”

**第一章 抚顺是我第二故乡(铃木良雄)**

一、走出贫困

1920年7月，铃木生于现在的埼玉县行田市真名板。兄弟姐妹六人，除了大他19岁的哥哥和他存活下来以外，其他四人均因家境贫寒，生后不久就夭折。他家在村中最为贫困，是只租用5反 田的佃农，劳作一年也所剩无几。父亲终日为卖鱼四处奔波，母亲每天织布到深夜，即使如此，家中生活也仅能糊口。铃木回首当年说：“我从小就下定决心，长大以后一定要为家里争口气！”

哥哥说：“总该设法摆脱这种贫困局面”，在铃木上小学四年级时开始经营碾米房，铃木也边上小学边帮助干活。因为学习成绩好，高小毕业前夕，校长曾劝铃木升入中学。他向哥哥提出希望读中学，但哥哥说：“很快就要爆发战争，我又要应征入伍，到那时家里的活谁来干？”没有同意他继续升学。铃木说：“当时我真想多念些书，毕业后当名教师”。

1935年，铃木14岁时高小毕业。此时，他只好帮助家里干活。哥哥在日本国内第二次应征入伍，在晋升为伍长 后曾任青年学校的军事教练指导员，受到众人尊敬。铃木一边在家干活，一边每月去两次青年学校接受训练，向哥哥学习枪术和剑术。看着哥哥神气活现的身姿，铃木坚定了“在军队中出人头地，一定要当一名军官”的决心。1937年7月日中战争爆发，哥哥再次被征召入伍。此时铃木已经成了碾米房的顶梁柱。

二、背叛母亲教诲

铃木20岁时，征兵体检合格。于1940年12月经山东省济南，编入枣庄独立混成第10旅团独立步兵第43大队 。铃木立即申请当名下士官。“在部队好好干，十年后一定要当上军官。即使是高小毕业，只要努力，也能爬上去。”铃木回首当年自己的想法。

四个月的新兵入伍训练，铃木在中队里排名第一，现在要过最后一关——刺杀中国活靶子。20多名新兵分为两个班，分给铃木一班的是农民装束的三个中国男人，他们全被蒙上眼睛，双手反绑，被捆在木桩上。班长高喊：“铃木二等兵，给大家做好示范！”铃木心想：这可是在上司面前露脸的绝好机会，于是向那个农民模样的年轻男人冲了过去，猛刺他的心脏。

铃木回首当年如是说：“当时我真的是豁出去了。要想在军队有出息，必须排名靠前。那时，我一门心思想完成好任务，其他的都顾不上了。因为部队一贯给士兵灌输‘中国人就像无用懒虫！’的思想，所以我就没把木桩上的中国人当人看，刺了过去。”继铃木之后，其他新兵也相继冲上去刺杀，中国人的躯体被刺得血肉模糊，早已气绝。铃木又说：“事后我想：那个中国人会不会是一个普通农民？受到良心自责，我心中充满着对那个中国人的可怜之情，饭菜也难以下咽”。

铃木这批二等兵入伍后六个月，全都升为一等兵 。1941年9月，首次参加了对八路军势力很强的山东省莱芜县“敌性地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讨伐 。当他们来到一个村子，大队长命令：“进村扫荡！点火！”士兵蜂拥入村，肆意放火，对四处逃跑的老人妇女和孩子，或以机枪扫射，或以刺刀刺杀。铃木当时作为大队长警卫员，站在山岗上看得一清二楚。

结束这一村庄扫荡，大队又走了四、五里路，看到离大路约一里远处有五、六家民宅。骑在马上的大队长回过头来说：“喂！新兵们，你们谁去把那些房子烧掉？”铃木心想：这是在大队长面前露脸的绝好机会，便当即表示：“报告，请让我来完成这项任务！”内心不服铃木的三个新兵紧接着也纷纷主动请缨。

新兵们立即分头行动。到了第一家，铃木用枪托将哀求的老奶奶打翻在地，放了火。接着又进了门口贴着喜庆对联的屋子，这是一座刚盖好不久的新房子。进入里间，见到一个20多岁的女人躺在被子里，铃木不由得来了兴致，用刺刀尖挑起被子，看到女人怀里抱着一个出生不久的婴儿。

铃木回忆当年情景说：“那时我心想：一个臭中国猪，也配下崽子！老子们不辞辛苦，反而来到这里受苦，想到这里不由得怒火中烧。”

铃木在日本虽有女朋友（现在的妻子），但来中国前，未曾有过性体验。此时他心想：怎能允许下等的中国人有性行为并生育后代呢？他走出房子犹豫片刻，随即抓起高粱杆、谷子杆，扔进屋子。正要点燃，刚才被打翻在地的60岁上下的矮小老婆婆突然跪在他面前，哀求道：“不要点火！”并张开双臂妄图阻止他。铃木高喊：“真讨厌，你这个老不死的！”用枪托将她打倒。老太太摔了一个大跟头，爬起来向里屋跑，想去救那产妇和婴儿。就在此时，铃木想：此时不点，更待何时！立刻点燃了高粱杆，并堵死了房门。熊熊烈火顿时燃起，火舌从窗子向外喷涌，房里传出人世间罕见的凄惨嚎叫。

铃木稍许平静下来后，想起了参军前母亲说过的话：“良雄，虽然你在战争中可能要杀人，但决可不妄杀妇女和儿童啊！”当时他也曾向母亲表示：“明白了！”现在却干出了这种事，不免有些后悔，心想：“怪可怜的，他们一定非常痛苦吧！”可见，铃木此时还没有丧尽人的天良。

三、刺刀乱刺无辜女

又经过三个多月，到了12月末，部队再次出发，扫荡距章丘30多公里的“准治安区”内的一个村庄。铃木被编在指挥班里，担当大队长的警卫员。其他士兵们进村随心所欲、为非作歹一阵过后，铃木他们五、六个新兵来了兴致，进村去看热闹。半路上碰到四、五个持枪的老兵（已服役两、三年的一等兵）押送六、七个20～30岁的全裸妇女。一个老兵面带奸笑说：“哎！新兵们，把她们给挑了！”其他老兵也在那里皮笑肉不笑地冷眼看着铃木他们几个新兵。

“不知道这几个老兵是哪个中队的，但不论军衔高低，老兵说的话便是绝对的命令。虽然自己并不想干，但又难以抗命。” 铃木说。

全裸女人被铃木等新兵们围了起来，老兵在一旁“观战”。新兵们用刺刀将正要逃跑的女人刺倒，再从上面胡乱刺杀。女人们“哇哇”地发出悲鸣，拼命想逃出包围圈，但又全被推回圈子，胸部和小腹被刺成蜂窝。旁边的老兵边笑边大声喊：“再刺，再刺！”“你他妈的刺哪儿啊，刺她们的肚子！”“喂！刺她的胸部！”，老兵们以此“取乐”。全裸女人们每人都身遭几十刀，血肉模糊，内脏外溢，横七竖八，早已死亡。

铃木说：“事后觉得老兵们让我们干这么无聊的事，很憋气，但上级告诉我们：周围到处都是敌人！所以我们也认定：这儿是战场，每法子。那时，母亲的话早已被我抛到烟霄云外去了。”

四、根本不觉得可怜

此后铃木被提升为上等兵，兵长 。独立混成第10旅团于1942年4月与其他部队合并组建了第59师团，铃木被分配到该师团第53旅团，自6月接受下士官教育。12月，调往第54旅团第110大队，直至日本投降，先后被提升为伍长、军曹、曹长 。1943-44年，铃木任伍长、军曹时期，他以助理教员身份参加过四次刺杀活靶子训练。每次都是到章丘县看守所之类的地方，提领三个结实汉子带回来。他回忆当年说：“我根本不考虑他们犯了什么罪，只要适合做训练靶子就带走。”

先把三人的眼睛全部蒙上，再将他们分别捆绑在木桩上，作为一个班20几个新兵的“教材”。担任班长的铃木助理教员说：“你们好好看着，先由我来给你们做示范！”随后用刺刀刺向一个人的胸口。接下来发布命令：“排好纵队！”并在排队时观察哪些人积极主动。铃木助理教员下令：“刺杀！”新兵们便紧握刺刀，接连冲向活靶子，三个中国活靶子被刺得血肉模糊，死于非命。

铃木回收往昔道：“那时，我已经根本不觉得有什么可怜的了。”

五、没把拷问、杀人当回事

扫荡村庄的名目之一，是收缴枪支等武器。因为这样便可向上面报告：“我们从敌人手中收缴了多少多少支枪。”

铃木担任军曹的1944年，有一天得到某某村有八路军的情报，作为大队讨伐的先遣队，编制了由70人组成的“特别挺身队”。铃木带领的十几个人的小分队也在其中。

这一天，“特别挺身队”的士兵身穿便衣，包围并突袭了一个约五、六十户人家的小村庄。当时许多男女老少都还留在村里，但并未找到看起来像八路军的人。

铃木分队长抓到一个30岁左右的男人，问他：“你该知道枪支藏在哪里，快说！”那男人一个劲儿地说：“我只是一个平民百姓，什么也不知道。”铃木怒吼：“你怎么可能不知道？！来人，拷问他！” 说完命令部下将男人手脚捆住，五花大绑，当时铃木身边带着十几个部下。时值寒冬腊月，男人全身棉衣，铃木先用香烟点燃了他的裤脚，虽然没有燃起大火，棉裤里的棉花却在冒烟，并渐渐向上燃烧。男人用中国话高喊：“烧！烧得慌！！”满地翻滚。铃木让部下打来一桶水，说：“只要你说出枪在哪里，我就给你把火灭了！”男人边滚边喊：“俺说!俺说!”火灭后，男人仍说：“俺什么都不知道！”“你这个家伙，他妈的，再来一次！”铃木说着在那男人身上点燃了两处火。男人再次倒在地上滚来滚去，高喊：“俺说！俺说！”“真的么？”“真的！真的！” 铃木又一次下令灭了那男人身上的火，解开男人身上的绳子，只是手上并没松绑，让男人领着部下在村里找枪。并对部下说：“三人一组，按我刚才的办法审问，搜枪！”就这样，部下也抓来村民，按照分队长的办法开始了拷问。

带领铃木找枪的男人到处翻找，却怎么也找不到。经过将近一个小时，总算找到一支没法用的旧枪。但对铃木来讲，不论新旧，只要是枪，就是“战果”。然而，铃木并没有放掉那个男人，他说：“刚说你不知道，是在欺骗我们。快，再找出一支来！”拉上那男人继续寻找。男人苦苦求饶，铃木却不肯放过，男人只好再次拼命找枪，但依然没有找到。最后，铃木再次将他捆绑起来，用烟头在他棉衣上点燃多处，棉衣冒着黑烟，一点一点着了起来，男人大声喊叫：“烧啊！烧得慌啊！！”在地上滚来滚去。但在铃木看来，那男人只不过是一个例行公事的工具而已，用完以后便毫无用处，于是不管他的死活，扬长而去。

铃木回忆当年情景，边痛苦地摇摇头，边慢慢地说：“我们撇下他，那样烧下去，他肯定活不成。……真的干了件愧对人家的事！”

除了上述部队进行扫荡的表面名目以外，对每个士兵来讲，又有不可告人的真正目的。在铃木任分队长时期，只要有“讨伐”计划，当兵三年的老兵们就一定会求他带上自己。他们的目的是可趁机抢夺财物，以便购买医治梅毒的药品或夜间嫖妓，还可伺机强奸女人。铃木说：

扫荡时，就是部下干出那种事，也只能装作视而不见。如果为这种事而惩罚部下，喝酒时便会听到“子弹可是不长眼的啊！”之类的话。由于担心万一他们真的在战斗或扫荡中从后面放冷枪，所以只好听之任之。

六、我终于强奸了妇女

1944年12月，已升任军曹的铃木分队长率领大约15人携带步兵炮，配合以宪兵为主力的讨伐队，袭击一个村庄。他们包围了距济南100多公里、被日军划为“敌性地区” 的一个大村，由身穿便衣的宪兵发起突袭。但村里的人，除老太太外，几乎全都逃走了。铃木分队在距村子不远处架好步兵炮，大家都无所事事。此时此刻他心里清楚部下们想些什么，便只留下两个人值班，对其他人说：“你们去吧，干什么都随便！”这等于告诉部下，抢夺也好强奸也罢，干什么都可以。

此刻，铃木早已将过去的“决心”抛到烟霄云外。自1944年10月，开始去慰安所找女人。战局日趋恶化，他心想：“就这样连个女人都没碰过就死掉，这辈子活得也太不值得了！”他经常听周围的人说起强奸如何如何，心中便萌发了自己也想尝尝味道的念头。

铃木拿着手枪，一家一家地找女人，但是无论哪一家，都是用泥和墨水把脸上涂得漆黑的老太太。找了半天，终于发现有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妇女被七、八个老太婆团团围住，铃木用枪把老太太都赶走后，重新回到屋子里，却不见了刚才的那个女人。仔细一找，发现她正在房屋一角的猪圈里，拼命地往衣服上抹猪粪。铃木回忆当年说：“我用手枪威逼她进了一间小仓库，命她脱光衣服，强奸了她。那女人只是一个劲儿地打哆嗦。”完事后铃木扬长而去，并没有杀死她，因为该地区属于“敌性地区”，不必担心会受到处罚。

此次铃木又来到中国，他眼含热泪向我说：

当时自己觉得无所谓。……真不知道我怎么干出了那种事！……我想，那女人眼里，至今还会留有我这个罪人的烙印。虽然不是几句道歉的话就可弥补的，但假如她还健在，我真想当面去谢罪。不过如果真的那样做，或许会给她带来更多的麻烦……

说罢摘掉眼镜，擦拭泪水。我问：“很少有人承认自己有过强奸行为，您为什么要公开此事？”铃木用力举起右手，用跟刚才完全不同的语气断然地说：

只有把自己的罪恶行径全部吐露出来，才能弄清楚那场战争的真实情况！那怕漏掉了其中的任何一点儿细节，真实就会受到歪曲！

铃木自那以后又强奸过两次妇女，这些往事是他后来讲给我的。第二次是铃木分队长率15人的步兵炮分队，用马拉着炮行军时，途经一个村子，看到不远处有两三个女人。铃木深知每遇此景，老兵们就会突然消失，追上女人强奸后再归队。看到部下如此，他自己也想亲身体验一下，便溜出队伍，进村去追女人。马队依旧前进，其他女人都跑了，只有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女人落入铃木手里。他将女人拉到屋后背阴处，用枪逼着她脱掉裤子。女人用手捂住下身，全身打颤，不敢抵抗，脱光了衣服。铃木将她推倒在地，奸污了她。随后又立即追上拉炮的马队，当起了他的分队长。

第三次是发生在某“准治安区”的宿营地，村子里还有几个大些的中年妇女没有逃跑。一天夜里，铃木只身一人带上枪，溜进一家房子，黑暗中强奸了一个女人。他说：“根本不知道那女人有多大年纪。”

七、沉睡的良知开始苏醒

在中国，日军战况日益恶化，1945年7月，第59师团被编入伪满洲国的关东军属下，铃木的部队开赴朝鲜半岛北部的咸兴，在此迎来了8月15日的战败投降，铃木所属的第59师团第54旅团第110大队的官兵们成了苏军的俘虏。10月，又加上其他部队的士兵，计有1000人被送往西伯利亚的一个收容所。在那里，因饥寒疾病，头一个冬季便约有260人悲惨死去。其后铃木等人被辗转到其他几处收容所，他们边砍伐森林，边接受审查。但他们听从收容所同僚的忠告，除了抢劫之外，一概没有交待。他说：“当时心存不满，心想这与你苏联何干！那时，还完全没有认识到自己曾经做过伤天害理的坏事。”

1950年7月18日（或19日） ，包括铃木在内的969人，在中苏边界的绥芬河车站被引渡给了中国。铃木说：“那时我想：再没活路了，说不定会在哪儿被集体枪杀”。他们一行最终被送到抚顺战犯管理所。每十六、七个“战犯”被关进一间大约30平米大小、中间留有过道的监舍里，走廊上回荡着“咔嚓”的上锁声音。

我们终于以罪犯的身份被关进了中国牢房。每每想到这里，就不免愕然。心中虽知事态不妙，但决心守口如瓶，决不交待任何既往罪行。

这时，铃木无暇思及被自己杀过或蹂躏过的人及其家属该有多么痛苦，只是一味地担心自己的未来。

在这里，并没有强制劳动 ，最初一年多时间，每天饭菜管饱，其他时间悉听自便。不久，战犯之间出现学习热潮，人们开始热烈讨论、学习“侵略战争”、“帝国主义”等问题。这时中国国内的三反、五反运动高涨 ，管理所的战犯们为了响应三反、五反运动，开始认真面对自己的战争罪行，主动认识并公开暴露自己过去的罪恶，进而追究其原因、进行反省，在日本战犯间掀起了认罪、坦白运动的高潮。

铃木表面上也学大家的做法，但内心仍然疑虑重重。只是以书面形式交待了自己“曾经抢过几头猪、几只鸡”的小小罪行，以搪塞敷衍。每次，指导员都和颜悦色对他说：“你应当好好清算一下自己，回归人的本来面目。”铃木经过一段痛苦的思想斗争，终于书面交待了自己的罪行：“在结束新兵训练之前，受某某之命，用一个中国男人的活体，进行过刺杀训练。”

当时，战犯之间掀起互相揭发批判的高潮,如：“你干过什么什么！”“你命令过我如何如何”。指导员及同屋人都对铃木说：“你一定还有其他问题！”于是铃木又写出在任助理教员期间犯下“刺杀活靶子”和“奉大队长之命烧过民宅”等罪行。但仍未交待自己将三个人堵在屋里，放火烧死他们的罪行。当时他想，自己所写的全部交待材料，都可用“所做一切全是奉长官命令干的”来搪塞，以此来推卸责任。

虽然他坦白了部分事实，但指导员仍说：“你还很不够啊，再想想看。”其他战犯们也批评铃木：“认罪，你还差得远呢！” 铃木终于认识到，关键在于自己还没有设身处地站到受害者及其家属立场上去思考问题。铃木的周围，认罪、坦白运动高潮迭起，不断有人坦白过去自己犯下的罪过，并要求“从重处罚”。

铃木的顽固心态一点点地开始动摇，自己明明那么残忍地对待中国人，而他们却如此人道地对待自己。当自己的梅毒发作时，医生竟特地从外地调来贵重的青霉素为自己医治，护士们也无微不至地照顾自己。想到这里，他那沉睡的良知苏醒了。他说：“当我设身处地，回忆被自己杀害、侵犯、伤害过的人们及其家属们的痛苦时，我为自己的残酷、丑陋吃惊，终于明白自己是一个连自己都不能宽恕的罪人。”最终，铃木终于在坦白书上主动交待：自己烧死过三个人、用刺刀刺死过全裸女人以及强奸妇女等所有罪行。他说：

烧死三个人、强奸妇女等，我从没有对任何人讲起，即使自己不主动交待，也完全可以蒙混过关。但是良心的责备不允许我那样做。怀着对那些受害者们的忏悔心理，我彻底交待了自己犯下的各种罪行。

八、回国后真心认罪

铃木于1956年8月被免于起诉、当庭释放，得到中国政府的宽大处理。9月初旬回到日本，见到了阔别16年的未婚妻，两人立即结婚，那时铃木已36岁，未婚妻也已35岁。他们在故乡置下新居，并于1958年开始经营牛奶店。开业之初，铃木挨家挨户向街坊邻居推销牛奶，争取订单，但跑了整整三天，没有一家肯订购他的牛奶。他不知是何缘由，大为不解。后来得知，全村都在传言：“铃木被洗过脑，早已变成‘赤色分子’（共产主义者），大家最好不要接近他！”原来他早已被划入另类 。

铃木告诉我：

打那时起，我才开始认真地思考洗脑问题。我逐步认识到：如果要说洗脑，正因为我自幼就被日本军国主义彻底洗了脑，才会犯下那么多的滔天罪行。对于我来说，在抚顺的学习、认罪和坦白只是走向真心认罪的第一步。应该说，当时写坦白书，更多地是为了得到中国方面的认可。

由此可见，在抚顺的认罪学习，绝非什么魔法或催眠术，那只是他迈向终生“真心认罪”的基础课而已。

醒悟后的铃木开始认识到深挖自己所犯罪行的真正根源，“我曾被军国主义洗脑，对一些本不该伤害的无辜平民进行虐待，强奸甚至杀害。”铃木为自己以前所犯的滔天罪行终日自责，痛苦烦恼。

如今，铃木终于又回到了找回自己良知和人性的抚顺，站到了一群曾经悉心照料过他的人们中间。他来到曾给过他巨大帮助的原指导员吴浩然的遗像前不停抽泣，过一会儿平静下来说：

抚顺是我的第二故乡，我的认罪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第二章 继承抚顺精神（渡部信一）**

1、一心想当军官

2000年9月16日，渡部信一（现住三重县，83岁）漫步在阔别44年的原“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内。对于中国记者的提问，他总是毕恭毕敬地回答：“我做过很多对不起中国的事。在这抚顺的六年时间里，让我第一次懂得了人性的重要。”话说至此，他痛哭不堪，蹒跚欲倒，全身大汗淋漓。

一位中国女记者安慰他说：“那不是您的责任，而是日本军国主义的责任！” 听到如此说法，渡部伸直腰，挥动右手，断然否定道：“不！不！上级和国家当然有责任，但是事情是我亲自干的，我该负执行者的责任！”说完紧紧盯着自己的右手，悔恨地低下了头。

渡部1917年1月生于今爱知县名古屋市的热田区。一家四口，除父母外，还有一个妹妹。父亲本是一位销售中草药的药剂师，后来到经营铁匠铺的大伯家帮忙，终于也拥有了自己的工厂。渡部从没有贫困经历，在家中也从未受过军国主义和民族歧视的教育。母亲经常告诫他：“你要做个正直的人！”他在参军前，未曾对中国人民和朝鲜人产生过蔑视之情。

渡部初中毕业后学了一年打铁，后于1935年考入东京齿科医学专门学校（今“日本齿科大学”），并于1939年3月获得牙科医师执照，同年该校毕业。在名古屋市立医院工作八个月后，体检合格，应征入伍。1939年12月在名古屋正式参军，随部队来到中国大陆，分到驻山西省北部的第26师团独立步兵第11联队第2大队第7中队，驻防老营堡，并在此接受新兵教育。该联队以防止苏联南下为其主要任务。

1940年2月10日晚8时左右，正在接受新兵教育的渡部二等兵被军医少尉叫到医务室。进去后，军医少尉正在自斟自酌，对他说：“来，你也喝一杯！”渡部直立不动，客气地回答：“不，谢谢”。军医淡淡地说了句：“啊！是吗”，接下来又说：“明天我要做个手术，你想不想帮忙？”渡部心想会是什么手术呢，轻声地应了一声。军医接下来对他说：“以后会有好处，怎么样？”

两人都是去年由专科学校毕业的，年龄相仿，如今对方已是军官，而自己却是肩上只有一颗星的二等兵。军阶相差太大，不可能平等地进行对话。渡部从小看着当军官的伯伯长大，他也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当上军官！对此，他只能回答：“是，明白了！”

翌日2月11日是“纪元节” ，这天早上向位于东京的皇宫进行遥拜后，并没有平常的训练。渡部约于上午九时去医务室，和军医一起走出城门，来到一处小山岗。那里已有几个老卫生兵等着，另有一个三、四十岁农民打扮的健壮男人，他的眼睛已被蒙了起来。几天前，渡部曾看到过有两个同样的男人被干部培训班的培训生练习刺杀时活活刺死，估计这一个是那次剩下的。男人并未抵抗，卫生兵给他注射了麻药让他沉睡。渡部等助手扒掉那男人的衣服，将那冻硬了的土地当作手术台，用军靴踩住那男人的手脚，令他动弹不得。

军医发话：“现在开始我们做摘出阑尾手术”。然而，他刚刚当上内科大夫，还没有过手术经验，根本不知道阑尾在哪个部位。当然，渡部本人也无手术经验。估计阑尾在腹部的右下方，军医便在右下腹部用手术刀切开一个很大的口子。渡部双手拿着开腹钳，用力向两侧拉开切口。然而正常的阑尾很小，军医找了半天也没找到，气急败坏地命令道：“把肠子全部掏出来！”渡部竭尽全力，用手掏出全部肠子，把阑尾指给军医看。但是，此时军医贫血病发作，怒吼：“行啦！行啦！把肠子放回去！”渡部拼命往那人肚子里塞肠子，可怎么也放不好。军医再次犯了急，大喊：“别弄啦！别弄啦！！”渡部和几个卫生兵，只得给草草塞进的肠子包上一层纱布，将那男人拖出二、三米，扔进事先挖好的深坑，并用手枪打穿了他的头部。

“军医最终还是什么也没学到，只是做了一次他自己感兴趣的活体解剖。”渡部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说：

当时，我一心想当军官，为了在众人面前显示自己有胆量，专心手术，丝毫没有罪恶感。本来我对中国人还是有亲近感的，但到了军队，被彻底灌输“中国人是仇敌”的思想，最终干出了这种事。

二、为何那么残忍？

1940年6月，渡部在联队本部附近的兵营，接受“干部候补生”集中培训，并作为优秀干部候补生派回日本内地的“丰桥预备士官学校”学习。1941年12月毕业后，作为见习士官回到驻扎在山西朔县的原联队，立即被分配到联队直属第3大队第10中队。1942年4月晋升为少尉，任小队长，多次率自己的小分队进村扫荡。扫荡的最大目的是防止八路军的渗入，为此日军把村庄全部烧光，使这一带称为“无人区”。同年8月，渡部调入其他部队，驻扎在山西南部的汾阳和临汾。1942年11月，自前线的少尉军官转任牙科少尉军医，被调往伪满洲国与前苏联接壤的国境线附近的富锦陆军医院任职。

1944年春，关东军第10师团军医部长与富锦陆军医院院长共谋商定：对卫生兵进行彻底教育。南部战线（东南亚地区）日军节节败退，对苏战争已经列入作战视野。院长在一次会议上问大家：“能否干点什么非同寻常的事？”时任总务科长、牙科军医中尉的渡部便谈起自己曾以助手身份参加过活体解剖的经历。于是，活体解剖便被列入新卫生兵的教育实习项目。 “甚至可以说，这项决定是由我提议而付诸实施的！”渡部后悔地对我说。

上级马上命令由年龄相仿的教育主任（内科中尉军医）和总务主任渡部着手制定新卫生兵的《教育计划表》，其中包括学科教育、实习……还有活体解剖。又过了几天，院长、教育主任和富锦宪兵队长在酒桌上谈起活体解剖所需的“实习教材”。宪兵队长说：“我们那里有个很难处理的家伙”，于是决定用那个中国男子做教材。

1944年6月，渡部带领一个下属司机，开着一辆有篷卡车，来到富锦宪兵队本部。渡部回忆当年的情景说：

牢房里躺着一个40岁左右的汉子，他的腰腿发软，几乎难以站立。宪兵对他说：“出来！”那人以为要放他……高兴地用臀部和手蹭着爬了过来……

话说至此，一直很冷静的渡部突然乱了阵脚，泣不成声地说：

那时我的头脑中……也曾闪过一丝念头：拷问真够狠的，真可怜！但是我……为什么没想过停止呢？为什么没去想给他的腿急救一下呢？……当时我确实没想到这些，只是想反正他该死！那时我已完全没了人性。人性，早已从根儿上烂掉了。

渡部和下属司机从两侧架起那个男子，抬进停在附近的卡车里。渡部在卡车上为那男子打了麻醉，把他运到富锦陆军医院的太平间，扒掉他的衣服，把他放在石头台子上。

做好手术准备的教育主任（军医）等一帮人早已等候在那里。军医拿起手术刀，渡部在旁当起了助手。军医首先切开男子的右下腹部，教大家如何摘除阑尾，十几个新卫生兵围在旁边观看学习。接下来军医切开了肚子的中央部位，指看胃、肠、肝等内脏器官给新兵们详细讲解，渡部也手拿开腹钳，拉出内脏，边向新兵们说：“你们给我好好看着！”边给他们讲解。最后，军医切开了男子的胸部，边给新兵们看那用力跳动的心脏，边给他们解说。当军医的手术刀触到肺部时，男子的呼吸骤然停止，脸色变青。军医的 “手术演习”也就此结束。虽然当时男子仍有心跳，渡部还是在卫生兵的帮助下，将这濒临死亡的男子扔进了医院烟囱旁边的土坑里，并仿效山西那个军医的办法，用手枪打穿了他的头部，将其杀害。

渡部回首往事说：“当时，与其说我感到对不住他，毋宁说我感到自己做了件错事。我受到严重刺激，全身颤抖，特别害怕。”当天夜里，渡部失魂落魄，不知所措，将自己闷在屋子里，决心再不参与活体解剖。不久，他向院长提出申请，辞去了负责新卫生兵训练的职务。渡部离开后，由继任的牙科军医担任助手的活体解剖仍在按原计划于1945 年4月进行。

三、端正态度，正视罪行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那天，渡部正在伪满洲国东部的蛟河野战医院。他在那里被苏联军队俘虏，其后辗转关押在西伯利亚的几处战俘营里，先后干过修路、修车、烧砖……等苦力活。他说：“在西伯利亚，为了活下去，终日拼命，可以说没有一点儿空闲去反思自己的罪行”。

1949年8月，约1000名日本战俘被带到纳霍德卡港，凡被念到名字的人全都可以上船回国，渡部却始终没能听到自己的名字，他被单独留了下来。苏联调查官员告诉他，已掌握了他参与过活体解剖的事实。一个日本俘虏揭发了他的那些罪行，并在墙报上将事实真相公布于众。

渡部回首当年说：“那时我真是受到了巨大打击，我早已忘了自己曾经进行过活体解剖，经别人揭发，这时我才又回想起来。”此后，渡部向前苏联的调查官员交待了全部罪行。他已经打消了生还日本的念头，并于1950年，委托最后一批回国的一位医生转告自己的家人：“就当我已经死掉了！”

1950年7月，渡部和铃木良雄等约970人一起，被移送到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渡部说：“来抚顺之前，我就知道自己已是罪行累累。到了这里，我也一直在思考这些罪行的真正根源。”

入所不久，同屋曾有过几次关于各自成长历程的讨论。贫苦农村出身的人们边流泪边谈自己的身世，并且悔恨自己在中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然而，一贯不知贫寒为何物的渡部，却不能理解其中的含义。但后来，随着学习以被压迫阶级的观点书写的历史，随着学习有关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本质等方面的著作，渡部渐渐地理解了那些“流泪人”的心情。他重新反思“活体解剖”，认识到自己罪恶深重，并为自己犯下的那些滔天罪行愕然不已。

1954年秋，渡部重病住院十个多月。当时，温久达医生像亲人般地为他悉心诊治。此次访问中国得以重逢，在原抚顺战犯管理所的一间屋子，渡部紧握着温大夫的手，再三鞠躬致谢，温大夫则报以微笑。渡部还见到了住院期间曾经护理过他的两位护士赵毓英、关慧贤，不停地向她们致谢。并对当时从早到晚一直照料他的老班长深深致谢，互相庆贺重逢。他边流泪边对站在身旁的我说：“由于他们给了我以充满人性的治疗和护理，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周到照顾，……终于让我明白了自己罪恶深重。”此刻，他已泣不成声，但握着那些医护人员的手仍不肯松开。

稍后，渡部漫步在阔别44年的原抚顺战犯管理所的走廊，来到他与其他战犯一起学习、反省、哭泣过的监舍门前，踌躇片刻后，他一面鞠躬一面轻轻地走进了房间。房间约有30平米左右大小，两侧均为六、七十厘米高的隔板，中间留有一米半左右的通道。渡部站立在通道正中，缓缓地原地转了一圈，仔细环视着这些完全未改旧日模样的房间，并且朝着每个方向都行了鞠躬礼。

四、继承抚顺精神

日本老兵一行回到这座原抚顺战犯管理所，每人都感慨万千。当年他们就是在这里端正态度，直面人生，正视罪行，走向了认罪的道路。曾任职于伪满洲国特别高等警察科的高桥节夫（现居宫城县，83岁）含着热泪与当时的看守人员互相拥抱、握手，并说：“当时真的受到了你们的很多照顾，我的心里充满谢罪和感激之情”。原第59师团士兵大河原孝一（现居北海道，78岁）眼含热泪与当时的看守人员又哭又笑，握手致意，他对我说：“不仅是高兴，我觉得又回到了做人的起点”。原第39师团士兵开本德正（现居广岛县，81岁）来到位于管理所近旁的已故原指导员吴浩然家，紧抱着吴浩然的遗像一动不动，眼含热泪地说：“吴先生给了我太多太多的照顾。这次虽然没能见到他本人，但我见到了其他的管教人员，心中始终充满着对他们的感激与歉疚之情。”

金泽正夫、山口伊藏、绵贯好男、山中盛之助、高桥哲郎、榎本忠与、金井贞直、三木荣一、筱塚良雄、坂仓清、森原一、西尾克己、山冈繁、中川胜、久保田哲二等人，此刻也都站在原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旧址内。他们会一天天地老去，终有一天肉体也会消失，但是就是在这个抚顺战犯管理所共同学习和认罪的精神，在他们回国后得到了得到进一步的发扬光大，相信会在未来的日子里，定会得到继承和发展。

**第二部　时代在捉弄我们**

**第一章　我没能抗拒侵略洪流（绘鸠毅）**

我为什么现在要讲述那场侵略战争呢？

绘鸠毅（原姓石渡，现住神奈川县，88岁）在大学教室里向学生们发表演讲：

我认为今天的日本，这样走下去，将会重蹈我们那个时代的复辙！你们必须对此有所察觉，醒悟过来，力争改变当前日本的危险政治！

一、法西斯阴影悄然而至

绘鸠毅1913年3月生于鸟取县，兄弟姐妹六人，他排行老三。幼小时期在千叶县的南房总度过。父亲本系鸟取县师范学校副校长，辞职后移居至此，并开办了一所名为“安房自强学舍”的私塾，热心为农村培养一批优秀人才。据说父亲虽属一位天皇崇拜主义者，但是对于朝鲜人、中国人，一贯抱有好感。

1910年日本断然吞并韩国，此后从未停止过镇压朝鲜人民的反抗。此后日本于1914年8月，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向德国宣战，进攻德国在山东的租界地——青岛，翌年1月向中国政府提出“21条要求” 。自此，日本开始了向中国推行帝国主义政策。

1919年绘鸠入小学，学校按照国定教书内容，反复灌输学生们“尽忠天皇乃日本国民神圣之义务，亦最高之荣誉”之类的内容。每当纪元节、天长节 等国定节日，都要在校园里举行《教育敕语》 的捧读仪式。会场正面供奉着平日悉心保管在奉安殿 中的天皇皇后御照，校长身穿礼服、手戴白色手套，毕恭毕敬地接过《教育敕语》，深深鞠躬后，小心翼翼地展开，以庄重口气宣读道：“朕惟我皇祖皇宗，肇国宏远……”。

对于天皇陛下的“敕语”，师生们诚惶诚恐，低头弯腰，凝神聆听，最后齐唱赞颂天皇的《君之代》 。

1925年，日本通过了《治安维持法》 。

是年绘鸠升入中学，并在中学的五年期间，接受了军事训练。绘鸠说：“在小学、中学接受的全是‘日本是以天皇为君主的最伟大的国家’、‘惟有忠君爱国思想才是日本人最为尊贵的品格’之类的思想教育。当时，这一切都觉得是天经地义的，毫无阻碍地被我全盘接受下来。”

1927－1928年，日本频频出兵中国山东。

1928年3月，凡与日本共产党有关的人员，一夜之间全部被捕，史称“三•一五事件” 。

此时，绘鸠第一次听到“共产党”这个词，并且认为“赤色分子（共产主义者）就是国贼！”

1928年6月，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等人密谋炸死了奉系军阀张作霖。

1931年4月，绘鸠考入旧制水户高中 。水户高中颇具自由气氛，他常与具有远大理想的同学们交流思想，每天晚上都在宿舍进行自由讨论。此外，他还到处寻找武者小路实笃、托尔斯泰等人的近代文学，以及和辻哲郎、西田几太郎等人的哲学著作，如饥似渴地汲取营养。绘鸠渐渐具有人道主义和理想主义思想。

1931年9月，以柳条湖事件为契机，关东军加强了对中国东北地区的进攻态势。（“九・一八事变”）

1932年3月，伪满洲国宣告成立。

1932年5月，“五・一五事件”爆发 。

1933年3月，日本退出国际联盟。

绘鸠在1931年入学时，校内还有相当数量的学生打出过“反对战争”的标语。随着日本向战争泥潭越陷越深，这些学生遭到校方开除，数量日渐减少。绘鸠几乎再无任何可参与的活动。他说：“那时只想考大学、当学者，我认为政治和我没什么关系。”

二、日本国内的法西斯化道路

1934年4月，绘鸠考入东京帝国大学（今东京大学）文学部伦理学专业，师从和辻哲郎教授，潜心做学问。他说：“当时，大学里明目张胆的反战行为已不多见。”

1936年2月，“二•二六事件”爆发 。

绘鸠从初中、高中直至大学的同窗好友梅本克己 那里得知了这一消息。他说：“听到这一消息的瞬间，我最怕的是：如果叛军真的占领了学校，自己将失去自由学习知识的机会。然而，也心存期待，心想：假如经过这次事变，国家能变得更好，倒也是件好事。”

当时，日本在国际上已走向孤立，并在国内强制推行由军部主宰的法西斯化进程。然而，绘鸠对这些社会状况漠不关心，既远离校内的左翼活动，同时对于右翼的动向也投以白眼，保持距离，认为这些都是“另一个世界的事情”。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中走向全面战争。

8月，日军进攻上海。

9月，日本掀起“国家精神总动员”运动。

12月，日军占领南京，进行南京大屠杀。

1937年4－12月，为撰写毕业论文，绘鸠回到千叶县老家，潜心钻研康德伦理学。在研究康德哲学的过程中，绘鸠确立了重要的人生观：即“在承认属于自己本质的人格的同时，也要承认对方的人格”的“人类尊严思想”。它适用于任何理性的普遍法则，亦即由于人类具有了实现伦理的能力（实践理性），人类真正的和平——康德所谓的“目的之国”便有可能实现。

1938年4月，日本政府公布《国家总动员法》 ，议会政治被完全架空。

同年3月绘鸠由东京大学毕业，9月任职于文部省教学局思想科。此间，他与亲密好友梅本克己成了同事。是年5月，陆军大将荒木贞夫就任文部大臣，文部省内法西斯化急剧加速。

1938年10月，内务省（内务部）对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教授河合荣治郎博士 的《法西斯主义批判》等四部著作处以禁止发行处分。

1939年1月，河合被迫辞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职务。

这时文部省内，开始急速推行对部分学者学术著作的思想审查。新年伊始，上级便交给绘鸠几部河合博士的著作，命他将书中有悖于被文部省定为蓝本的《国体之本义》 的思想部分，一律画上红线。绘鸠明白，博士虽非共产主义者，却是一位对法西斯主义持批判态度的自由主义者。绘鸠对河合博士的观点很有共鸣。就在这个时期，他常常从文部省的楼上看到河合博士从大街走向警视厅接受审查的落寞身影。绘鸠痛苦之余，因良心的责难，他终于向上司提出：“这项工作我难胜任”。他回忆当年说道：“那是当时我能够做到的最大限度的抵抗。”

1939年2月，河合博士以违犯《出版法》而被起诉。

自那以后，文部省进一步推行思想警察化。1939年9月，由于绘鸠不愿为官方充当爪牙，辞去了文部省的职务。他先后辗转于山梨县和长野县任中学教师。1941年6月，他收到征召令，时年28岁。

三、上级命令就是天皇命令

1941年7月，绘鸠作为补充兵，在千叶县佐仓市的第64部队，接受了为期三个月的新兵教育。此间第一期的教育，《军人敕谕》 可以作为代表，其中规定：“尔等谨记，禀承长官之命，实乃直接禀承朕（天皇）之命也！”并且那时的所谓教育又经常是拳脚交加。除负责教育的长官外，老兵们也常以“用词不当”、“态度傲慢”等为借口殴打新兵。

绘鸠回忆当年说：“老兵为了给自己解闷开心，常常拿新兵出气。尤其对我这种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们更是拳打脚踢。”只要对方的军衔比你高，只要他比你先到部队几天，就必须绝对服从他的命令；反对他，便是反对天皇——这种奇怪逻辑，在兵营里却被视为“真理”。“他们一再用打、再打，折磨、再折磨的办法，把一个普通人所持有的感情和思想打掉、折磨光，使之变成一个毫无个人思想的空壳，只知绝对服从上级的机器。当听到‘杀死他！’的命令，便答一声‘是’而勇往直前；当听到‘你去死吧！’也会义无反顾，从容赴死。这种所谓的‘教育’一直在军队中盛行。”

10月，新兵的第一期教育结束，绘鸠留下来继续在部队工作。几乎所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士兵都递交了“干部候补生”的申请，绘鸠却未交，他说：“我太厌恶军队了。”

1942年4月，绘鸠被分到驻扎在中国山东省的第59师团54旅团独立步兵第111大队机枪中队。6月，又被任命为驻扎在山东省新泰的大队本部的治安员助手，在此从事了大约两年的治安宣抚工作。期间，他也曾参加过几次作战。

第59师团占领山东的目的，是妄图把这里变成日军的兵站基地。为了给日军提供给养，就要“征收”（掠夺）小麦、棉花等农作物。并要在矿区管理煤炭开采，还要抓“劳工”掠夺人力资源，押送到日本。这些筹集资源的主体部门，便是常驻中国的三井、三菱等日本大企业。绘鸠说：“我们这些日本军队的真实目的，就是为这些大企业能顺利掠夺资源提供保证。”

日本以“入侵强盗”的姿态闯入中国。对于这些“以天皇为君主的优秀日本民族”，竟然还有决不服从的“粗暴的中国人”。于是，日军为消灭他们，反复进行“尽灭扫荡”的三光作战。结果，日军的残忍暴行反而激怒了更多的中国人，将他们推向了一致抗日的道路。

四、我没能拒绝上级命令

自1945年4月，第59师团进行了最后的秀领战役。为防备美军登陆山东半岛，必须先将山东半岛东部地区的八路军与居民全部清除，以便构筑阵地。第111大队的大部分人已结束了对约有100户农家的索格庄的扫荡，蟠踞在那里。

1944年10月，绘鸠又被召回到自己原先所在的机枪中队，12月开始担任驻新泰的大队本部的助理教员，训练新兵，绘鸠负责第二组工作。两个多月后的1945年6月初，包括绘鸠在内的教官们带领大队的200多名新兵向索格庄进发，并于6月10日前后抵达。

两天后，接到热田大队长检阅机枪中队新兵的命令。检阅项目规定：上午射击，下午刺杀活靶子。过了中午，石渡（绘鸠）伍长带领4人去大队本部占据的一处民宅领俘虏。这里有一间20坪（1坪≈3.3ｍ２）左右像似牛圈的破房子，里面关押着40多个身穿脏衣服的中国人，他们都是住在附近的农民，是在扫荡中被抓来的。仔细一看，其中竟有十几个剃光了头的妇女。

石渡（绘鸠）伍长从中领出四个男人，其中三个是30－50岁的农民，还有一个是只有15岁上下的少年。四个人全被反绑着带出村子，来到村东一块大约50×200米大小的田地，那是一块北高南低的小斜坡。在远处的高地，立着四根两米多高的木桩，相距约有三、四米，木桩后面早已挖好了大小可放入棺材的土坑。

看到这些，三个成人都恳求道：“我们只是一介普通老百姓，不是八路军，可别杀我们呀！”那少年紧紧抱着绘鸠的腿哀求说：“俺家只有一个老母亲，她还在家里等着俺回家，你就放了俺吧!”听了少年的话，绘鸠有些心动，因为自己也是父亲病逝后，将母亲只身一人留在日本，来到中国的。但是，放他走就是违背长官命令，亦即违背天皇命令，也就意味着自己性命不保。

绘鸠双目紧闭，喃喃自语地追忆当年说：“那时我对自己说：战争就意味着残忍。对于我这个已经当了四年兵的人，这种逻辑已深入骨髓，以前潜心研究的康德哲学早已被我忘得干干净净。”

包括少年在内的四个中国人，被士兵强行拉到木桩绑了起来。一切就绪后，绘鸠跑回中队将30几个新兵带到这里，教官池田准尉站在离四个中国人30多米处，助理教员石渡（绘鸠）伍长离教官又有70多米。热田大队长在旁检阅。

绘鸠将新兵集合在地势稍低的凹地处，命令他们排成四列纵队，然后下令：“前方的中国人全是敌人！一定要刺死他们！”随后命令排在前面的四人：“出发！”四个新兵匍匐前进，爬到斜坡尽头。池田教官下令：“冲上去！”新兵们紧握刺刀，冲向四个捆绑在木桩上的中国人。但是，几乎所有的新兵都在冲到“活靶”前站住了，他们在教官的叱骂声中多次冲锋。在教官说“好了！”以后，绘鸠又让下面四个人列队出发。这样反复了七、八次，“检阅”终于结束。士兵们集合到被杀死的“活靶”前，那些人的身体被刺得血肉模糊，体无完肤，五脏六腑，流淌满地，长达数米。四人早已气绝身亡。

次日，绘鸠等人开始构筑对美作战阵地。先前看到的不少中国“俘虏”都被用作苦力。据说在六月下旬（或七月上旬）大队离开这个村庄时全部被杀，有些用于新兵的刺杀训练，有些用于军官们的“试刀”斩首。

绘鸠回忆起当年的情景，对我说：“那时我根本没想要出人头地，只是认为身在日本军队里，只能如此。如果我是真正具有良心的人，也许有勇气拒绝大队长的命令。但是，在当时的日本军队里，拒绝上级命令也就意味着自己休想活命。这一点，我没能做到。”他一直紧闭着双眼，痛苦之情溢于言表。

五、无意中造就了日本法西斯

日本战败投降时，绘鸠正在朝鲜北部。后来为苏军俘获，在前苏联西伯利亚地区当了五年俘虏，从事体力劳动。其间接受审查，对于刺杀活靶子的罪行他毫不犹豫，原原本本地和盘托出。因为他心想：“自己身处日本军事机构之中，又是奉大队长之命，因此责任并不在我。”

1950年7月，包括绘鸠在内的970名战犯被移交给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在这里，他们受到来自中国职工们的人道主义对待，他们不仅吃惊而且心中充满温暖。他们心想：“很多中国人是被我们杀害的，而我们却受到他们亲人般的照顾……”心里充满感激。在与中国管教人员的接触中，绘鸠渐渐感到心中沉睡的良知在萌动，“啊！对！这正是康德所主张的人道主义真谛之所在！以前我矢志追求的，正是它！”

其后，绘鸠仍不断地思考这个问题，并广泛阅读毛泽东著作等书籍。他与其他战犯们一起集体学习，相互交流，不断思考。渐渐理解并承认：“我确实干了坏事，确实对不住人！”但内心深处仍然认为：“不管怎么说，那是命令，我也没办法。”随着认罪、坦白运动的高涨深入，绘鸠主动详实地写出刺杀活靶子等罪行材料，并在同屋的伙伴们面前公布。可伙伴们仍然说：“你这交待还算不上认罪”，并对他加以彻底批判。绘鸠重新写好材料交上，大家仍不放过他。绘鸠不解地想：“我已老老实实地全部坦白了，他们却几次三番都不放过我，这是为什么？”陷入了很大的苦恼。一天，北京来的老指导员和蔼对他说：“你站在受害者的立场上，再想想自己的问题，怎么样？”绘鸠回首当年说道：“那次谈话，真是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他意识到，在那以前的所有交待，全是在替自己辩护。他发现自己过去实在是太浅薄了，最终认识到；

以前，我简单地认为：我对日本的战争政策持批判态度，甚至还对日本军队的野蛮兽行愤恨过。因此，大部分责任应归罪于上级！然而，自己不但没有挺身而出，亲自反对日本法西斯主义，反而沦为手握钢枪入侵他国的强盗集团中的一员。若是站在受害者的立场来看，加害的侵略集团中虽有思想和认识的不同，但那只不过是小小的矛盾而已。刺杀活靶子的责任虽在长级，甚至可以追溯到天皇，然而给新兵下达残忍命令的却是我本人，自己的责任当然是无法推卸的。只有站到受害者的立场上，才能看清，以“自己身处日本军队，没有办法”作辩解，确实是难以饶恕的！

1956年8月，绘鸠被免于起诉，9月初回国，时年43岁，立即与出征前的未婚妻绘鸠恭子完婚。

自此，绘鸠毅一直作为“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的一员，从未忘记自己犯下的罪行，从未丢弃自己的认罪精神，从未停止向日本人民传达自己的思想和认识。

在这次演讲中，绘鸠充满忧虑地告诫日本的年轻大学生：

我年轻时期，一直生活在法西斯主义气氛的笼罩之中，但却没有能力阻止它，对此深感惭愧！

当今的日本社会，表面看来一派和平景象，当我看到年轻一代沉溺其中，不由得回想起自己的过去，很是担心。

无论什么时代，我都希望年轻人能够拥有一双寻求真理的慧眼和追求正义的积极性。最可怕的莫过于在我们不知不觉之中，法西斯主义势力日益强大，最终使得我们难以抵抗。就像我的学生时代，反战势力就被政府彻底打压。到了那时，不论年轻一代多么优秀，都无法与之抗衡。最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防止日本社会重蹈过去的覆辙！

**第二章 　我也曾参与刺杀活靶子靶子（堀口久七）**

堀口久七（原姓涩泽，现居埼玉县，81岁 ）与前一章所述的绘鸠毅曾在同一个大队的教育处任职，也曾参与山东省索格庄的新兵刺杀活靶子训练。但他与绘鸠不属一个中队，刺杀训练的日期也不同，故本文对此作一介绍。

一、再也不想待在这里

1920年9月，堀口（涩泽）久七出生在埼玉县羽生市的郊区。家里是极其贫困的农民，从地主那里租用2-3反（1反≈992m２）的土地耕作。农作间隙，父亲去铁路做装御工，以维持生计，然而在堀口11岁时就已过世。堀口本有兄弟姐妹五人，但由于营养不良，其中两人夭折，只剩下他和一个哥哥、一个妹妹。“当时家里极其贫穷，仅够糊口”，他回忆童年生活时说。

堀口12岁小学毕业后去学木匠，饱受师傅的体罚和虐待，直到20岁征兵体检合格。 他说：“当时听说：到了部队，就能吃到烤乳猪。心想：这种好事从来没有听说过，俺也真想上战场，去吃一吃。当时根本没想在部队里出人头地，只是想，到了部队就再也不用担心饿肚子了。”

但是这种天真的想法，在1941年10月至12月在千叶县佐仓进行的第一期新兵训练中，一下子烟消云散。训练时，一句“动作太慢！”上来就是一记耳光；“你这是什么持枪动作！”又是一记耳光； “两脚伸开，咬紧牙关！”话音未落，雨点儿似的铁拳又打了下来；从半夜到凌晨，两手紧握步枪，行“持枪礼”……。打得堀口脸颊肿胀，嘴唇开裂，饭也难咽。

总算熬过了三个月的新兵一期训练。长官问：“谁想回家，举手！”堀口心想：再也不想在这里呆下去，便鼓足勇气，高高地举起了手。就这样，他回到家里。但仅仅三个月后，收到一张“红纸”（征召令），他还是不得不重返部队。

二、咱们不都是老百姓么？！

1942年6月，堀口抵达中国的山东省新泰，分到第59师团54旅团独立步兵第111大队第三中队。他多次参加进村扫荡。

自1945年4月，堀口作为教育处上等兵，负责第三中队的新兵一期教育。6月上旬，他带领大队的200多名新兵，同绘鸠等人一起来到索格庄。此前堀口已升为兵长，并被任命为分队长 。正如前一章所述，第111大队的教育部队于6月10日左右到达索格庄。记不清哪一天，堀口等人带领中队的30几名新兵，沿路从东边走出村子，到达地面略斜的广场。

热田大队长和增田中队长等长官早已到达了现场。堀口说：“直到那时，我才知道要让新兵刺杀活靶子。”时间已过下午四点，太阳开始西下，站在道路上向西北望去，远处是高坡，在100米开外的高处立有四根高约2米、直径约10厘米的木桩。木桩间距大约有10米，后面挖有１米多深、可放棺木的土坑。堀口说已记不大清了，似乎在这四根木桩右侧，还有几根木桩矗立在那里。

堀口走到斜坡下面的道路附近，看到有20几个衣衫褴褛的中国男人被带了过来。他们年龄差别很大，但以40岁上下者居多。第三中队从中带出四个人，中队又分成四个分队，每队一人。涩泽（堀口）分队长从长官手里接过一名“俘虏”，长官命令：“把这家伙绑起来！”男人40岁上下，看起来意志坚强，身体健壮。堀口将男人带上坡，来到最左边的柱子旁。脱了他的上衣，正要绑的时候，那男人突然用中国话说：“俺是农民，你也是农民，咱们不都是老百姓么？！”堀口未加思索，爽直地边用中国话回答：“是啊，是啊！”边将那男人绑到木桩上，但没有蒙住他的眼睛。

堀口回首当年道：“那时也觉得他怪可怜的，但事已至此，只能自己告诉自己：已经没辙了，必须杀掉你！”

三、啊！哎哟！！

其他桩上，也都被绑上“俘虏”。堀口回到原位，长官发令：“率领新兵，练习刺杀！” 堀口分队长集合了手下的七、八个人，上到斜坡的中间约离“俘虏”50米处，命令他们排成一列纵队，对大家说：“前方那家伙是八路，刺死他！”大队长、中队长站在斜坡下面，目不转睛地望着这边。

堀口首先下令：“匍匐前进！”排在前面的新兵紧握刺刀，匍匐爬上斜坡。堀口先跑到距“靶子”十米左右的地方等候，然后下令：“冲上去！”新兵爬起来，冲向那个中国人。堀口跑上去高喊：“刺死他！”

就这样，堀口逐个命令新兵，接连刺向那个中国人。

绑在木桩上的中国人，每遭一次刺杀便惨叫一声：“啊！哎哟！！”一边痛苦呻吟，一边扭动身子。从右侧的远方，不断传来“俘虏”们的怒吼声：“俺们只是普通老百姓，凭什么要杀我们？！”、“日本鬼子!”、“东洋鬼子!”……虽然天已暗下来，看不清远处情景，但堀口想那边一定也在进行刺杀“俘虏”训练。

平时训练，教新兵们刺杀时要对准心脏，但新兵全都刺向了腹部，弄得男人满身是血，内脏流出，他扭动身躯，痛苦异常。堀口实在看不下去，大吼：“妈的，你们都刺哪儿呀！好好看着，要这样刺！”一刀戳穿了男人的心脏。男人当即垂下了头，气绝身亡。

说到这里，堀口紧闭双眼，频频摇头，强忍热泪，对我说道：“我也和那个中国人一样，生在贫寒的农家，受尽别人的虐待。……当时他问我：‘咱们不都是老百姓么？！’……我根本没去想，这句话究竟意味着什么。”

刺杀男人后，堀口放眼望去，只见斜坡下面的长官们正走向别处，那里也在进行着同样的刺杀活靶子训练。

周围已经暗了下来，虽然看不见远方，但每刺杀一个人，都能听到中国人的怒吼，而且怒吼声越来越烈，现场一片骚乱。堀口想：其他中队也在相距不远处的地方，同样在进行着刺杀活靶子训练。

四、用完就被丢弃的中国人

第111大队包括五个中队、步兵炮中队及绘鸠所属的机枪中队，共由七个中队组成。堀口说：“当时，20多个中国‘俘虏’全都被刺杀，这是确切的事实”。但除了第三中队以外，还有哪个中队参与了刺杀活靶子训练，已经不很清楚。而从绘鸠的证言中可以得知，机枪中队这时并没有参加刺杀训练，由此可以推测，参与此次刺杀活靶子行动的应该是第一至第五中队，或许步兵炮中队也曾一同参加。

刺杀训练结束后，被虐杀的中国人由老兵们埋进坑里。堀口说：“我记得，训练结束后，我们全大队人马立即从索格庄转移到其他地方。”如果堀口没有记错的话，他们参加的刺杀活靶子训练应该是在六月下旬（或七月上旬）转移之前。绘鸠由此推测：“应该是日军从农村抓来所谓的中国‘俘虏’充当苦力，命令他们修筑好对美作战工事后，转移时成了累赘，便将他们全部杀掉。”而对于当时的刺杀现场，绘鸠说：“应该是距离我们的刺杀现场再往东走一点儿的地方。”

堀口在日本战败后，被关押在前苏联的西伯利亚，后转押到抚顺战犯管理所。他在此对自己的罪行一一反思、认罪学习，反复思考那个中国男人被杀前对他说过的话：“俺是农民，你也是农民，咱们不都是老百姓么？！”

无论是在抚顺，还是回到日本以后，这句话一直萦绕在堀口的耳边，他不断地思考着这句话的真正含义。

**第三章　以“试胆”为名（三神高）**

“马上就要进村啦，加把劲儿!你这个没出息的家伙！”耳边传来分队长的骂声。那时我热得难熬，大汗淋漓，全身有如落汤鸡。腰挎刺刀，前后又背着装有120发子弹的弹匣，几乎走不动了。时间是1942年8月上旬，当时我还是个新兵。

三神高（现居山梨县，80岁）在医院的一间小房间里，面对35个医生、护士和事物人员，略显紧张地开始了他的证言。

一、只值一分五厘钱的新兵

三神于1921年5月出生在山梨县西八代郡的一个大家庭，家中有祖父母、父母及五个兄弟姐妹。自家约有一町二反 的土地，除耕作水稻外，还栽桑养蚕，据他自己说，当时在村里生活还算不错。三神在家里排行老三，自14岁高小毕业后，一直在家帮忙干农活。

20岁接到征兵令，并于1942年1月编入位于千叶县佐仓的第64部队。在那里，只接受20几天基础教育便开往中国，2月上旬到达山东省济南，被分配到独立混成第10旅团炮兵中队，接受新兵教育。三神回忆那段“教育”时说：“那时可真把我整苦了。我是负责照看马匹、清扫马厩。老兵经常找我的碴儿，说什么‘没有扫好！’、‘马脚没洗干净！’就连寒冬腊月，也要把洗马脚的水泼到我的头上。有时他们大吼一声“动作太慢！”接着就是一记耳光。而且还常常对我们新兵说：‘你们这些家伙，只值一分五厘钱，一张征兵明信片的价格，要多少有多少。你们知不知道，一匹马还值好几百块呢！”在这里，新兵们毫无尊严可谈，远不如马值钱。

1942年4月，独立混成第10旅团被编入新编第59师团。三神被分配到该师团第53旅团第42大队步兵炮中队，继续接受新兵教育。新兵教育结束后，三神辗转于各警备地区。

本章开头所述，便是三神跟随600多人的大队人马，初次参加“新兵教育讨伐”时的途中情景。那次从临清走了70多里，这一带八路军与农民关系紧密。据说大队要去扫荡的村庄，凡是有八路的村子，人都已跑光了。

二、掳掠丈夫和爹爹

三神朦朦胧胧走了好久，看到远方有一处周围都是枣树林的村子。他心想：绝不能在这里爬下！竭尽全力跟上队伍。大队包围了这座有100多户居民的村子。分队长向三神等新兵命令：“男人全部抓起来！牲畜全部带走！出发前把所有房子烧掉!”此时，三神心想：我得主动立功，给肩上添几颗星，哪怕多一颗也行。他想起出征临行前，家乡人都是手挥太阳旗送自己出征的。不能不立功、添星，这是使命!!

他和同是新兵的伊藤、大林三人冲进村子。在人们的怒吼、悲鸣中他也听到了混杂其中的鸡、猪的叫声。三个人首先进了一家，在水缸里埋头喝够了水。突然，东面田间传来一声“哞”的牛叫声，“牛在叫，那里一定有人！”大林话音未落，三个人已向那里跑去。来到田边，他们发现前方50多米处有一男一女，还带领一个孩子，牵着一头牛正顺着一条浅沟在逃跑。三神立刻端起步枪“啪啪”地开枪威胁，三个人还想跑，三神又打了几枪，他们吓得蹲在了沟里。

三神等人跑过去用枪对准他们。男人晒得乌黑，是个30开外的壮汉。三神问：“你是不是民兵？”男人答：“不，我只是个农民。”他结实的手紧紧抓住牛缰绳，妻子靠近大汗淋漓的丈夫，递给他毛巾。大林见此骂道：“嘿!装什么洋蒜！”向女人肩上狠踢一脚，女人晃动一下，央求丈夫保护，男人把女人挡在身后，怒视三个日本兵。“把缰绳给我!”三神怒吼，男人以坚决的口吻说：“不行!” 牢牢抓紧缰绳。大林从旁边用拳头猛击那男人的脸，男人晃了晃倒下去，女人站在男人前面阻挡，三神一把抓住女人头发将她拉倒，女人全身颤抖，扯住三神的腿拼命哀求：“牛不能给，你们把牛拉走了，我们就活不成了！”三神说：“咱不管这些，咱们是奉命干事，这牛非带走不可。”边说边照准女人的乳房踢了一脚。女人捂着胸部哭喊：“那是俺家的牛啊!”原来站在一旁的七、八岁男孩儿此时一头扑进母亲怀里，母子俩一起嚎啕大哭。三神骂道：“这个讨厌的崽子！”使劲用军靴向男孩儿的头部踢了一脚。男孩儿头破了，鲜血直流。母亲又哭又喊，紧紧抱住偎在怀里的儿子站了起来，嘴唇发紫，哆嗦着喊了一声“鬼子!”并狠狠地向三神吐了一口唾沫。

三神对那男人说：“你得跟我们到长官那里去一趟。”他和另外两个日本兵押送男人，并带走了那条牛。母子俩哭哭啼啼地追赶他们，但是，那农夫和妻子说了几句话后，义无反顾地跟上日本兵走了。

三、日本鬼子的仇最终必报

三神将男人带到训练新兵的教官（少尉）面前报告说：“这小子化妆成农民准备逃跑。”教官问那农民：“你说!八路军哪里去了？！”那男人只是说：“俺是老百姓，什么都不知道”。分队长边用十厘米宽的皮带向农民的肩、背、脸胡乱抽打，边问：“你是不是民兵？”农民弯扭着身子，反复地说：“俺是老百姓，根本不知道什么民兵、八路军。”距这个农民五米处，另一个农民被捆绑在梯子上灌水拷问。

三神听到分队长问教官：“挑不挑了他们？”因为平时分队长就讲过：“三神优秀，挑人时让他打头阵”。三神领悟到要杀人了。他浑身哆嗦不止，担心地问自己：“我有杀死这样一个壮汉的本事么？”但是他又回想起出征离家时父亲和乡亲们挥旗送别的情景，头脑中又萌生出另一个念头：“我必须干得漂亮些，如果连个人也杀不好，那就名声扫地了”。

三神回忆当年的情景说：“分队长向我发令：‘三神一等兵，你把这个家伙挑了。先把他绑到那边的枣树上’”。三神把那男人带到村南的茂密枣树林时，那里已挖好了一个坑。正准备将那男人捆在枣树上时，那男人说：“死，算不上什么，让我先抽袋烟”，教官准许了。农民坐在枣树下，美滋滋地吸他那烟袋，呆望着远方天际。三神慑于男人的凛然气概，虚张声势地喊：“你这个臭种地的，快吸，快！”向那农民肩头猛踹一脚，结果，反而遭到男人肌肉的反弹，倒是自己跌了一跤，招来围观士兵和军官们的一阵嘲笑。

农民不慌不忙地吸完他的烟，然后站起身来，满腔仇恨地喊道：“孩子，别忘了替爹报仇！”分队长夺过农民的烟袋摔在地上，朝他的脸打了几拳。又命令三神等人将那男人绑到枣树上，正要为他蒙住眼睛，那男人大吼道：“我不要这玩意儿！你们这些日本鬼子，最终一定会向你们报仇！”

三神紧握步枪，从十几米外边喊“杀呀”边冲了过来，他的刺刀刺穿了农民的右肩、鲜血外涌，但男人咬紧牙关，忍住疼痛，瞪大双眼，怒视三神。分队长大骂：“你他妈的刺他哪儿啊，你这样能刺死他么？” 用皮带照准三神的头抽了过来。三神再次冲锋，这回却刺到农民的左腕，农民依然怒视三神。分队长怒骂：“混蛋！往胸部戳！” 三神进行第三次冲锋，这次刺穿了右下腹，鲜血喷出体外，染红了三神的军服。农民依旧紧咬牙关，拼命忍住痛。

这时教官命令：“新兵们，冲上去！”新兵蜂拥而至，纷纷向男人刺了过去。男人肠子外溢、浑身是血，但双眼仍然瞪着日本兵。最后，见他以极端仇恨的表情，拼出全身力气，大喊一声“鬼子！”脑袋一歪，垂了下去。新兵们并未就此罢手，继续按长官命令乱刺，直到把他捅成蜂窝。十米开外的枣树上，绑着刚刚灌水拷问的那个农民，同样被新兵刺死。两具尸体当即掩埋在坑中。

四、同样生在农家

三神在日本战败后经前苏联西伯利亚地区的拘押，于1950年7月被移送到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当初他想：“我怎能算是战犯？一切全是遵从命令干的，我算做了什么坏事呀！”他终日自暴自弃，难以自拔。随着学习讨论的深入，三神逐渐认识到，尽管自己也是农民，却站到了日本侵略者一边，欺压中国人民。同时也认识到：自己在日本军队中被彻底剥夺了人的尊严，受尽压迫，但是自己却在欺压更弱势的中国人民，甚至随随便便地将他们杀害。

静谧的房间里回荡着三神的证词。最后，他泪流满面，从嘴里一点一点地挤出话来，断断续续地说道：

夺走人家至爱的丈夫和父亲……毫无理由地抹杀过着和平生活、热爱劳动的中国农民的生命……，惨无人道地对待留下来的母子……。同属生在农家的我……竟然干出这等恶行……我简直不知道该用什么语言向人家谢罪……。

**第四章　同属遭受虐待之人（沟吕木清）**

“当时您能拒绝‘用刺刀把那男人刺死’的命令么？”

“这种事我连想都没敢想。一旦拒绝，就等于是自杀。日本士兵早已被灌输‘长官命令就是天皇命令’的思想，所以完全不可能产生那种想法。然而，当时为了自己保命，没有违抗长官命令，作为杀人的执行者，我当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沟吕木清（现居山梨县，80岁 ）回首往事，这样回答我的提问。

一、贫穷中拼命活着

1921年4月，沟吕木生于山梨县上野原山沟里的一个小村庄。周围全是山，没有一点可耕作的水田。全家只靠一点已经抵押给钱庄的旱田，种些谷子、薯类、玉米等作物，聊以充饥度日。两个刚蹒跚学步的妹妹，均因营养不足、受寒感冒，加之家中无钱就医，而相继死去。沟吕木回忆过去说：“家里没钱，我们吃不到一般家庭那种日常饭菜，两个妹妹就那样可怜地死去。”

单靠农业很难养家糊口，父亲只好去窑上烧些木炭，或用大板车到深山里拉些木材到城里，用来贴补生活。沟吕木从少年时期就一直是父亲的好帮手。

1928年4月，沟吕木入村里分校的寻常小学。由于没钱买书包，只好用块旧布给书和文具打个包儿，冬季上学也是身着单薄衣衫，极度贫苦。然而，他的成绩却在班上名列前茅。

1931年9月，“九・一八事变”爆发。沟吕木羡慕当时日本所谓的陆军英雄——“肉弹三勇士” ，一天到晚描绘着“三勇士”的英姿。五年级时他从村里分校转入本校，仍然继续画他的战争画儿。沟吕木希望继续升学学习绘画，然而家中没有能力供他深造。

12岁小学毕业后，父亲决定送他去当学徒。一位亲戚在甲府市里开玩具店，那里接受了他。本来说定：沟吕木在那里一边干活，一边每周去学校学一天画儿。但是沟吕木没能坚持下来，最终还是跑回家里，被父亲痛骂一通。

后来又签了五年合同，到八王子 的纺织厂当学徒，每天从早到晚不停地干活。正处生长发育期，但却吃不饱，沟吕木每天都饿得直不起腰。每当就餐，老板坐在上座，沟吕木和女工们一道坐在下座。吃完一碗后，少年沟吕木很客气地递上饭碗，想再添些饭，这时老板就用长烟袋杆铛¬铛地敲打火盆，“嗯哼嗯哼”地干咳几声，接下来就听老板娘大声嚷道：“最近大米可真贵呀！”虽然沟吕木当时年仅13岁，身子又瘦小，但每天却要搬运连大人也难搬动的重东西，每当搬不动时，就遭来一顿训斥：“你吃那么多，怎么就没点儿力气？！”在那里他饱受虐待，强忍了四年多。

17岁时，他跳槽进入东京的火车制造厂当了一名工人。20岁时收到征兵令，当时母亲特别难过，父亲已于三年前病故，之后弟弟也因意外事故身亡，唯一指望的男孩儿这次又要应召入伍。母亲不知今后该怎样和四个女儿生活下去。

二、新兵教育的最后一关

1942年1月，沟吕木编入千叶县佐仓的部队，接受20几天新兵基础训练。2月上旬抵达驻扎在山东省泰安县泰山山麓的独立混成第10旅团第45大队本部，随后分配到第4中队第1分队的轻机枪班。后来又在距本部西南20公里日军占领的夏张村，接受两个多月的新兵训练。此间，沟吕木二等兵忍受老兵们的拳打脚踢及各种虐待。就在新兵教育尚未结束的4月上旬，混成旅被合并到新设的第59师团。

4月中旬，新兵教育进入尾声，早饭后班长命令：“轻装，广场集合！”沟吕木等第四中队的60名新兵手持步枪、腰佩刺刀，整齐地排列在广场上。他们由中尉中队长、少尉教官等长官带领来到相距两公里左右的河床地区。那里只是一片沙土并无砂砾，说是河，却无一丝水迹。上级命令休息，大家席地而坐。往前看，那里已挖好了一个长、宽各2米，深1米的坑。过了一会儿，他们看到从刚来方向几个老兵押着三个双手反绑的中国男人走了过来。三个农民衣衫褴褛，头发蓬乱，面容憔悴。沟吕木想起几天前，在中队本部的库房里那些“俘虏”投过来的愤怒目光。

三个人连在一起的绳子解开了，他们双手被反绑着坐在坑前。教官命令新兵：“全体起立！”他们听令排在三个男人前面，班长和任班长助理的几个上等兵站在新兵队列后面，左后方站着中队长和教官；坑后面站着几个端枪老兵，为的是防止“俘虏”逃跑。

沟吕木扫视三个中国男人，只见最右面30几岁、个子略高的男人愤怒之余全身颤抖、双目瞪圆怒视日本兵。一个老兵欲去蒙上他的双眼，他摇头表示拒绝；位于中间、30岁上下、不胖不瘦中等身材的男人也同样加以拒绝。只有左面那个50岁上下的矮小老头，给人以纯朴农民的印象，一再低头恳求教官，似乎在说：“俺就住在对面村子，家有妻儿老小，是个农民，什么都没干过，放了我吧！”但是没人搭理他。

中队长站到新兵面前，开始训话并发出命令：“这些家伙全是八路军，为了天皇陛下你们必须杀掉他们。到了战场，不敢杀人就不配当帝国军人。你们每个人至少都要给我刺上一刀！”接下来教官也说了类似的话。

沟吕木回忆当时的心情：“当时我也很可怜那个哭喊着哀求饶命的农民，然而事已至此，不杀他就会被人视为‘胆小鬼’、‘没出息’，长官看不起，就别想晋升。当时自己宽慰自己说，这群人反抗日军，当然该死！”

中队长和教官的训辞话音刚落，那个最右侧的高个子男人坐在地上高呼：“你们在这里杀掉我们，但我们后面还有四亿中国人民，日本帝国主义必败，中国共产党万岁！”三个男人都没有绑到木桩上，也都没有蒙上眼睛。干部预备生吉冈二等兵第一个受教官指名，紧握步枪冲向右面那男人，他的刺刀戳得很深，当他拔出刺刀，那男人倒向前面，口吐鲜血。就在男人痛苦挣扎时，别班的十几个新兵争先恐后地冲上来乱刺一通。男人全身血肉模糊，然而他仍睁大眼睛，狠狠地瞪着日本兵。

沟吕木说：“眼见这种凄惨景象，我当时手脚哆嗦不止，全身冒出冷汗。但立即鼓励自己，怎能输给那些家伙！心想：杀掉这些中国人，就是给天皇尽忠！”

正在踌躇中，只听班长喊：“沟吕木，磨蹭什么，快去刺杀！”沟吕木冲了上去，刺刀戳入中间男人的躯体。几乎与此同时又有六、七个人冲了上来。突然，反绑双手的男人“腾”地站了起来。就在此时，一个新兵的刺刀戳穿了男人的躯体，沟吕木也挥刀猛刺，男人终于倒伏在地，痛苦挣扎中掉入坑中，痛得满地打滚，鲜血染红了他那污浊的上衣。沟吕木强制自己止住打颤，跳入坑中，端起步枪，刺向那个男人的臀部。别的新兵也紧随其后跳入坑中，没头没脑地刺杀那个痛苦挣扎的男人。

沟吕木眼含泪水，常常嘴角抿得紧紧地说：“我还记得那个中国人虽然满身是血、全身抽搐，但是一直怒目圆睁，紧瞪着我们。”他继续说：“当时根本没有考虑中国人的死活，满脑子装满了军国主义思想，认为自己来到中国受苦，全怪这帮不听日本人支配的家伙。当然也有‘自己要保命’、‘要升官’、‘要为自家争得好名誉’等想法。就这样，虐杀了那三个中国人。之后，将他们草草地埋掉。”

三、我们被统治者当枪使

新兵教育结束后，沟吕木多次参加村庄扫荡等各种作战。日本战败后，沟吕木成为前苏联的战俘，在西伯利亚拘押五年。1950年7月转押至抚顺战犯管理所。

沟吕木说：“开始我一直认为自己全是奉命干的，战争中的事我没责任。因为我们全被军国主义思想洗了脑，说那是一场‘正义的战争’”。

然而，经过抚顺的学习，尤其在后来掀起的认罪坦白运动中，沟吕木经过认真思考，渐渐认识到“自己确实干了对不住中国人的事”。他每天反复这样思考，竟患上了失眠症。常常是恶梦缠身，梦见被自己刺杀的人追得团团转。但是，他始终害怕：“要是说出实情，就会判死刑。”一年多一直处于苦恼之中，已经瘦得失去了人样。最终他觉悟到：“就是被判死刑，我也认了”，将刺杀活靶子靶子等罪行诚实地写在坦白书上。

“面对那些被杀害的遗属，必须坦白自己曾经犯下过滔天罪行……，怎么能说与自己无关？！”

回首往事，他不停哽咽，几次话到口边却说不出来。待心情平静下来后，他说：

“我自己也出身在贫苦农家，受尽虐待，然而我却去虐待那些更加痛苦的中国人……。同是在贫困、受尽虐待中走过来的人，互相敌对、互相杀戮……真是不可饶恕。当时……我们完全不懂得这些，我们被统治者当枪使了。来到抚顺后才真正明白了这一点。”

**第三部　为了发迹？为了天皇？还是为了宣泄私愤？**

**第一章　南京大屠杀及三光政策——不可饶恕的罪行（永富浩喜）**

在东京都杉并区养老院的一间房间里，永富浩喜（别名博道 ，84岁 ）坐在床端，76岁的夫人躺在床上。永富曾因患脑梗塞两次病倒，现在也只能勉强行走。妻子患糖尿病，加上得了白内障，双目几近失明。永富一边照顾体弱多病的夫人，一边对我说：“老伴儿讨厌我对他人谈起在中国的往事”。

去年（1999年）12月，永富做了一次久违的演讲，内容是关于战争的自身体验。他坐着轮椅、双手合掌出现在讲坛。他说：

有人说：“南京大屠杀是捏造的！”但是，当时我就在南京亲手杀过中国人，许多屠杀也是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在各位面前宣讲自己的罪行，正是我生存下来的使命和意义之所在。

回忆起很久以前的往事，永富好几次眺望着遥远的天际，哽咽得说不出半句话。他在为自己过去的行为而懊悔和呜咽。

一、在南京，第一次杀人

永富1916年3月生于熊本县阿苏町，家里在站前经营一家旅店。他是老大，下面有五个兄弟姐妹，自幼就体弱多病，父亲又实行彻头彻尾的斯巴达克式教育，并再三再四地教导他：“世上最伟大的是天皇陛下！”

13岁，永富随家人搬迁到受日本统治的朝鲜平壤。17岁，中学毕业，只身回到本土东京，1934年考入国士馆专门学校（今国士馆大学）。永富在国士馆师从一贯主张“忠君爱国”的熊本同乡蓑田胸喜教授。经其介绍，逐渐与许多当时的右翼名人相识，曾七次登门拜会日本右翼大人物——头山满 ，最终成为头山满的门徒，坚定了自己的军国主义思想。

1937年12月，作为“爱国学生联盟”的国士馆代表，永富与其他11所学校的代表一起，参加了自上海至南京的“视察慰问旅行团”，并于12月下旬来到南京。

永富回忆当年说：“令人吃惊的是，随着列车接近南京，铁路沿线中国人的尸体逐渐增多。有一天，我们被带到南京难民区（安全区），时值寒冬腊月，眼见的都是些身穿粗布衣服，横卧水泥地的中国人，以及为领取‘良民证’而彻夜排队的中国人。那时，我心想：正是因为你们反抗日本军队，才得到这样的下场，活该！”话说至此，永富饱含热泪地说：“当时我丝毫没有可怜、同情中国人的念头。……”

就在这个难民区，一个日本军官向200多名中国人喊话：“皇军已经入城，你们不必再担心。日军给你们发放‘良民证’，让你们自由回家。你们当中如有国民党军人，请站出来，其中一定有不少人被蒋介石骗了，几个月都没领到军饷。我们可以支付给你们这些欠饷，并且可以帮你们找到工作。”立刻有七、八个中国人站出来表示愿意随行。军官命令他们上卡车，并让东京来的学生代表也一同跟上。

敞篷卡车上拉着七、八个中国人，以及十二、三个日本的学生代表，还有刚刚带队来的军官及其三个部下疾驰而去。在车即将到达下关码头时，日本士兵突然双手紧抓钢盔，胡乱地砸向坐在车里的中国人，中国人都紧缩一团，忍受毒打。一切发生得太突然，把永富他们都吓了一大跳，但他们也对此无动于衷，只是一群旁观者。

中国人在下关被推下卡车，被带进一个用苇席圈起的围子里。然后通过一个狭窄的通道，两侧堆放着几千具冻僵了的赤裸尸体。他们走过二、三十米地段，来到长江边上。一座铁桥已被拦腰炸断，可能是日军轰炸所为。

带队军官向永富等学生代表说：“这群中国人，你们想怎么杀就怎么杀！”学生里真有不少空手道和柔道的高手，其中几人立刻猛扑上去，对中国人随意拳打脚踢，狠狠摔打，但还是没能杀死这些中国人。永富说，此时他没有动手。

过了一会儿，军官让一个中国人跪在前面，抽出战刀向永富他们说：“喂！你们给我好好看着，下面我要进行斩首表演，你们把这里的见闻带回东京去吧！”军官绕到那人身后，“嘿”了一声，挥刀砍下，人头应声落地，井上鲜血喷涌，身子“扑通”一声向前倒下。

眼见这种惨状，后面有一个中国人突然跑向炸断了的铁桥，从桥上跳入江中。永富当即向日本兵借来步枪，登上铁桥，瞄准露出水面的中国人开枪，中弹的中国人身上血流不止，顺水漂向下游。

永富对我说：“开始我吓得直打哆嗦，但我好歹也是国士馆的剑道四段选手，不能让别人说我胆小，……就把那个中国人给干掉了。”话说至此，他已紧闭双眼，狠咬双唇，只听他“呼”地一声吐出一口气，脸颊划出两道泪痕。他沉痛地说：“剩下的中国人也全给杀了。只是怎么也想不起来是怎么杀的他们。”

二、志愿去刺杀俘虏

永富1938年1月回到日本，随后又立即返回上海。他合上双眼，吟诵着当年的诗句，以表达当时的心情：

一苇仅西航，

即可通大陆。

…………

月自东洋照西洋。

月自东洋照西洋。

之所以重返中国，是因为他坚信：“惟有天皇陛下领导的神国日本，才能支配亚州乃至世界。惩治反抗我们的中国人，当属我辈之使命！”虽然当时他接到学校通知，要他返校参加毕业考试，但他认为“当此国家之关键时期，毕业与否又算得了什么？”并没有回去参加毕业考试。但因他文武两道成绩皆佳，作为特例，校方还是给他发放了毕业证。

自1938年2月至1940年底，永富在上海、吴江、安庆等地的特务机关，以军中文职人员身份从事“收集情报”及“群众工作”。有时，他也参与棍棒殴打、绳子吊人等拷问。

1940年底，永富回了一次熊本老家探亲，两个月后，再次重返中国。1941年4月，在驻山西省河津县的第37师团第37旅团第三大队第三机枪中队接受了三个多月的新兵训练。训练结束前的最后一课，便是刺杀捆绑在木桩上的两个中国人。

中队20多个新兵中，长官经常夸奖道：“永富最优秀！”可能是由于常被夸奖的自豪感，他自告奋勇地第一个上去，刺穿了中国人的心脏。

当我问他：“那时你是怎样的心情？”永富一直低头望着地面，渐渐地呼吸变得急促，痛苦地说：“那种事……说不出口！太残酷，太残忍！……不！那情景远远不是用残酷、残忍可以描述的！……”滂沱般的泪水夺眶而出，他边摇头边摆双手，示意我再不要问那段往事。

三、忠实执行三光政策

在山西省境内，永富的工作先后换了三次：1942年初至1944年1月，任职于第37旅团司令部情报室；1944年2月至1945年1月，任职于霍县保安大队四县联合联队；1945年1月至8月日本战败，任职于第五独立警备队第27大队本部情报室。

此间，他经常率二、三十个部下组成永富小分队横行于山西境内。他回忆当年说：“那时上级命令我：‘在敌性地区（抗日根据地），只要见到中国人就给我统统杀掉！’”永富在被日军圈定的抗日根据地，推行有组织的“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日军称为“烬灭扫荡作战”），成为这种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的忠实执行者和指挥者。

1943年10月，永富突袭山西省沁源县自强村，将11个妇女和孩子推进屋子并投入干柴，点燃后用大石头堵住门口。当时烧死8人，3人幸免于难。生还者中有一名叫党翠娥的女人，在永富被捕后的1956年6月，在太原的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出庭作证。当时的录像还保留至今 。她嚎啕痛哭，控诉永富等人烧死包括她的两儿一女和两个侄女共8人的残暴罪行。永富跪在地上，泪流满面，再三再四地表示谢罪。

永富饱含热泪地对我说：“那女人说的话我完全明白，那种痛苦我也完全能够理解。无论我怎样谢罪，死去的孩子终归难以复生，我真是太愧对她了!”

就在那时，永富他们在一个小村庄里以“共产党员特工”嫌疑，抓了两个20岁上下的女人，他命部下在田里挖个方形坑，将两个女人推入，两个女人似乎早已下定决心，在坑中闭上双眼、嘴里念念有词。永富等人一锹锹地向坑里填土，两个女人被活埋于坑中。二人完全没有哭喊，只以无比憎恨的表情，视死如归，勇敢地走完了她们的人生。

当时，永富小分队在闻喜县和绛县，经常抓中国人，人数从几人到20人不等，均以抗日嫌疑分子的“罪名”关押在地牢里。每次提审，这些人都要遭到棒打、鞭抽，甚至用烧红的烙铁烫、灌水后猛踩腹部等酷刑。永富证实：“经过这样酷刑折磨，这些人的身体已极度虚弱，我便命令把他们拉出去枪杀”。

作为“三光政策”的执行者，永富小分队在山西境内的敌性地区（抗日根据地），无端袭击村庄并残酷杀人。他亲手杀害和命令部下杀害的中国人竟多达300余人。现据法庭庭审记录，将永富所犯的部分罪行介绍如下（均在山西境内）：

（1）1943年3月，闻喜县。在南白石村拷问、杀害村民12人，在盖寒村杀害13人，在元凹村杀害8人，在汾村杀害5人，在界元村刀砍32人，其中杀死29人。

（2）1943年2月，在闻喜县峪口村，永富亲手用刺刀挑死3人，部下以同样方式杀害了5人。

（3）1943年3月，在闻喜县横水镇，永富拷问1人后，又将其拴在马车后部拖着跑，最后命部下将其枪杀。

（4）1943年10月，在沁源县正中村，杀害10余名妇女和儿童。

（5）1944年10月至11月，在霍县朱家村和李润村，永富亲自拷问并杀害各2人，在贾孟、张望、靳壁三村，每村杀害1人。

（6）1942年冬，在闻喜县小山村，永富拷问一男子时，将烧红的铁棍戳入男子胯下，烧掉其阴茎，加以杀害。

“我真是犯下了滔天罪行！”永富说着说着，沉痛地低下了头。

永富说：在某一段时期，确实奉长官之命，彻底推行“三光政策”，其他日军也都这么干过。

四、每天内心都在斗争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此时永富心想：“从今以后才算是真正为天皇而战，怎能就这样回到日本呢？”为了响应天皇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号召，他在中国留了下来，协助山西阎锡山部队与共产党军队作战。

1949年10月1日，共产党军队解放了中国本土，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永富于翌年12月在山西太原被捕，关押在河北省永年的训练团。1946年结婚的妻子带着两个女儿也一起关在另外的建筑物内。

永富在那里，除每天学习历史和世界形势外，还干些搬运砖瓦等简单的体力劳动，有时也在关押者之间展开相互讨论和批判。但是，中国为帮助日本罪犯找回人性所进行的教育，对永富等人所谓的铁杆“忠君爱国”主义者却很难奏效，他们根本不可能坦白自己的罪行，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几乎没有吐出过一字半句。

永富谈起当时他的心境：“当时，我认定自己杀害很多中国人是为了天皇，自己才是真正的国士，根本没有什么罪恶感。在永年，我的思想与以前几乎没有什么变化。”结果，永富被转入罪行深重且反省态度恶劣的“直属中队”。1952年12月某日，以永富所在的直属中队为主体的130多名顽固分子被召集到广场。永富第一个被点名，当场被带上了手铐，随后又有几十人被带上手铐。他们立即被转押到太原战犯管理所。

永富在太原战犯管理所里并不从事劳动，只是组织战犯们学习社会结构和历史等方面的书籍。与此同时，要求他们写出自己在中国所犯罪行的材料上交，即要求写坦白材料。

永富对我说：“当初我想：我确实杀了许多中国人，但我觉得自己是国士，是在向天皇尽忠。完全没有罪恶感。”

一方面，此时永富尚未真正认识到自己犯下了滔天罪行，同时也因为他的罪行太多，很难回忆起具体细节，他仅仅敷衍塞责地想到什么写点儿什么。管理所一次次要求他重写，但他极不情愿、十分苦恼。

尽管永富冥顽不化，然而随着岁月的推移，他那冰冷的心灵终于被指导员和班长的忘我帮助而融化。他开始点点滴滴地、客观思考自己的罪行，渐渐理解了中国人的痛苦和忿怒的原因。当他回首往事，一件件地仔细回忆自己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禁不住为自己所作恶多端、罪行深重而震惊。他不由得悔恨交加，终日以泪洗面。

每天内心都在斗争，过去我接受了彻底的军国主义教育，并以其指导自己的言行多年，实在是冥顽不化，当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转变过来的。我想，太原的认罪，也只能算是自己所迈出的第一步。

永富自我剖析道。

如前所述，永富于1956年6月被起诉，中国政府给予宽大处理，判处他13年监禁（自逮捕之日算起），随后被转到抚顺战犯管理所服刑。在抚顺，他进一步学习改造，于1963年9月释放回国，时年47岁。

五、终生认罪，不断学习

永富于1963年回国，妻子和三个女儿也早已于1953年回到日本，他必须承担起家里的生活负担。然而，由于他不懂技术，而且还被警察扣上“被中国共产党洗过脑的危险人物”的大帽子，常常受到监视，致使他不得不经常变换自己的工作。为了能有个安定的生活，经过刻苦努力，他终于取得了针炙师资格，并在东京都杉并区开办了一所针炙治疗院。

永富回到日本后，立即与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简称“中归联”）的伙伴们一起，在日本各地巡回演讲，谈自己在战争中的真实体验。永富说，不允许再有人被造就成像自己这样的军国主义分子；不许任何人再发动侵略战争。

与此同时，他也为自己的认罪意识远未达到自己满意的深度而极度痛苦。于是永富从1989年3月6日开始，踏上了遍访日本各地数百名“中归联”伙伴的漫漫旅途。他利用自己良好的体能和快速的行动能力，肩背几十公斤的大背囊，从北海道出发，一天又一天地走访“中归联”的伙伴们，与他们尽情交谈：“我们的战争责任是什么？”、“我们该如何认罪？又该做些什么？”

遗憾地是出发两个多月后的5月6日，在新潟县内准备走访第57人的途中，由于他上台阶时不小心扭了腰，不得不中断此次的走访计划。

1991年10月，他和曾经一同被关押在永年和太原的汤浅谦 等人，访问了“太原解放纪念馆”。这次他还带上了自己的小女儿，希望她也能了解自己在中国所犯下的种种罪行。

他向慰灵碑献上自己早在日本写好的“谢罪书”，一边历数自己在山西的累累罪行，一边泪流满面地向亡灵们谢罪。同行的汤浅如是描写当时的情景：“看上去永富真的很痛苦，他的认罪确实是发自内心。也许是由于他紧张兴奋过度，回国前他多次口吐鲜血，被送到了医院”。

1963年刑满释放回国前，永富曾去南京参观，并从那里带回六、七颗石子，至今仍珍藏在玻璃瓶中。他边拿给我看边说：“我曾在那里犯过罪，为了使自己终生不忘那些罪行，我带回了这几颗石子。”他又说：“每当我遇到困难，就以这些石子来鼓舞自己。”并表示：“最近我准备与中归联的伙伴们到中国去，要把这些石子带回中国去。”话说至此，他的眼睛放出了异样光彩，脸上露出了难得的富有生机的微笑。

如今，这位老人已经很难走出这家养老院，但是，他仍盼望用自己的双手捧回这些石子，给自己人生画上圆满的句号。

**第二章　我为什么那么狠毒？（久保田哲二）**

我于2000年12月和2001年6月，两次造访现居广岛的久保田哲二（82岁 ）。久保田对我说：“我找到了过去中队的《阵中日志（摘录）》，以前一直含糊不清的、那些往事的发生地点和具体时间，现在大体上弄清楚了。”

时间已经跨越55余年，对于那些过去所参加的数不胜数的战斗和村庄扫荡，以及战争中的各种体验，因记忆的丧失混乱，记错之处实属难免。下面就根据久保田的会议以及《阵中日志（摘录）》等资料，对当时的情况稍做回顾。

一、“别烧我的家呀！”

1919年3月，久保田生于广岛县高田郡深山里的一个贫穷农家。兄弟四人，他排行老二。高小毕业后虽想升中学，却因家中贫穷未能如愿，但他有幸升入官费的“吴市海军工厂教习所”学习电气设计。四年间，他被彻底灌输了以天皇为中心的军国主义思想。毕业后，他又作为军舰电路设计描图员，留在那里工作到20岁。经征兵体检，他取得优秀合格资格。1939年12月，编入广岛步兵第11联队，接受三个月的新兵教育。这段“教育”，将他过去所具有的人类良知驱散殆尽，被灌输的是“时刻牢记长官命令就是天皇命令！”之类的信念。

1940年4月，久保田来到中国汉口，被编入第39师团231联队第一大队第一机枪中队 。

自1940年4月20日起的三个月间，久保田担任师团警卫员，参加了宜昌战役。此次作战，日军烧光了自宜昌至荆门沿途100多公里道路两侧的所有村庄，使其化为一片灰烬。久保田也曾临时加入“放火班”，四处放火，将两名妇女和一个婴儿推入房间，活活烧死。在同年11－12月的汉水战役中，日军因粮食补给中断，战斗中烧杀掳掠，更加猖獗，许多村庄全被烧光。就在此次战斗中，久保田冲入一家，开枪射杀一位没能逃走的50多岁男子，抢走了他家的家畜和粮食。

久保田回首往事：“当时，在与中国军队作战中不少战友战死，很多战友负伤，自己也饱受肩负重担连续行军之苦。所以一肚子怨气，全都撒在中国人身上，根本不觉得中国人可怜，也没有一点儿负罪感。”

久保田的这种经历月积日累，最终使他成为日军中颇受赏识的一个“好军人”。

二、“还我男人！”

1941年8月27日，驻扎在湖北省荆门县李家镇的大队本部派第一机枪中队的24人出去侦查“敌情”，在黄家店附近遭中国军队伏击，三人战死、多人负伤。久保田并未参加此次侦察，但他接到大队本部的报复命令，参加由中队和大队本部战士组成的23人小分队，于9月9日清晨，偷袭了距驻地不远的赵家店。他们逮捕了包括保长彭亚全在内的五个男人，将他们带回大队本部。其实，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无人与前述伏击有关。

此时久保田已被提升为兵长，和担任翻译的北村（假名）上等兵负责审讯彭亚全。彭亚全是一位品位高雅的知识分子。久保田先请他喝酒，待他客气，盼他顺从，然后请他翻译抓捕时顺便拿来的旧文书，但彭亚全始终不予配合。这时，久保田发现文书中缺少一页，便让彭去洗澡，趁机翻看他的衣服，但未能找到。久保田断定：彭将这页文书吞掉了。久保田以“彭乃伏击日军之首谋”罪名，将他押送到荆门的师团司令部。久保田回忆当年说：“虽然不知后来结果怎样，但他想活着走出师团司令部，却是难于上青天。”

一起逮来的其余四人，由久保田兵长、横田（假名）伍长、北村上等兵等10余人进行拷问。虽说是大队本部，但实际上是强占的民宅。他们关起大门，在院中一角，一个个拉出来痛打。新到任的横田伍长虽然军衔最高，但现场的拷打却是由经验丰富的久保田担任指挥。

首先拉出一名“俘虏”，将他五花大绑，捆在拆下的门板上，不得动弹。其余三个“俘虏”全都叩头央求道：“我们只是一介农民，什么都不知道，快放我们回家吧！”久保田哪肯听这些，命令部下“打桶水来！”给绑起的男子强行灌水，待他肚子胀起后，再猛踩腹部，让他吐出。如此折磨得中国人已瘫软无力，全身犹如落汤鸡。久保田又用自己擅长的电刑进行拷问，希望获取情报，然而四人只是一口咬定：“什么也不知道！”最终，久保田等人一无所获。

杉山大队长听过整个审问过程后说：“既然人已如此拷打，不好再放掉他们了。你们设法处置吧。”当时，军队用语中“处置”就等于“杀掉”。久保田等人将第一个“俘虏”带到大队本部西面的凹地，那里已有十几个日本兵在等看“热闹”。一个名叫谷口（假名）的卫生见习士官说想做一下注射空气试验，男子被捆绑在门板上，谷口将注射器里的空气一点点地注入他的血管里。几分钟后，男子的全身变成紫色，痛苦挣扎。很快，人就变得如同一个紫色的胶皮人，“哈、哈”地口吐粗气。这时，横田伍长再也看不下去了，他瞅瞅久保田，下令：“算了！给他一刀！”久保田应声“是！”举起刺刀，向那人的心脏捅了几下，将其杀害。

“当时捅了好几刀，因为不知道仅仅一刀能不能刺到心脏。……” 如同许多老兵作证时一样，久保田拼命压制着内心的慌乱。他作证时，强忍着泪水，足有十几秒钟憋得说不出话来。

杀死头一个“俘虏”后，剩下三个被带到离大队本部不远处的一个小山丘，那里已经挖好足有一米多深的坑。久保田担当警戒，三个“俘虏”分别由谷口卫生见习士官生、横田伍长、增田（假名）兽医伍长三人用日本刀斩首后埋入坑中。

几天后，五个男人的妻子带着子女，跟着卖东西的小贩频频来到大队本部，哭着央求道：“还我男人，不然我们就要饿死了！”久保田也有几次，通过翻译欺骗她们说：“你们的老公都被送到司令部去了，马上就会回来。”那些女人仍不死心，还是每天来。没过几天，四具埋在坑里的尸体被野狗刨了出来，被撕扯得七零八落。

久保田说：“至今，那些随处可见、四处散乱尸骨的场面，仍然常常清楚地浮现在我的眼前。”接下来他又说：“我直接面对遇害者的家属，听到她们的请求，这是唯一的一次。当时，我也想过丈夫没有回家，她们一定难以度日，确实很可怜。但是，我并没有想得更多更深。”

三、走漏风声可就完了

1944年4月，从第39师团的精锐中抽调出包括久保田在内的60余人，编成第11军直属挺进队（时称“樱花小分队”）。当时，编制这支部队的目的是：一旦湘桂战役打响，便可命令他们潜入敌后，从事搜集情报、配合策应等工作。湘桂之战的最大目的，在于歼灭国民党的空军基地，以阻止美国空军由此起飞，对日本本土实施空袭。此外，湘桂战役的目的，还在于打通湖北、湖南、广西各省，直到接通越南的补给路线，以确保日军海、陆两条补给线的安全可靠。

樱花小分队共有98人，其中日军65名、南京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军20人、其他伪军13人，他们全都接受了陆军中野学校出身将校 的特殊训练，常常潜入中国军队后方，从事暗杀侦察活动，不断制造混乱。据久保田说：7月以前，小分队时而全副日本装备，时而全副便装，时而又身穿国民党军服，没个定着。但到了8月，上级命令全副国民党军队装扮，深入敌后展开行动。上级严令：“这一切均属无视国际法的行为，不能当俘虏，必须自杀！”

这些中国伪军，几乎全是来自战斗中被日军俘获的俘虏。一天，久保田问其中一人：“你为什么当了伪军？”那人回答：“我在俘虏营里再也待不下去，那里环境恶劣，干活太重，与其等死，还不如选择这条路。我也是实属无奈！”老婆孩子已被日军扣为人质，久保田说：“他决不敢背叛我们。”

樱花小分队又分成两个行动小组，久保田军曹担任其中一个小组的组长。1944年6月16日，“樱花小分队”全队日军装备，出动60余人，为解救被围困在湖南省长沙附近的日军而急行军，由于夜深迷路，闯入附近一家民宅，抓来一个50岁左右的农民带路。久保田说：“至今我仍清楚记得那人走出家门时，他家人一张张担心恐惧的面孔。”那人顺利地带领“樱花小分队”脱离了困境，但由于担心他会走漏风声，天亮时分久保田说：“你辛苦了，我们放你回家，我告诉你该从哪里走，”将那人带到一处空房里，令部下从背后将他刺死。杀掉带路人是奉队长之命干的，把那人拉到别处杀死，只是为了不让小分队的中国人看到而已。

说到这里，久保田眼噙泪水，凝视远方，嘴唇在不停地颤抖。

四、“日本鬼子”

1944年7月10日，湖南省来阳县。为营救陷入苦战中的日军，樱花小分队全都装扮成国民党军队奔赴战场。傍晚，久保田等60多名队员为了宿营，进入一个村庄。村民几乎逃光，只有五个50岁上下的女人，或许是为了看家留了下来。

她们以为这60余人是国民党士兵，用中文说：“你们辛苦了！”端茶倒水，忙前忙后，并将桌椅搬到院内，非常热情。樱花小分队每遇到这种情况，总是由队里的中国伪军出面讲话，日本士兵则沉默不语。队员60余人全住在一间空房里，让那五个女人住到相距20几米的一间房里，哨兵通宵达旦地监视着她们。

次日凌晨，小分队出发前，中队长和小队长商量：“也许她们已经看穿了我们的身份”，“为了安全起见，还是把她们干掉！”八、九个日本老兵受命留下，中队长带领其他人先走，并约定好事后会合地点。久保田受命担任现场指挥，按照小队长所指示的办法，负责“处置”那五个女人。

五个女人被带到院子，久保田用日语对几个年龄相仿的日本老兵小声说道：“这几个家伙要干掉，扔到井里！井里！”边说边示意院子一隅的水井。老兵们若无其事地答了句“明白！”突然猛虎般地扑向五个女人。小队长见此，向久保田说了声：“干完了，就马上追上来！”先一步走了。

老兵们对那五个哭天喊地的女人拳打脚踢，并把她们强拉到井边，头朝下地倒着扔了下去，接着又将几块大石头投进了水井，最后又扔进许多干柴草以遮挡视线。他们之所以不动用刀枪，是因为这一带常有国民党军队出没，不能留下半点杀人痕迹。时至今日，久保田仍记得那口井非常气派，口径有一米半、深十多米，单说井台就足有半米高。

事后久保田等人立刻追赶小分队。见到中国队员也佯装无事。至于中国伪军是否对此有所察觉？久保田说无从知晓。只是他们从来不会当着中国伪军的面，干出这些虐杀中国平民的勾当。

五、一位抗日地下工作者之死

1944年11月，日军在湘桂战役中占领了广西省柳州市。当时柳州市内有许多来自湖南和广东的逃难者。不久，日军的军事设施和粮秣仓库接连失火。此时，樱花小分队在柳州宪兵队的指挥下，在市内搜索地下抗日分子。每晚，市内各处都有队员把守。

12月20日后半夜，久保田军曹带领三、四名部下正在守候一处，突然发现一个人影从一家院子的地窖里钻了出来，久保田等人立即将其逮住。用手电筒一照，发现是个20几岁的男人，目光炯炯，怒目圆瞪。从他身上搜出一小瓶汽油和火柴。再搜查他的藏身地窖，除汽油外还有一部介绍革命的厚书。书中夹着一张照片，是怀抱幼儿的妻子、上了年纪的双亲和他本人的五人合影。久保田回忆当年说：“当时我心花怒放，心想：这小子可是条大鱼，若能搞出些重要情报，一定能得上个大勋章！”。

审讯在宪兵队大楼里进行，久保田也曾参与 。男子对于所有问话都沉默不语。久保田握着手枪，怒吼：“你不想死就赶快跟我们合作，告诉我们是谁指使你干的！”这时，那人开口说：“逼我干的正是你们日本军国主义!你们在我们中国烧杀掳掠，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我怎能保持沉默？”竟然遭到一贯没放在眼里的中国人的当面辱骂，久保田怒火中烧，劈头盖脸地将那人打倒后，仍然不停地又踢又踹。

次日，宪兵出面再行拷问，那人依旧没有吐出有关地下抗日组织的半点消息。就在这天下午，又从宪兵队的窗子看到冲天火焰在日本军事设施上升起。那人第二次开口：“不久我将会被你们杀死，但是中国人是杀不尽的。用不了几个月，你们这群日本鬼子就一定会灭亡！”

最终，日军未能从那人口里得到一点儿情报。上级命令久保田，将那男人从宪兵队带出干掉。久保田率一名部下将那男人押到柳江边，那人大义凛然，双目凝视远方，早已下定必死的决心。久保田手握匕首，猛刺那人心脏，男人满身鲜血，气绝身亡。久保田和部下将尸体抛入江中。

六、为何那么狠毒？

1945年日本战败后，久保田关押在前苏联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卡拉干达，后于1950年7月被转押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在这里，久保田表面装得老实，但决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泄露樱花小分队的半点消息。他回想当年说：“当时我想一旦樱花小分队的罪行败露，最先枪毙的肯定是我。”当时抚顺战犯管理所里的樱花队队员，除久保田外还有三轮敬一（小队长，已故）和三村几马两个人。因为两人与自己不在同一行动小组，久保田相信他们并不清楚自己的所做所为。所以，他认为只要自己保持沉默，就一定能够蒙混过关。

然而，原本冥顽不化的久保田，在与推行人道主义的管教人员的接触中，内心深处沉睡良久的人性逐渐被唤醒。他在认罪学习过程中，为自己所犯罪行之多、之重、之惨而感到震惊。他逐渐能够理解那些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悲伤和痛苦。他说：“当时我每天都陷入极度的苦痛之中。”后来他想：“枪毙就毙吧”，下决心将一切都写到坦白书里交上去了。他说：这一切，完全没有管理所的任何压力，是真正的自觉坦白。

对于自己曾经犯下那么多滔天罪行的根本原因，久保田作了如下总结：

这当然不能全都归结为天皇的命令。就我自身而言，总有一种功名心在作祟，一方面希望得到他人认可而真正地出人头地，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够光宗耀祖、为父母尽孝。此外，对中国人的民族歧视，也是随意烧杀掳掠的根本原因。所有这一切汇聚到一起，使得我们这些日本士兵在接到命令后，心狠手辣，不顾一切，真是丧尽天良。

如今，久保田以《阵中日志（摘录）》的记述为线索，一件一件地回忆起自己曾经参与过的桩桩罪行。他说：“今后我将不断地思考：为什么自己会频频犯下那么多滔天罪行。永远、永远……”

**第三章　强奸就像家常便饭（金子安次）**

当时骂中国人是“中国猪”，把他们看作劣等民族，加以蔑视。我想：这群“中国猪”竟敢反抗拥戴天皇的优秀日本民族，是可忍熟不可忍！这场战争真正是为了天皇、为了国家、为了父母兄弟姐妹的正义之战。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就是受这种教育长大的。我在日本真的是一个善良的国民，是一个爱国者，并非一个天生的大坏蛋！

金子安次（现住东京都，81岁 ）涨红着脸，挥动着手臂，对我说。

2000年12月以日本的非政府组织（NGO）为中心，在东京召开了“女性审判国际战犯模拟法庭”。法庭上，金子为自己亲身经历的性侵害及从军慰安妇等作证。旁听席上，许多曾遭受过日军暴力侵犯的各国妇女在凝神旁听。

金子在证词中说道：“当时心想：反正这些女人都要迟早被杀掉，强奸几个‘中国猪’有何不可？这种想法，导致我们肆无忌惮地实施强奸。”

一、逃离贫穷

1920年1月，金子生于千叶县浦安的渔村。兄弟姐妹共七人，金子在兄弟中排行第二。父亲虽以捕鱼为业，但却难以维持生计，不得已租来三反土地，全家一起耕作，勉强度日。当时，并非金子一家生活如此艰辛，左邻右舍也都一样。

金子从上小学就一心想参军，简直达到如梦如痴的地步。教科书里满篇神话，将大和民族描绘为多么多么优秀的民族，学生们被灌输“天皇乃神”的教育。

小学毕业后，金子因家境贫穷不能继续升学。不久，到表姐婆家在东京经营的铁匠铺里当学徒。金子每天到处收购碎铜烂铁，经加工再出售。他干了不到两年就嫌弃这种工作，仍然日夜思念着参军。他瞒着父亲拿到一份“陆军士官培养学校”的入学申请书，边读函授边准备考试。

他追忆当年说：“我本想继续升学，只因家境贫寒难以如愿，所以想通过当兵，出人头地。”

父亲终于知道了他的所作所为，将他叫回老家，撕掉入学申请书，并把他痛打了一顿。父亲责问他：“你为什么要去当兵？我可不许你去！”几年前，父亲曾被征召，在兵营里受尽毒打、欺辱；不久长子又应征入伍。对于父亲而言，本来生活就极度穷困，战争又将自家的最好劳力掠夺一空。父亲严令：“你休想当兵！给我找些正经事干！”金子无奈，只好又回到原来的铁匠铺干到20岁。四个姐妹小学毕业后都去当了女佣。金子有气无力地说：“家里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减少几张吃饭的嘴。”

20岁时金子参加征兵体检合格，出征前向母亲保征：自己一定升为上等兵才回来。母亲闻后，板起面孔说道：“傻瓜！我才不要什么肩上的杠杠，你少给我生死硬拼，我只要你活着回来！”当时，金子很瞧不起母亲，心想：“怎么能讲这种话呢？这还能算是日本国民么？要真那样做，必将被打入另册，脸面丢尽。”

“其实母亲说的是对的。但在当时，我却完全不能难解。”

二、一心想当个“好兵”

1940年11月，金子和一批新兵抵达中国山东省兖州。他被分配到独立混成第10旅团第44大队第一中队重机枪班，并在那里接受为期三个月的首期训练。每天从早到晚，被班里的上等兵和老兵们殴打。没挨打的日子，也只有入队那天和打预防针后发烧的三天左右。挨揍的理由名目繁多：“动作太迟钝了”、“衣冠不整”……真可谓随手拈来，胡编乱造。最难熬的是被钉有大头铁钉的军靴底扇耳光，嘴里都被打碎了，饭菜也难下咽。“他们的打人逻辑是：军人如同战刀的刀刃，全靠打造。只有打，才能硬！简直没有半点人性！”

三个月的新兵教育结束后，部队于1941年4月向莱芜县的山区移动，进行所谓的“教育讨伐”。日军的日常口粮，全靠掠夺沿路的村庄，每到一处宿营，那里就被彻底砸烂，洗劫一空。

五、六月份的某一天，就在这种“教育讨伐”中，他们占领了一个村庄。长官命令：“新兵集合！”班里的20几个新兵立即在广场列队。只见教育组的上等兵们带来三、四个农民打扮的中国人，他们被一一绑在旁边的树上。看上去，这几个人像似正在田间干活的农民，年龄不一，在20—60岁之间，很明显，是要拿他们进行刺杀活靶子演习。几个男人的眼睛并未蒙上，每个活靶子的十米开外，都排队站着五、六个新兵。

只听一声号令“上刺刀！”金子他们便将挎在腰间的刺刀插入三•八式步枪前端。“冲锋！”号令一响，新兵依次冲了上去。他只记得，他们组的那个“靶子”是一个五、六十岁的老汉，还没轮到，他的腿已开始颤抖不止，轮到他时，为了给自己壮胆，他大喊“冲啊！”但当跑到老人跟前时，竟没了一点力气，根本刺不上去。只听教育组的上等兵怒骂：“你这个混蛋！还像个日本兵么？”连扇了他几个耳光，并命他“重来！”就这样，金子反复练习了多次刺杀活靶子训练。

金子回忆说：“当时，我吓得连看都没敢看那老汉的长相如何，身心处于失控状态，根本没有精力顾及那个中国人。”

三、机枪火舌扫向居民

新兵教育结束后，接下来“讨伐”不断，还参加过一些大型战斗。每当进村扫荡时，为了给人留下“那小子干得不错，有胆量！”的好印象， 金子在战斗中坚决服从老兵和长官们的命令。有一次，老兵们对抓来的男人进行灌水拷问，最后强灌滚烫的开水将其杀害时，金子也是施暴者之一。还有一次，金子和几个人一起扒光了一个女人的衣服，将其按倒在地。老兵向那女人下身硬塞进了浸满油的棉花，并将其点燃，女人在哇哇惨叫，老兵们却哈哈大笑……。

这一切，全都发生在1941年金子入伍不久的新兵时期。

金子所属第一中队驻扎在莱芜县的颜庄期间，一日接大队本部发来的命令：“八路军在莱芜与新泰交界处发动进攻，命你部歼灭之！”第一中队的80名士兵迅速于午夜12点出发，来到指令村庄不远处待命。驻扎在新泰县的第二中队从另一方向赶来，对该村形成包围态势。

金子推测：“该村约有300余住户，大概有600多村民。”整个村庄被四、五米高的土墙环绕，东西南北四面均有与外界相通的大门。金子所属的重机枪班，将重机枪架在距围墙二、三百米处。

东方泛起鱼肚白，日军向村中发射了一发掷弹筒，以示总攻开始。但似乎村里的八路军也早有准备，反击十分激烈，打得日军束手无策。在此情况下，第一中队的中队长下命向墙内发射十多发催泪毒气弹。毒气弹在空中炸开，烟雾覆盖了全村上空。

来自村里的反击停止了。此时三个大门早已被日军封锁，村民们只得从惟一的大门纷纷逃生。其中人多为妇女，儿童和老人，也有少数青壮年男子掺杂其中。上级命令：“逃出者全部杀掉，一个不留！” 金子担任弹药手，重机枪“嗒嗒嗒嗒”雨点般地射击，火舌扫向逃生的人群。这时，轻机枪和步枪也一起射击，村民接二连三地倒下，门前尸体堆积如山。据后来的战斗总结报告讲，现场尸体多达130余具。金子回忆当年说：“当时中队长指示：女人会生孩子，该杀！孩子长大后会反抗我们，该杀！老年人已没几天活头，随便怎么都行！”

四、投女入井

向村民扫射后，金子在老兵带领下进了村子，他俩一户一户地进行搜索。在一家泥土房里，金子他们见到黑暗的后间土坑上，坐着一位怀抱小孩的妇女，躲在角落里，惊恐地瞪着这边。此时老兵发令：“你到外面去警戒，我干完了就让你来干。”金子在门前端枪放哨。不久，屋内传出女人的哭叫声和老兵的怒骂声，过了一会老兵抓住女人长发，将她拉出门外。那女人约有二十五、六岁，一边哭喊，一边拼命反抗。老兵命令：“金子，过来！把这女人扔到井里！”当时，每个村庄都有几口供村民使用的井。老兵边喊金子，边把女人拽到不远处的一口井边，将其按倒在约一米高的井沿上。老兵命令金子抓住女人的脚，两人将那女人头朝下扔进了深井。只听见女人“哎呀”一声惨叫，接着“扑通”一声落入水中。原来老兵想奸污这女人没成，便气急败坏地杀死了她。

老兵和金子坐在井台上正在吸烟，刚才女人怀抱的四、五岁小男孩儿从屋里跑出来，边哭边喊“妈妈！妈妈！”围着水井转，孩子个子太小，还够不着井沿，又跑回屋里搬出一个小凳子，他爬到凳子上，扒着井沿儿，叫声“妈妈！妈妈！”后跳进了井里。老兵见状说：“这太可怜了，你给我扔个手榴弹进去！”金子投了一颗手榴弹，几秒后只听“砰”地一声巨响……。

金子憋了半天，痛苦地对我说：“孩子跳井，我也心痛……。后来，我自己有了儿孙，每当看到他们，眼前就会浮现出那个男孩儿的身影。”

五、你也干么？不？我不了

对于重机枪班而言，在袭击某村庄后，一般情况下是无需他们进村的。然而，一旦对方再无反抗，如前所述，老兵便会带着新兵，两人一组奔向村里。金子说：“老兵们的进村目的是找女人，他们是去寻开心。”我不解地问：“年轻女性不是早在日军到来之前就跑光了么？”金子说：“那是在山区。如果是平原的村庄，附近既没山，那些女人又多缠足，尤其是有孩子拖累的，怎能逃得远？为了保护家产，不仅是老婆娘，就是中年妇女，也有许多留了下来。只是成年男子都跑光了。”

老兵带着金子编成一组闯入民宅，看到有女人，老兵便发令：“你到外面去放哨！”他自己则在里面强奸。事毕后他也会说：“你也干么？”金子总是以立正姿势回答：“不，我不了”。通常老兵都只答一句：“啊！是么。”就算一切结束。

金子对我说：“新兵不能回答：‘是，我也想干，’根本没有说那话的资格”。真的那么做了，就会酿成大问题。回到部队老兵会说：“你这个臭新兵，牛什么？”免不了又是一顿毒打。新兵期间，金子从未有过强奸行为。他说“作为惶惶不可终日的新兵，连做人的基本欲望都满足不了，根本谈不上什么性欲。在我身边的所有人，新兵时期几乎都没有过强奸行为。”

六、强奸就像家常便饭

金子当兵第二年，他原属的部队被编入第59师团，金子本人则被编入第53旅团第44大队机枪中队。每当作战，他们便作为机枪分队派到步兵中队去参加战斗。

金子当上二年兵后，依旧帮助老兵们（当兵三、四年）强奸中国妇女。一天，几个老兵抓到一个没逃脱的男性农民，他们商量怎么杀死这个人？后来决定用铡刀铡。金子他们几个人帮助老兵将那人按倒在铡刀上，老兵像铡粮草似的按下铡刀，只听“噗哧”一声，男人人头应声落地。

金子当上三年兵后，开始和其他老兵一样，干起了强奸勾当。每当扫荡村庄，他们三三两两闯入民宅，手舞刺刀、口说下流话进行轮奸；或是带上一个新兵，令其在门外放哨，自己在房间里奸污女人。出来后，照样和新兵约定俗成地说些套话：“你也干么？”“不！我不了。”“啊，是么。”

如前所述，每当扫荡村庄，没有逃走的不仅是老太婆，也常有中年妇女。这时，他们经常是躲在同一间屋子里以避骚扰。金子等老兵早在白天就盯住了这些人，到了夜晚，两、三个人潜入那间屋子，从拥挤的孩子、女人中拉出自己喜欢的女人，实施轮奸，如果遭到反抗，就会毒打一顿。

一次扫荡，金子他们进村看到除老婆婆之外，也有些年轻妇女和孩子，金子等老兵看中了其中一个，说：“那个女子长得还不错！”天黑了，七、八个老兵来到那间十多个妇女和孩子挤作一团的屋子，不由分说把那早已看中的女人拉了出去。女人全身颤抖、哭丧了脸无论如何不从，然而势单力薄，怎能抵挡得住手拿武器的众多日本士兵。

女人被拉到别的房里，按倒在炕上。几个老兵抓阄儿决定先后，金子抓到倒数第二名。他们只留一名在屋里，其他人全来到院子。在外等待的人急不可耐地说：“怎么，还没个完?”见到出来的人便嬉皮笑脸地问：“感觉如何？”说说笑笑。终于轮到了金子，他也没有放过那女人。轮奸过后，由于这一带并非治安地区（宣抚地区），完全不用担心会受到军纪处罚，所以没必要杀死那女人灭口。一伙人扔下她扬长而去。

金子说：“这种事我们老兵常干，只有是出去作战，或隔天，或每天，都会发生。当时就想：也不知道这条命能活多久，能干几次就干几次。那时，强奸成风，不强奸的反而遭人嘲笑，完全没有罪恶感。因为根本没拿强奸、轮奸当回事，也就回忆不起当时的具体情况了。”

金子在部队服役近五年，只去过慰安所三、四次。因为一等兵的津贴还不足4块日元 ，而去一次慰安所，就要花掉1块5，费用太高。何况平时外出机会又少，想去也难。金子直言不讳地袒露当年的心迹：“出去作战或扫荡，强奸是白干，当然还是这样好。如果好长时间没打仗了，大家就盼着有仗打。强奸，对那个时期的日本士兵来说，已是家常便饭，出去打仗，等于跑一趟‘免费慰安所’。心想：反正那些女‘中国猪’，怎么对待她们都无所谓。当年的日本士兵就是这样认识的！”

金子他们在扫荡中，即使大白天去强奸女人，中队长、小队长也都视而不见，绝不责怪。夜晚，部下悄然外出，睡在身边的队长也全当不知，任其在外胡作非为。金子说：“在我的周围，这种性犯罪比比皆是，几乎所有老兵没人不犯”。金子本身也是罪行累累，他说：“粗略估计，我自己也有80几次的强奸、轮奸罪行记录。”

七、捆绑少年，刺刀捅死

1943年7月，金子当兵第三年，部队攻打山东省阳谷县某村时，金子他们机枪分队本来无需进村，他却与另一个三年兵高桥二人说着：“喂，要不要走一趟？”“去找个女人！”，说着两人进了村。村里确有几个女人，但不是将脸上和身上抹了漆黑难看，就是涂上污物臭不可闻，以此逃避日军的奸污。

金子和高桥眼见此景，只好放弃这群女人，拐进另一户人家。发现炕上坐着一个四、五十岁的女人，当时的中国女人都比实际年龄要显得苍老，他俩便说：“这是个老婆娘，算了、算了。”他俩走出这间屋，又进了隔壁一间仓库，那里堆着满屋谷壳，两人扒扒那里看看是否有人。这时，突然发现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躲在里面。金子骂了声：“你这浑蛋！”将他拽了出来，绑到院中树上。少年吓得不停地哆嗦，完全没有抵抗。

刚才那个老太婆马上跑了出来，跪在金子面前磕头求饶，尽管金子完全听不懂她说些什么，但感觉她一定是在为儿子求情。金子心想：“一个臭中国猪婆子，还咋呼什么！”用军靴踩住女人的头部。此时高桥拨出刺刀，正要刺向那少年，金子说：“别刺胸部，捅他肚子！”高桥在少年腹部连刺两刀。女人拼命想救少年，但被金子一脚踹得老远，又被按倒在地。尽管如此，女人仍不甘心，下跪求饶。金子也拨出刺刀，猛刺少年肚子。少年腹部血流不止，倒在血泊之中。金子和高桥见状说：“这小子已经活不成了，咱到别处去找找女人！”说完赶紧离开。

他们在外转了一圈儿，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女人。金子突然想起刚才那个少年，大约半小时后，独自一人返回刺杀现场，那棵树上已不见了少年踪影。进屋后看到，老婆婆已哭成了泪人，紧紧抱着瘫软如泥、脸色铁青的少年。女人见到金子，立刻停止了哭泣，双眼发出凶光，怒目圆瞪。金子被那老太婆的气势所压倒，丢魂失魄地转身逃回部队。

话说至此，金子痛苦地哽咽良久，最后他艰难地从嘴里挤出几句话：“现在我才深刻认识到……当时那女人的憎恨表情……真正表达了中国人民的刻骨仇恨！”

八、自暴自弃，为所欲为

当金子已是三、四年老兵时，他已不仅仅是充当帮手，甚至自己也积极地干起坏事来。一天金子他们几个老兵在扫荡村庄中逮住一个没来及逃脱的男人，用绳子将其手脚捆绑起来，从一开始便决定杀掉他。他们找来遮挡阳光的苇帘，将男人裹了起来，又在周围撒了许多谷糠，随即点燃。火焰立刻燃起，男人拼命挣扎，但已被牢牢捆住，怎能逃出那凶猛的火网？仅仅几十秒钟，便在痛苦中烧死，金子他们在旁开心地看着取乐。那个时期士兵之间常常问道：“你今天杀了几个？”“两个，你呢？”像是互相竞争比赛，又像是以此取乐。

金子当了四、五年兵，也未能退伍回国，对此大为不满。加之，他又觉得自己常常出外作战杀害不少中国人，但却不如很少出去作战的内务班一伙人晋升得快，难耐胸中怒火。

金子向笔者披露当时的心情：“不知自己何时才能回国，当时也看透了军中内幕，好像是在被人当猴儿耍，干什么都不行。所以只好由着自己性子，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陷入自暴自弃的境地”。

金子这伙日本兵，不但推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而且还应当加上“干光”这一条。应该说：他们犯下的是“四光政策”！

九、真正的认罪，是从回国以后

1945年8月，金子等人在朝鲜半岛北部的咸兴迎来了日本的战败投降，做了前苏联的俘虏，被押往西伯利亚。金子深信：“我是为天皇而战的，不久天皇一定会来救我！”金子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战争中犯下那么多滔天罪行。就这样，金子在西伯利亚挨过了五年。

1950年7月，他被转移到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在抚顺的头几年，他的思想依旧冥顽不化，三年后，坦白认罪运动逐渐高涨，许多日本士兵相继坦白了自己的罪行，纷纷表达了反省之意。面对这一切，金子内心在想：“你们装什么洋蒜？”继续反抗。

不久，金子也接到管理所要他坦白自己罪行的通知，开始他只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并以“奉上级之命”为借口加以推脱，例如：“在上级命令下我干了……”、“我做过杀人帮凶……”等等，力求逃脱个人责任。当他在同屋的众人面前宣读这些坦白内容时，列席的外来调查人员气得涨红了脸，怒斥金子：“什么杀人帮凶！不就是你亲自动手杀的么？！”

金子说：“当时，我确实认为自己的一切行动都是奉命干的。”尽管金子在中国所干的坏事可谓罄竹难书，但从当时金子当年撰写的手记《战斗的民兵》 一文中，丝毫看不出他有一丝忏悔之意，通篇都是战争中自己吃过多少苦，以及如何英勇作战的故事。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从未有过罪恶感的金子，在管理所耐心的教育下，在认罪学习的过程中，回忆起累累罪行的点点滴滴，最终认识到：“自己确实干过坏事，干过对不起中国人的事”。当然对于当时中国当局给予的亲切对待，也有些心存感激，但他始终认为那是因为中国想从日本得到丰厚的战争赔偿。

直到最后，金子始终没有坦白自己罪行中的最重要部分，交待的只是部分轻微罪行，并且全以“奉命命干了××”为借口推卸责任。那时并未追究他的性犯罪，他也从未坦白过。

无论中方指导员怎么说：“我们一定放你们回国！”金子却从不相信。因为以前关押在苏联，也曾多次听到过类似的许诺，但最终发现还是上当受骗，这也就难怪他们不信中国人的许诺了。

金子终于获得免于起诉、当庭释放。当金子所乘轮船抵达日本舞鹤港时，他才真正相信中方所说的句句是实话。据说在抚顺战犯管理所里，也有不少人跟金子一样，始终抱着怀疑之心，没有彻底坦白。但是，当金子亲眼见到中方确实没有欺骗他，从此变得真正相信中国人了。准确地说：金子真正的认罪学习，是始于回国之后。

金子说：“回国后，我自己也娶妻生子，从此，更多地反省自己的累累罪行，终于能够站在受害者的立场，来看待过去的一切了。每当我想起这些，才真正体会到我们在抚顺的人罪学习是多么的正确！”

金子现在认识到：幼小时期所受的教育，对于自己今后的人生道路，具有何等重大的影响！他认真地说：“应该将我们这些人为何变成‘穷凶极恶的坏人’写成文章，编入教科书中！”对于那些力图篡改历史、淡化日军罪行的行为，金子感到无比愤慨，他气得涨红了脸，说：“再也不能重蹈我们的覆辙！”虽然金子悄悄地对我说：“这些往事，在妻子和女儿们面前实在难以启齿”，但另一方面，他又频频公开作证，揭露当年日军的种种暴行。

**第四章　坦白强奸事实（小林武司）**

曾参加过中日战争、太平洋战争的日本老兵，愿意坦白自己曾经进行性侵害的人可谓凤毛麟角，现住广岛县的小林武司（81岁 ）便是其中的极少数者之一。

当我问他：“为什么您要不断地发表这方面的证词呢？”小林略为踌躇后直言：

强奸之类的暴行，对于我们这些日军士兵而言，可算得上是日常行为，然而很少有人愿意将其公之于众。日本从不公开日军在侵略战争中的丑陋面孔，只说些冠冕堂皇的漂亮话。为了使后人不再重蹈覆辙，我愿意将自己曾经做过的难以启齿的丑恶罪行公布于世。

一、走进兵营的普通青年

小林于1920年9月生于广岛县芦品郡的一个农家，三兄弟之中排行老二。父亲是上门女婿，在小林五岁时撒手人寰。其后，母亲和祖父成为主要劳力，耕作部分土地，其余部分出租他人，后来也曾做过谷物商人。由此，小林有幸读完初中，毕业后供职于神户的一家药品批发店。他回首当年道：“那时学校和社会的整体风气都认为，大和民族的日本人是最优秀的民族，而朝鲜人和中国人却地位低下，只能从属于日本人。我个人隐约也是那样认识的。”

小林20岁时通过了征兵体检，从1940年12月开始，在广岛县福山接受了三个月的新兵教育。1941年4月开赴中国湖北省荆门市，分配到第39师团232联队第一大队机枪中队。小林在驻地遭中国军队袭击，身负重伤后住院半年有余。1942年4月22日，病愈出院回到当阳的师团本部。人们逢他便说：“你回来的正是时候”，第二天他就随部队踏上了浙赣作战的征途。浙赣作战的最大目的是清剿浙江一带的敌人——中国国民党军队，摧毁其主要空军基地，以阻止美国空军由此飞往日本本土实施大轰炸。

日军自浙江省杭州向江山方面西进。江山是座由四面城墙围起的大城镇，小林的机枪队自7月至9月，一直驻扎于此。依据大本营 决定，这一带的铁道等所有物资均已被日军接管。当初江山城内食品丰富，然而随着军队的长期屯驻粮食供应日渐短缺，日军只好组织人员去近郊农村“征收”粮草。小林犯下的悔恨终生的强奸罪行便发生在此时此地。

关于这一点，我曾直接从他本人那里听到详细的证言，但由于年长日久，我在采访时发现小林有关细节的部分记忆已模糊不清，而且还出现了一些前后错乱的现象。有鉴于此，下面我就将小林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撰写的《手记》转载于此。虽然撰写《手记》时，距离事情发生已经过去14个年头，但据小林本人说：“《手记》的记述更加准确。”

二、兽欲：杀死病中父，轮奸看护女

1942年8月上旬，浙赣战事正酣，驻扎在浙江省江山县城的矶塚大队木村中队以掠夺为目的，对城南约12公里处的一个村庄进行了扫荡。以下一下就是我——小林一等兵——当时所犯滔天罪行的真实纪录：

当部队行至村边墓地，中队长木村一夫中尉站在坟茔高处，用望远镜凝视前方许久，或许是因为早上雾气太重看不清远方，他气急败坏地命身边机枪手桑田：“来，给我扫他一梭子！”嗒嗒，嗒嗒嗒嗒……机枪的扫射声打破了晨曦中的宁静，群雀惊飞，村中一片骚乱。中队长挥舞战刀怒吼一声：“进村扫荡！”士兵们恨不得一口把村子吞掉，如同野狗扑向猎物似地争先恐后冲向村里。砸门、砸家俱、以及夹杂在士兵怒骂中的农民哭喊声不绝于耳。

一直像蝮蛇般从坟包后面四处张望的老兵村上猛然喊道：“小林，跟我来！”我如同被弹簧弹起似地站了起来，跟随村上不顾一切奔向村子南侧，闯入了一农家。房门关着，但用枪托一推便开了。村上整了整钢盔，一面四处张望，一面小心翼翼地进了屋子。炉灶里冒着呛人的烟，锅里的饭也烧糊了，显然刚才还有人在这屋烧饭。

这时从里屋传来一阵痛苦的咳嗽声，“哎，这里有人！”我们走近一看，只见房门紧闭，我狠狠地踢门，喊道：“开门！开门！”但屋里除传来不停的咳嗽声外，没有任何回应。

村上和我骂了起来：“畜生，怎么不开门啊！”我们用尽全力，终于撞开了房门。借着微弱光线环顾四周，我俩不约而同地喊了声“太好了！”村上馋猫似地咽了口吐沫，又用手背擦掉了流到嘴边的鼻涕，皮笑肉不笑地说：“这可是个嫩妞！”他命令我：“先把那个老家伙干掉！”

屋内躲着插翅难逃的一老一少，老人躺在床沿咳嗽不止，旁边一个二十三、四岁的姑娘守在老人身边看护。虽因极度的不安和恐惧，她浑身不停地颤抖，仍将老人挡在身后。此刻，屋内花瓶里散发着鲜花的芳香。

当看到屋里只有病重的老父亲和年轻的姑娘后，我们的紧张一下子消失了。这时我被姑娘从衣袖露出的纤细双手和胸部隆起的乳房所吸引，眼里闪着充满兽欲的凶光。我把枪挎到肩上，一点点地蹭到床沿，紧盯着姑娘的脸，突然用力摸了一下姑娘的前额。姑娘用力推开我的手，重新盖了盖父亲身上的被子。

老父亲看上去已年逾古稀，雪白胡须长满下颚，他轻轻地握住女儿的手，痛苦地喘着气。

村上对我说：“喂，把这个半老不死的老家伙赶出去，这里就是我们的天堂啦！” 说完朝老人大吼：“喂，起来！快起来！”去拉枕头。然而病人只是目不转睛地看着女儿，并不开口。“怎么？竟敢小看老子！”村上说着把枕头一扔，脚蹬床沿儿，摇晃那老人的病体喊道：“你这个该死的老家伙，起来，快给我起来！”我也跟着骂道：“你这个该死的糟老头子，竟敢目中无人！”猛然伸手去掀翻老人的被子，但姑娘紧抓不放，说：“父亲有病！”射来愤怒的眼光。我说：“这家伙，给他软的，他反到给你来硬的！”说罢用枪托“咚咚”地狠砸地面，骂声：“混蛋！”将姑娘连同椅子一脚踢翻。只听她“哎哟！”一声尖叫，立刻又站了起来。她没有去擦拭泪水，紧咬嘴唇，怒目圆瞪。

我把目光转向老父亲：“你这畜生，好大的胆子！”说完用枪托猛扎他的前胸。“我、我，不能起来！有、有病！”老父亲咳嗽不断，呼吸困难。女儿忍无可忍，怒不可遏，用力推开枪托，扑到父亲怀里，边揉老父的前胸，擦拭老父胸前的痰迹边说：“父亲有病，起不来！”此刻，她那饱含热泪的眼睛仍然怒视着我们。

外面传来了猪的嘶叫声、鸡的悲鸣声，与砸家俱的叮当声及士兵们的怒骂声，此起彼伏，交织在一起。

我急不可耐，用袖子揩去额头汗水，拔出寒光闪闪的刺刀，抵在姑娘胸前。霎时间，姑娘脸色苍白如纸，充满泪水的脸抽搐了一下。但是，她那紧抱老父的双手却没有一丝松动。

老父用干瘪的手拂去女儿的泪水，上气不接下气地向女儿悄声细语。女儿听后略显踌躇，终于点点头，起身从床下拉出一只陶罐，放到我们面前，陶罐里面放着几个鸡蛋。我鼻子哼了哼说：“这点儿破玩艺，也想来搞交换？别他妈的拿咱当傻瓜！”抓起陶罐摔在了床上。鸡蛋可能是为生病的老父亲积攒的，一下子全被打碎，蛋黄在地上流淌。

兽欲大发的村上一直心烦意乱，在屋子里气急败坏、坐立不安，见什么砸什么、遇什么踢什么，并时不时地偷看外面的动静。他突然挽起衣袖，扯下蚊帐怒大骂：“老不死的，你还磨蹭什么！”一脚踢在老人头上，老人痛苦地惨叫一声，恶狠狠地瞪着村上说：“我有病，是好老百姓！”话音刚落，他已瘫软如泥，颤抖不止。“浑蛋，你还没完啦？！”村上抓住老人瘦弱的胳膊，将他连同被褥一起拉下床铺。老人仍然拉住床边，想站起身，腹部又被村上从侧面狠踹一脚，仰面朝天地摔倒在地。女儿立刻跑过来蹲在病父身旁。老人脸色铁青，一边痛苦地扭动身子，一边示意女儿赶快逃跑，但是女儿摇头不从，并将脸埋入父亲胸前。出于悔恨和愤怒，她一面伏在父亲的怀里、一面嚎哭不止。老人毫无掩饰地恶狠狠地瞪着村上。

“他妈的！这个该死的老家伙！”村上口喷飞沫，额涨青筋，用力将钢盔砸向老人，一边狂叫：“杀死他！”一边粗野地抡起身边木凳。女儿出于忿怒和反抗，昂起头怒视村上，以自身的瘦弱之躯遮住老父亲。我说：“这妞还想反抗!”话音未落, 已用坚硬的军靴将姑娘一脚踢开，又向老人头部猛砸一拳。老人不停地呻吟，突然挺直了身躯、毫无恐惧，大骂一声：“日本鬼子！”鲜血染红了他的满头银丝，但他却紧握手中布鞋，朝我扔了过来。女儿依旧紧抱着老父不放，用忿怒的眼神狠瞪着我。

我边说“他妈的！”边将刺刀插在床铺上，紧抓姑娘头发，一心想拉开她。只听姑娘惨叫一声，但她更用力地紧抱父亲。这时村上野蛮地骂我：“你这浑蛋！该这么干！”说罢他把枪扔给我，双手抓住姑娘两只脚，用力地甩来甩去。姑娘两只脚乱踢乱踹，村上的脸和手也着实挨了几下。村上边“啪啪”地吐唾沫边将姑娘的两脚高举，朝姑娘的下腹狠踢了一脚。姑娘 “哎哟！”一声惨叫，翻倒在地，但她仍想伸手去拉老父的衣襟。村上立刻抓住姑娘手腕，大喊：“¬喂，你还磨蹭什么！快把老家伙弄出去！”

就在我拽起老人一只脚的瞬间，他却猛然踹了过来，我一边骂道：“该死的老家伙，看你再厉害！”一边朝他连踢了好几脚。老人每挨一脚，都露出忿怒反抗之情，不久他终于闭上了双眼，瘫软在地。只听女儿一声惨叫，胸前的双手不停地颤抖，她已被打倒在床铺上。

听到村上骂道：“还磨蹭什么！”我抓住被鲜血染红的老人头发，将他拉出屋外，掷在院中的一块石板上。吼道：“你这老不死的，竟然这般费劲！”正呼呼喘气，屋里传出了村上“给我看好门！”的呼喊声和姑娘忿怒的尖叫声，以及衣衫的撕破声、坛坛罐罐的砸碎声……。

我在嘟囔：“妈的！好事都是你的，老子来给你当傻瓜！”就在这时，见到老人口喘粗气，手脚也在不停地抽搐。他猛然睁开眼睛，刚好与我的目光碰到一起。“这个顽固不化的老家伙。怎么？还敢用眼瞪我！”我气不打一处来，用枪托痛打老人，同时又用军靴狠狠地朝他胸口踩了下去。只听“咯崩”一声，老人口吐鲜血，一动不动了。我说了声：“见他妈的鬼去吧！”一脚踢翻了尸体。

不久，村上搭拉着撕扯了的衬衫衣袖，裸露前胸，肩挎刺刀，口喘粗气，从屋子走了出来，见到我立刻说：“你去吧！”进门一看，蓬乱的头发遮住了姑娘的前额和脸颊，她拉过撕烂了的衣服尽量遮盖住胸部，红肿的双眼告诉我：此时她已怒火中烧、悲痛欲绝。而此刻的我，却犹如难耐兽欲的一只狂犬，猛扑上去占有了姑娘。

事毕，我走出房间，见村上在那里一边吸烟，一边拿出从姑娘那里夺来的手绢在眼前晃悠，说：“这就是我们的最佳战绩！再去看看有没有下一个猎物。” 女儿不知何时跑了出来，扑到在老人怀里，大声呼唤着:“爹！爹！”并试图抱起老人。当她看到石板上的那摊黑血块儿时，撕肝裂肺地大吼：“日本鬼子！”此刻，村上和我完全被姑娘那大无畏的气概所震慑，哆哆嗦嗦逃离了现场。

进村扫荡的日本士兵们腰带上吊着老母鸡，继续追逐着其他猎物。中队长得意洋洋地坐在树阴下的椅子上，但他却不敢正眼看村民，他也惧怕碰上他们的愤懑目光。然而，仍然官气十足地说：“就抓来这么几个人，怎能搬运那么多战利品？再去附近村庄扫荡，抓些人来！”

在这次扫荡中，我们殴打、杀害了一位无辜的病中老人，又蹂躏了他的女儿，我们无端地破坏了他们的和平幸福生活。我就是那个时期的杀人贵！是恶魔！现在，我却生活在他们的父母兄弟的怀抱之中，并且得到自他们的热情照顾，每当我思及至此，一股强烈的愧疚之情就涌上心头。该死的战争！我们绝不会再为天皇、财阀这帮家伙们拿起杀人武器了！

我的前途只有一条；沿着中国人民用鲜血铺就的真理之路，迈向全世界劳动人民奋勇前进的和平之路，不断前进。除此以外，别无其他选择！

（转引自季刊《中归联》第六期，1998年8月）

三、坦白滔天罪行

1945年日本战败后，小林做了前苏联的俘虏，羁押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卡拉干达，从事繁重的体力工作。1950年7月，被移送给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上述《手记》就是小林自1956年2月开始，用了大约一个月时间，是在“旅行参观”中国各地后完稿的。小林与其他战犯一样，参加了认罪坦白运动，公开了许多罪行，并进行了反省，如自己如何在扫荡中，以机枪射杀慌乱逃命的人群，如何不断地掠夺居民财物……等等。然而他始终没能坦白自己“强奸女儿并杀死病中老人”的罪行。小林说：“虽然这件事一直烙印在自己的心中，但由于一则强奸是可耻行为，再则我自信它是永远不会暴露，所以当时并没有坦白。”

“旅行参观”的第一站是抚顺煤矿，与煤矿毗邻的平顶山便是日军于1932年9月16日屠杀了约三千村民的杀人现场。平顶山惨案中，全村只有一个叫方淑荣的人幸免 ，她为“旅行团”讲解大屠杀那天的情景。她首先介绍了她全家的被杀经过，最后她说道：“我对日本军国主义有刻骨仇恨，但对于你们这些人我不怀仇恨，快些回国，去建立起属于你们自己的幸福家庭吧！”

小林对笔者说：“听到方淑荣的话，我十分感动，当时我就想：不该把强奸和杀死病中老人的罪行藏在肚子里带回日本。”

后来他们又去了沈阳、北京、南京、汉口、上海、广州等地，进一步知道了日军犯下的滔天罪行，亲眼目睹了中国人民遭受的肉体的、精神的痛苦事实。在此期间也曾聆取了一些人对日军暴行的控诉，但都和方淑荣一样，没有责怪小林他们这些日本士兵。小林说：“我与这些人接触后，最终下定决心坦白深埋在心中的那桩罪行。”

结束“参观旅行”回到管理所，小林立即到吴浩然指导员那里，交待了藏匿已久的那桩罪行，并为自己这“迟到的坦白”致歉。吴指导员和蔼地说：“看来这次旅行使你受益匪浅，学到不少东西啊！”不久，小林将自己所犯的罪行归纳整理成一篇文章，名曰《兽欲》——即前面所介绍的那片手记。小林至今仍清楚记得：吴指导员接过小林的《兽欲》后，大加赞扬：“这才是真正的坦白！”

小林悄悄地对我说：“其实我还有五、六次强奸罪行。当时只要出战讨伐，总认为干那种事是理所当然的。”这种事见不得人，总要有人看门，所以总是两、三个人伙同行动，实际上犯的全是轮奸罪。

因为小林他们的这些行为都是在“敌性地区”（敌后抗日根据地）犯下的，被轮奸的妇女可杀可不杀，小林说：“我们可从没杀过。”

当笔者问道：“其他日本士兵如何呢？”小林说：“多数士兵进村扫荡的目的，就是抢夺物资和强奸妇女，老兵几乎都曾犯有强奸罪。”

小林经过抚顺战犯管理所这所学校的学习，终于认识到自己的过错和丑陋。他认为，将自己曾经犯下的滔天罪行公布于世，正是自己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

最后，小林平静地如是说。

日本士兵在中国各地犯下了罄竹难书的滔天罪行，但几乎很少被公之于众。说实在的，我也真的不愿意让自己的家人知道，但为了不让日本重蹈覆辙，只好横下一条心，决定亲自公开自己曾经犯过的滔天罪行。

**第四部　宪兵、军医及731部队**

**第一章　最后的认罪（三尾丰）**

听说我父亲是被三尾丰等宪兵送到哈尔滨近郊的731部队，在那里被当作人体实验而惨遭杀害的。

1998年3月4日，东京地方法院第103号法庭。原告王亦兵（现住沈阳市，67岁）正面向法官进行陈述。被告是日本国政府。王亦兵身着灰色中山装，背宽腰圆，剪得短短的头发与其说是花白，毋宁说更近于雪白。三尾丰（现住东京，84岁）坐在旁听席的居中位置，双唇紧闭，眉头紧锁，聚精会神地听着法庭上的每一句话。此时，三尾作记录的手略停数秒，他闭上了双眼，但马上又睁开，继续记了下去。早在前一年的10月1日，三尾便以证人身份来到这间103号审判庭，为“731部队、南京大屠杀、狂轰滥炸事件”损害赔偿案作过证。

一、逮住可疑的家伙

1913年11月，三尾丰出生在岐阜县的一个农民家庭。1934年1月加入岐阜步兵第68联队，5月到达伪满洲国。1935年8月宪兵考试合格，1936年3月至8月在齐齐哈尔宪兵队工作，其后直至1940年10月，在牡丹江从事查验来往于苏联和伪满洲国边界一带旅客的证件以及搜查“特务”电台的工作。1940年10月，调往大连宪兵队本部，参与思想掌控工作。在此之前，三尾已经参加过好几次拷问嫌疑犯的审讯。

大连（黑石礁）事件：1943年6月，新京（长春）宪兵队截获来自大连地区的怪电波。经搜查得知，电信源为大连黑石礁兴亚照相馆。他们秘密调查该照相馆的来往人员后，于10月1日凌晨，出动约60名宪兵包围了照相馆，逮捕了28岁的沈得龙。最初，由一个叫长沼节二（现住岐阜县，84岁）的宪兵负责审讯沈得龙，上级领导将其视为“大人物”施以怀柔政策，没过许久，沈便交待了有关人员的藏身之地。据长沼回忆：关于间谍工作内情，即使后来由其他宪兵审讯，沈也始终未作交待。

依照沈的供词，三尾被派往天津抓捕兴亚照相馆的老板王耀轩（王亦兵之父）及其侄子王学年（实名王东升，时年25岁上下）。三尾扮成邮局投递员或电工，独自一人搜索王姓二“犯”，却毫无进展。十几天后，在天津宪兵队里的中国人的协助下，终于找到了王耀轩潜伏的纺织厂。

10月下旬的一天清晨，三尾在几个天津宪兵的协助下包围了纺织厂宿舍，逮捕了王耀轩，随即又抓获了住在不远处的王学年。王学年的年轻妻子则怀抱幼子哭喊着追了出来。

三尾回忆当年说：“因为办案成绩会关系到日后的升迁，所以心中颇为此次抓到通缉‘要犯’而自鸣得意。那时我完全没有去想‘要犯’本人及其家属今后会怎样。”

他们首先将两名“要犯”押送到天津宪兵队确认身份，随后乘船将他们押送到大连。在大连宪兵队，王耀轩由三尾、王学年由三尾的部下分别审讯。审讯现场，多半还有担任翻译的朝鲜人和身为候补宪兵的中国人参加。三尾严厉追问王耀轩，企图获取沈得龙和共产党的关系及有关情报。然而，王耀轩总是大义凛然，沉默以对。

二、捆绑在拷问台上

因上级催促要尽早让“要犯”开口，三尾决定动刑拷问。首先是灌水，在翻译和候补宪兵的帮助下，把王耀轩仰面捆绑在一张高一米、长六尺的桌子上，王的口鼻遮着一块布，三尾手拿水壶从上面灌水，开始王还能憋气，但人终究是要呼吸的，在他呼吸时，水便顺势流入腹中。但灌得过多人就会死去，所以还要掌握好分寸。王耀轩痛苦至极，用尽力气扭动身子，舞动手脚，大声喊叫：“别、别灌了！我说、我说！”然而停止用刑后，他却没有吐出一句重要情报。三尾真的动怒了，说：“你是不是收留了一个从苏联来的间谍？那是怎么回事？！”继续进行拷问。王依然没有供出重要情报。

接下来他们用蜡烛火烧王的脚心，滋咧咧的声音、焦糊的气味和烧人的烟雾弥漫四周，王耀轩一面痛苦难耐地摇动着身体，一面高喊：“别烧了！别烧了！”这种拷问三尾进行了很长时间，却没从王耀轩口中获得任何重要情报。

此时，三尾30岁，王耀轩45岁。

三、押送四根“圆木”

自10月末抓到王耀轩、王学年后一个多月，三尾却没有获得任何有价值的情报。就这样，二王在大连日本宪兵队的羁押中送走了这一年。1944年2月底，宪兵队长下令：“将王耀轩、王学年、沈得龙、李忠善四人按“特别移送”处置！”三尾清楚：“特别移送”系指将“犯人”转送给哈尔滨的“满洲第731部队”处置。三尾说：“那时只知731部队极其恐怖，是有去无回之地，但究竟用他们干些什么，我们并不清楚。”

3月1日清晨，三尾带领四名部下，押送四名“要犯”乘上开往哈尔滨的特快列车。途中三尾心情很坏，他说：“当时心情很不好。或许因为那时，我在感情上有了些变化。尤其是与王耀轩、王学年已有四个月的接触，所以在赴哈途中一直很不痛快。另外，还要防止他们逃跑或自杀，也使得我们紧张异常，给我们增加了旅途的艰辛”。

到达哈尔滨站已是深夜，哈尔滨的三名宪兵前来站台迎接，并引三尾他们来到站前广场，在那里办理了四名“犯人”的交接手续。那面的宪兵给他们带上了手铐，像赶猪似地将他们踹进囚车。三尾回忆当年说：“当时有些不快，心想：怎么能这样？真是太过份了！但是同时也有一股‘总算完成了一项任务’的轻松涌上心头”。完成这项工作，用当时的正规术语便是：“宪兵三尾已圆满完成押送四根‘圆木’任务。”

筱塚良雄（现住千叶县，74岁），自1939年5月至1943年3月，供职于距哈尔滨南20公里的平房地区的731部队。曾以助手、杂役身份参加过好几次用中国人做的细菌实验和活体解剖 。在三尾将“四根圆木”交给731部队时，筱塚已经调离。但他说：“只要那四个人进了731部队，无疑会被用于人体实验，惨遭杀害。因为对于中国人来说，731只能是活着进来而不能活着出去的地方。”

三尾回首往事道：“事后，我没有多想那四个人的事，因为压在我身上的各种工作真是太多太多了･･･…”

法庭上，王亦兵的证词仍在继续：“父亲被抓后，15岁的我，只有弃学去当小学徒。母亲克服缠足带来的不便，每天从早到晚在田间滚爬似地忘我劳动，支撑着全家生活。”当他谈到几个妹妹时，声音哽咽，从后面可以看出，他为了忍住泪水，宽大的后背在微微颤抖。

旁听席上的三尾，手握钢笔，一动也不动。

四、“活体实验的帮凶”

三尾在伪满洲国迎来了日本的战败投降。其后辗转于西伯利亚的几处俘虏关押所从事苦力工作。1950年7月与约970名战犯一起移送到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最初来到这里他想：“我没杀过人，所做的一切全是奉上级命令干的！”

抚顺战犯管理所对所有的战犯都给予人道主义待遇，休说暴力，就连辱骂战犯的语言，也未曾有过一句。包括朝鲜族的管理人员在内，所有的中国人都像亲骨肉似地对待他们。三尾患牙疳已久，早在苏联期间就掉了大半口牙，到了抚顺，中国人不但为他装上了假牙，而且还为他配了一付眼镜。受到如此热情对待，三尾开始反复思忖：“日本人对中国人动辄拳打脚踢，甚至更加凶残。而中国人为什么能如此亲切地对待我们呢？”相比之下，他为自己十几年来对中国人的凶犯、残暴而羞愧难当。

这时他又读了有关社会结构、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等方面的书籍，并与许多人交谈心得。不久，指导员要求他写出自己的罪行，他开始步入了坦白阶段。

三尾回忆与自己有关的罪行，很快写出自己的“罪行”交了上去。

“受××命令，押送四人去731部队”；

“受××命令……”。

三尾只要想起与自己有关的罪行，就一条一条地写出来递上去。他以为：这样做就可以了。然而，指导员还是要求他“再好好想一想”。他反复改写多次，却始终未获通过。就在此时，来自所外的调查官员找他，要他写出自己的罪行材料，再次要求他坦白罪行。他的坦白材料依旧是：

“因受××之命……，……。”

外来调查官员也同样说道：“你再好好想一想”。 三尾又反反复复写了多次，思考了很多回。他逐渐认识到：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本身。三尾终于在坦白材料里写道：

我将四个中国人送进731部队，为731部队提供了做人体实验的材料，致使他们惨遭杀害。

三尾以这种认识坦白了罪行，决心接受重刑判决。然而，此时的他仍未认识到，甚至可以说他从未想过，自己的罪行殃及受害者本人及其家属的痛苦会有多么深重。尽管如此，通过在管理所的学习、讨论、认罪、坦白活动，三尾终于从根深蒂固的天皇制思想、帝国主义思想的桎梏中解放了出来。

对于三尾而言，这是他的首次“认罪”。

五、中国归来的“赤色分子”

1956年夏，三尾获得中国最高法院免于起诉、当庭释放的宽大处理，回到日本，当时他已42岁。日本投降时还留在伪满洲国的妻子和三个女儿，早已先期回国。此刻，一家五口的生活责无旁贷地落在了他的肩上。三尾在东京到处找工作，却很难找到，无奈之下只好回老家干些体力活，以维持生计。后来他重返东京，先后在几家公司任职，都未能持续多久。

最先是在东京荻洼的一家玩具公司工作。不久，警察来到公司，随后老板对他说：“警察给我看了你的有关材料。”他自知无法长待，辞去了工作。

接着又在埼玉县川口的一家废铁回收公司工作。警察又来到这家公司，与老板取得联系。不久，全公司立即传开了：“三尾是中国归来的‘赤色分子’！”女老板随即借口丢失了贵重物品，又不知到底是谁作的案，一次性地辞退了全体员工。不久又召回了除三尾以外的所有原班人马，再次砸了三尾的饭碗。

最后，三尾与同被羁押在西伯利亚的朋友一起，开始了健康保险工会的疾病预防工作。为扩大业务，自1965年前后三尾便将妻儿留在东京，只身前往大阪赴任。因他潜心工作，终于事业有成。

三尾回国约两年后，便在东京参加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简称“中归联”）的活动。在大阪，虽然他终日埋头工作，却从未放松过“中归联”的有关活动。1972年11月，日中两国恢复邦交，三尾与“中归联”伙伴一起应中国政府的邀请来华访问。就在那次，他向恩人周恩来总理信誓旦旦地保证：“一定要出一本揭露日本在华所犯罪行的书!”

六、人，就是我杀的

三尾虽然积极从事“中归联”的活动，但他并未仔细思考自己的罪行。1971年，他在大阪的讲演内容涉及了日本军队的野蛮、凶残，同时也抽象地讲了些自己的个人罪行。但是他仍没有具体谈到自己的“那件罪行”。与其说三尾不愿讲，毋宁说是他当时的认识还很浮浅。当时他认为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帮凶，并未意识到与自己有着直接关联。

1987年三尾回到东京。1989年7月，东京新宿区户山的原陆军军医学校遗址挖出许多人骨。媒体报道：这些人骨，极有可能是731部队进行活体实验的被害人遗骨。这时，三尾头脑中瞬间掠过：这堆人骨中有无那四个人的遗骨？此刻，淡忘已久的“那件罪行”，又具体地萦绕在他的脑际。自此，三尾逐渐认识了自己罪恶深重，他决心今后遇有适当机会，一定要将“那件罪行”和盘托出，公诸于世。

1993年，日本各地开始举办731部队展览，此时三尾已退休。当年2月，他在东京池袋举行的展前演讲会上，首次公开了“那件罪行”的始末。他回忆当年说：“讲述自己的重大罪行，真的很痛苦。”

从那时起，三尾频频给一同直接参与过“那件罪行”的长沼节二打电话、写信，劝说长沼：“你能否也站出来作个证？”

长沼与三尾同样，也是经前苏联关押，又被转押到抚顺，回国后积极在“中归联”活动。但是，长沼却不大愿意公开自己的“那件罪行”，但最终还是被三尾的真诚所感动，下定决心，在岐阜县的演讲大会上首次将自己的所有罪行公布于众。长沼承认，自己是深受三尾的影响。

三尾奔走于日本全国各地，在各地731部队展览会上发表证人证词。通过重复演讲，三尾逐渐认识到自己确实犯下了难以饶恕的大罪。

1995年7月，为参加731部队国际研讨会，三尾来到哈尔滨。他心想：“或许能见到被自己以‘特别移送’名义押送到731部队的王耀轩的儿子王亦兵，如果真能如愿，一定要当面向他谢罪”。他说：“那时我已决心向对方致歉，向人家明确表示：‘我确实干了坏事，干了愧对于您家人的坏事！’但心中的某一隅确实也残存着为自己开脱的思想：‘我是奉长官之命不得已去帮凶的，请你予以理解’！”

王亦兵也为参加这一国际会议来到哈尔滨，与三尾住同一宾馆。听到这个消息，三尾双腿发软，不听使唤，但他终于鼓足勇气，通过他人向王亦兵转达希望见面之意。当他站在王亦兵面前，深深鞠躬后说：“是我抓了您父亲，并押送到731部队，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惨祸，实在太对不起您了！”王亦兵极力压制心中的愤懑和憎恨，许久未说一句话，最后开口说道：“你是我的仇敌！正因为你抓了我的父亲，把他送进了731部队，他才惨遭杀害的。杀死我父亲的就是你！！”

三尾头脑中一片空白，只是再三再四地道歉：“对不起！对不起！”反反复复地低头行礼，挨过难堪的时间。两人当然不便握手，三尾尴尬地退了出来。回到房间他陷入沉思，他想：“自己不仅仅是受命于上级，当了帮凶。其实，人就是我杀的！”直到这时他才开始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三尾回想在哈尔滨时的情景说：“‘人是我杀的！人是我杀的！’这个声音一直回响在自己的脑海。这次去哈尔滨，我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当时虽然语言上能够理解，然在深层思想上，恐怕还没有真正认识到。”

同年8月，王亦兵为参加法院庭审来到日本。三尾前往王下榻的饭店，与上次同样当面表示谢罪之情。突然王亦兵脱口而出：“在这里与你相见，很不愉快，你可知道因为父亲被杀，我们全家遭受了多大的苦难！”三尾再三表示谢罪，同时向王发誓：“我今后一定在法庭审理此案时，出庭作证。”

此次分手时，王亦兵主动伸手握别，但却没有说一句饶恕三尾的话。三尾回忆当时说：“那时，王先生没有一丝笑意，而我能与他握手告别已十分满足，再无他求了。”三尾的内心，也从这意想不到的握手之中，得到了些许慰籍。

自1993年首次公开那件令人心痛的罪行以来，三尾对于自己罪行的认识日趋加深。他说：“直到此时我才清楚地认识到，那四个人等于是我杀的。”

对于三尾而言，这是他的第二次认罪。

七、第三次认罪

三尾以披露自己罪行为内容，在日本各地巡回演讲。他早在80年代中期已患胃癌，切除了胃的三分之二。1997年5月开始，又身感不适，只因当时需要协助王亦兵的法院庭审做准备，并忙于“中归联”的活动，只好强忍病痛未去治疗。直至10月疼痛难当，方才住进医院。此刻他的癌细胞已经扩散，11月动了大手术。此次手术将剩下的三分之一的胃及十二指肠、胆、脾、肝等全部摘除了。他苦笑着说：“我的内腔已是空空如也！”

1998年3月4日开庭前，三尾拄着拐杖，弯腰坐在走廊的条凳上。我一坐到他的身旁，他便微笑着对我说：“来到法院还真费了不少劲，最近上下台阶的力气都没了。”虽然他的身体已极衰弱，但从他的脸面上看得出，他的心情好像比较放松。

三尾在旁听席就坐后，四处张望，像似在找人。只见原告王亦兵走进法庭，背朝这面坐到原告席旁的位置上。三尾见王回头，略微欠身举起右手向王鞠躬致意，王也微笑着举手作答。三尾走到王身后，轻拍王的后背，面含微笑与之交谈，王也面带笑容向他回话。

王亦兵此次来日，三尾已与他见过两次，三尾高兴地说：“这次王先生是第一次以笑脸与我相见，真的把我当成了朋友。他从饭店打电话来，我们还一起吃了饭。我真的很高兴！”他高兴得脸颊绯红，眼含欣喜的热泪。

原本三尾在旁听席上还面带微笑，但随着王亦兵在法庭上的陈述深入下去，他的脸色越来越阴沉。在当事人的证词陈述完毕后，法庭宣布休庭。三尾立刻起身拄起拐杖，低头弯腰地退出103号法庭。

在稍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三尾和王亦兵的手紧握在了一起。王挺起胸膛大声地说：“我与三尾先生之间，确系被害方与加害方的关系。但是三尾先生对于既往罪行全部认罪，且诚意谢罪，现在他又为中日友好事业竭尽全力，所以我完全宽恕了他。”

三尾则始终脸面朝下，结结结巴巴地说：“过去我只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杀死了王耀轩等四人。……今天才深切认识到……那次惨祸给王耀轩的家属……带来了巨大灾难……我更深切地认识到……自己的罪行该是多么深重！”声音并不大，似乎在自言自语。接下来他又说：“但我的罪行决不会因为我已谢罪而消失！”此话一口，他立即紧闭双唇，面朝下方。最后三尾发誓：“今后我要坚决地和王先生站在一起，为打赢这场官司甘愿付出一切。我已来日无多，但决心为此竭尽全力！”

迎着夕阳，我俩同乘地铁踏上归途。坐在我身边，弓着背的三尾在自言自语：“我的生命已快到尽头了”，隔了一会儿他又说：“今天是我的第三次认罪”。

八、瘦成皮包骨

王亦兵回国后，三尾去了大阪一周左右。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开展自1997年6月开始发行的《中归联》季刊的销售工作。三尾曾向周恩来总理提议并保证过，要揭露日军当年在中国犯下的种种暴行，终于参与发行了这份以公开揭露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犯下的暴行为主要内容的《中归联》杂志。虽然创刊号销量很好，但第二、第三期以后，销量慢慢下降。三尾以扩大其销量为己任，四处奔走会见熟人，向他们宣传，扩大影响。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避免再次发动侵略战争，防止下一代人重蹈我们的覆辙!”

在大阪附近地区，他不辞辛苦，四处走访那些过去工作中结下关系的人们。终因劳累过度而病倒，高烧39度多，不得已返回了东京。

周围的人都知道：三尾不仅身体力行、四处奔走，而且还为打开刊物销路自掏腰包。为了《中归联》季刊的发行、为了保存731部队的遗址……凡此种种，均有他的可观捐助。

对此，笔者曾向他询问究竟，他说：“全是背着老伴捐的。她要知晓，定会对我发火。”

三尾4月初住进医院。4月16日下午，笔者与从岐阜前来东京参加“中归联全国大会”的长沼节二同去医院探视。他躺在六人一间病房的一张病床上，一只手正扶着前额上的冰袋，脚边小桌上摞着厚厚的裁判资料。当他看到我们，面带微笑欢迎我们的到来。他说：“前几天全身发冷，今天又高烧40度，汗流不止。”病床两侧站着他的两个女儿，忙着为父亲揩拭额头和脖颈的汗水。三尾默默地露出满意的微笑。

长沼与三尾的关系，已从多年前的“宪兵队的同事”变成“中归联的同志”， 此次二人重逢，三尾高兴万分。二人的话题很快进入了“中归联”的活动上，长沼将“中归联”大会的情况讲给三尾听，三尾边点头边问些问题。其实，直到大会前夕，三尾还一直希望自己能亲自出席，遗憾的是最终未能如愿。当谈到法院的庭审，两人靠得更近，声音也放得更低。三尾将脸转向笔者说：“王亦兵先生委托我们调查的事项，每一件都很难查实”。

三尾身上的衬衣已被汗水湿透，他要换件干净衬衫，两个女儿忙前忙后；他又为吊针的输液管带来的不便稍感不满。看到如此一个骨瘦嶙峋、胳膊细如干柴的老人坐在病床上，我本想对他说：“您要撑住啊！”但最终还是没能说出口。只道了声“再见！”便与长沼一起退出了病房。听说他4月25日出院了，但绝对不是说他的病已经好了。他给我来信说：“整天躺在家里，自己都觉得很可怜。”

九、最后的认罪

5月19日三尾再次入院，不久来电话说有话要说。6月8日，我依约来到医院，他仍躺在上次的那间病房里，小桌上摆放着《中归联》第五期。三尾见我第一句话便是：“这次身体很不好”。开始还能坐在病床上与我交谈，后来他仰面躺下说：“现在考虑的是，我将不久于人世……”他的每一句话都很艰难，“不久我将走向另一个世界，在那里还要聆听抚顺战犯管理所的老领导——孙明斋先生（1988年病故）和吴浩然先生（1993年病故）的教诲。在那里，我会真心诚意地向被我残害的芸芸众生谢罪，承担自己应负的罪责！”三尾饱含热泪，眼望远方，两颊绯红，面带微笑说：“那才是我的最大慰籍！”我默默地频频点头。许久，又听到他的声音：“这就是我最后要说的话！”只见他长舒了一口气，闭上了双眼。

此后我又探视过他几次，他身体也日趋衰弱。

7月2日，三尾丰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第二章　难忘731部队的疯狂（筱塚良雄）**

千叶县八日市场市 内有座寺院，寺院一角立有一块“谢罪碑”，碑上有文：

……吾辈作为侵略者在中国犯下滔天罪行，每当念及受害者之心情，心中便沉重至极，吾辈所犯滔天罪行实在无以偿还。……值此归国四十年之际，吾辈尚能以此身躯存活于人世，不能不以无限感激与诚挚谢罪之情，回报“以德报怨”于吾辈之伟大中国人民。为此，与已故前辈之遗属共立此碑，以为日中友好之永恒誓言。

一九九七年七月吉日　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千叶县支部建之

筱塚良雄（原姓田村，现住千叶县，77岁 ）站在碑前自言自语：“我以前真是对中国人太凶残了”。据说筱塚的街邻们都知道此碑的来历以及他曾在中国干过的事情，他们常常来此献花、洒水清扫。

一个多月前的1998年6月25日，筱塚欲赴美国、加拿大进行披露自己罪行的演讲。行前曾收到两国说他 “因系731部队战犯，拒绝入境”的消息，但他却认为：“只要向他们讲清楚我为什么去的理由，相信一定会得到他们的理解。”还是登上了飞往美国芝加哥的飞机。不料，竟被挡在了芝加哥的奥黑尔国际机场。海关告知筱塚，电脑显示:“华盛顿命令，筱塚不可入境，请立即返回日本！”筱塚当即被遣返回到成田机场。

“我怎么都弄不明白，我本想以证人身份，为披露自己罪行而去美国和加拿大，怎能就不许我入境了呢？问题就在于我要去作证，披露隐情。缄口者能过关，作证的我却不可！真是太遗憾了。”筱塚满脸的疑惑和懊悔，紧闭双眼，一动也不动，如此许久、许久。

一、走进731部队少年队

1923年11月，筱塚（田村）出生在千叶县中部的一个农家，兄弟姐妹五人，他排行第二。全家以务农为业，少年时期，筱塚就特别喜欢帮家里干些农活，小小年纪的他，一个人就喂养了好多兔子。

在日本侵华战争不断升级之中，15岁的筱塚经人推荐，参加了“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满洲第731部队）”的招考，并被录取。自1939年4月1日起，他与一批同龄少年，在位于东京都新宿区户山的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接受了大约一个月的初期教育。

同年5月12日，他们抵达位于伪满洲国哈尔滨南20公里的平房地区的731部队。731部队对新兵们首先训诫：“勿看！勿听！勿说！”并公布严格纪律：“如若逃跑，则以临阵脱逃罪处以死刑！”筱塚说：“当时觉得保密性越强的工作，越有干头。”自此，这批少年队员开始接受731部队的教育。

每日课程，大体如下：

（1）每日早六点开始，军训一小时；

（2）早餐后至中午（或下午），人体课或实习；

（3）若下午无课，去各研究室帮忙。筱塚去的研究室从事“繁殖跳蚤”和“培养细菌”的工作。

1941年7月，在关东军举行特种演习 之前，少年队被遣散到各地 。筱塚例外地被留在第四部第一课柄泽十三夫（军医少佐）班里，从事细菌培养工作。就是在柄泽班的这一时期，筱塚首次参与了活体实验。

二、日本鬼子解剖“圆木”

柄泽班的真正目的，并非研制出能使鼠疫和霍乱菌无毒化的疫苗，而在于研制可抵御各种防疫疫苗的、更具杀伤力的细菌菌苗，进行批量生产。

而人体实验的目的在于：以人体测试毒性大小，并通过活体试验，采集经植入人体而加强了毒性的菌株。为此，筱塚于1942年11、12月至1943年1月间，参加了7个中国人的活体实验。笔者为调查当时的具体情况，曾多次采访过筱塚。

1942年11月末的“试验”是将五个中国男人中的四人，事先注射了各种预防鼠疫的不同菌苗后，又为他们五人注射了柄泽班培养的鼠疫菌苗。筱塚回首往事，心神不定地说：“那些中国人在残暴面前大义凛然，毫不畏缩。平时他们常骂我们为‘日本鬼子’，对我们怒目圆瞪，其中一个看似知识分子的人还给我讲好多道理。当时我略懂中文，怕得浑身哆嗦。但当时部队里的氛围就是服从上级命令，按上级命令去执行，对上级指示不许有半点儿怀疑，根本没有觉得有什么奇怪。”

五人当中只有那知识分子未注射防疫疫苗，而只注射了鼠疫菌苗。注射后仅两、三天他便发起高烧，脸色铁青，次日脸色转黑，人已濒临死亡。很明显，这是鼠疫晚期症状。柄泽班的医生将这只“圆木”搬到七栋一楼的处置室，两名军医、一名判任官 ，并配有包括筱塚在内的两名助手，共计五人身着防菌服走进处置室。筱塚首先受命用地板刷将躺在解剖台上的裸身“圆木”洗干净。筱塚回忆说：“我用水管将他从头到脚冲洗干净，但自始至终没敢看那男人的脸。”话说至此，筱塚显得极为痛苦。当我问他后来怎样时，他已语无伦次，欲言又止。此时，他那已经闭起的眼睛和紧扣的双唇抽搐不止。他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饱含热泪地说道：“真是太残酷了，我再也说不下去，请你原谅。”他睁开被泪水润湿了的双眼，拼命忍住泪水的涌出。

几天后我再次造访筱塚，请他谈谈那个男人的后来遭遇。他讲：“先是一名军医用听诊器听了听他的心脏，随后解剖开始。军医用手术刀切开他的腹部，摘取内脏。我按指令将那些脏器的切片用镊子夹起，向有培养基的玻璃器皿内表面涂抹，并把一些切片放进了内有增菌培养基的试管里。就这样，男人的内脏器官一个个被摘除，在此过程中，他已死去。”

筱塚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时期撰写的《手记》 详述了当时活体解剖的亲身经历。筱塚说：“《手记》的所有记述，全是我的亲身体验。但我并不想再去翻阅它。事实上，我几乎再也没有翻阅过。”

《手记》中，筱塚将自己描绘成一个不知恐惧为何物的毫无情义的人。他说：“实际上那全是虚张声势，做给别人看。表面上也许看起来是那样，但内心深处总是提心吊胆，战战兢兢。”

另外四个人也都染上了鼠疫，其中二人与前述男人一样，在筱塚参与下做了摘除内脏的活体解剖；另两人听说转给了治疗部，肯定也做了活体解剖无疑。1943年1月前后，又给两个中国“圆木”注射鼠疫菌苗，并在发病后做了活体解剖。筱塚依然如前参加了那次活动。

“无论怎么说是给人打下手，但我始终抱着有朝一日自己也会得到提升的幻想。”对于像筱塚这些少年队出来的人来说，如能拿到一张可在731部队重要地区内自由进出的“特别班出入许可证”，便表明该人已经步入迈向成功的第一道门槛。筱塚一直以将来能升任判任官为目标。筱塚接着说：“当时自己受着两种力量的支配：一种是这种升官的欲望；另一方面，当时731部队里弥漫着绝不可以拒绝上级命令的氛围，所以不敢违抗上级命令，害怕遭到惩处，这也是支配自己的一种强制性力量。”

1943年3月，筱塚向柄泽班长提出辞呈。他说：“当时并非受到良心谴责，只是厌烦了那项工作。”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感到了自身的危险。筱塚亲眼看到感染了细菌的伙伴一个个地死去，自己还不得不亲自参加这些感染了鼠疫而死去的伙伴们的活体解剖。

三、日本战败，认罪的开始

对于筱塚的辞呈，上级答复：准许回国休养。在日本国内征兵体检合格后，又根据柄泽班长指示，筱塚作为军中文职人员被派往伪满洲国的其他地区。1944年3月，筱塚正式以现役军人身份，被编入驻扎在与苏联接壤的神武屯的关东军步兵部队。同年11月，调往师团司令部军医部工作。1945年2月，再次调回哈尔滨平房区的731部队，接受下士官人员教育培训。同年6月，分配到通化关东军第125师团军医部。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筱塚从出差的外地返回通化军医部，接到代理军医部长手谕：“千万别当苏军俘虏，急速经朝鲜回日本！”虽然有些“负隅顽抗派”的军官劝其留下来，但筱塚还是混入中国的逃亡人群里开始逃难。后因故失去了返回日本的机会，正当走投无路时，被中国共产党的解放军所救，并参加了他们的工作。筱塚回忆当年说：“解放军待人亲切，在他们的救助中我逐渐认识到：我们的罪行是何等深重！自己过去干下的事，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多大的痛苦！”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2年，筱塚被拘捕，并送往抚顺战犯管理所。他说：“那时我已有接受惩处的思想准备，因为罪行已在我的心中埋藏许久了。”

筱塚的认罪早在抵达抚顺之前便已开始，然而他始终丢不掉“我只是一个打下手的人，一切全是奉命而为”的认识。

筱塚在战犯管理所里继续学习，不断思考自己在731部队犯下的罪行。

此刻，他已认识到：“如果站在被害人及其家属的立场看待问题，即使是奉上级命令，也不该有那种非人之举。”经过这种思想转变过程，他真正地认识到：作为执行者的他，确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筱塚心想：“我不但应该接受严惩，而且应该帮助中国政府追究给我们下令的责任人及组织机构的责任！”基于这种认识，他坦白自己曾经参与过的罪行，并尽其所知，揭发了731部队的种种滔天罪行。

由于中国的宽大政策，1956年7月筱塚获得免于起诉处理，并于同年8月回到日本。他抵达千叶县家乡几天后，同乡的731部队老上级为他举行了欢迎会。当场就有其他队伍的原上级领导约他一同去拜会原731部队的石井四郎部队长 。筱塚认为没有去的道理，拒绝道：“我已不是石井的部下，我讨厌去他那里！”会场气氛立刻变得非常紧张。此后凡有这种聚会，就再也没有邀请过他。

他回忆当年说：“如果那次去拜见石井四郎，并请他介绍工作，我这张嘴也就被封死了。幸好当时没有去。”后来，他在地方政府任公务员，直至退休。

筱塚退休后，自1984年开始巡回演讲，讲述在731部队时期的亲身感受。他以认真的眼神向我诉说：“我不能将自己在中国干下的事隐瞒起来，一直把它带进坟墓。”

自1993年起，日本全国各地相继举办“731部队展”，筱塚与之积极配合，以证人形式频繁演讲。有时也会遭到强烈反对。一次在东京都涩谷区的演讲结束后，一个流里流气的年轻人威胁道：“你胡说些什么？小心放你的血！”另一次在千叶的演讲中，当筱塚对731部队长石井四郎直呼其名时，会场里一名中年男子立刻吼道：“你怎么敢直呼石井阁下的大名？！”尽管有这些威吓，筱塚的揭发演讲仍在继续。

他说：“我常常想，自己曾经干过不该干的事，如果站在那些被害人及其家属们的立场上，该怎样看待这些往事？我的演讲，也就算是最起码的赎罪吧！”

在听筱塚演讲时，我们看得出他是在极度的痛苦当之中，竭力压制着自己的悲痛之感情，尽量保持平静。曾有一次他对我说：“每次演讲都是对当时的一次回忆，非常难过，夜里久久难以入眠。每每想起当年的场景，都痛心疾首，难以自拔”。

四、终生认罪，直到最后一息，

关于被美国、加拿大两国拒绝入境一事，筱塚用力地说：“我确有非人道之举，也感到非常抱歉。然而，美国与石井四郎等高级将领不是做了一笔交易，对石井四郎进行了免罪处理么？美国能准许他们入境，却不许我这个打下手的无名小卒入境，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筱塚确有过非人道行为，但作为受害国的中国，已对他做出了不起诉的宽大处理，亦未将他作为战犯进行审判。而美国则以石井四郎等人交出731部队进行活体解剖及其他“研究”的资料为条件，对他们不追究战争犯罪责任，这可谓他们之间的一笔交易。与之成为鲜明对比的是：作为一个在部队打下手的筱塚，虽然发自内心地认罪并公开谢罪，愿意积极勇敢地站出来为731部队的犯罪事实作证，却被剥夺了入境资格。

筱塚赴美受阻，回国一个半月后，又来到中国。他的此举，是为协助“要求731部队细菌战进行国家赔偿”诉讼案的现场调查。

这一项诉讼，系由曾经遭受731等日本细菌战部队培养并传播的鼠疫、霍乱菌感染而死亡的108名遇难者家属，于1997年8月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的。据调查团中的一濑敬一郎律师言：“在实地验证平房731部队遗址的过程中，筱塚先生给了我们很大帮助。当年他就是在柄泽班从事培养鼠疫菌的工作，是位特别重要的证人。”

2000年11月15日，东京地方法院第103号法庭。筱塚爽快地接受了律师团的邀请，作为原告一方的证人站到了证人席上。或许因为过于紧张，在他走向证人席时，身体曾一度摇摆，拿资料的手也在微微颤抖。在审判长的催促下，筱塚宣读了《证人誓言》，随后，他详细地回忆了他本人在731部队犯下的罪行，以及他所知道的731部队的一切内幕。最后，他向审判长陈述道：

我所有的这些惨无人道的战争犯罪行为，都是奉上级命令而进行的。假如我们日本人遭受了如此残害，我们会怎样看待这一切？我们会怎样看待目前日本政府所持的态度？在此，我殷切希望日本政府真正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处理这一历史问题。

庭审过后，关于731部队的目的，筱塚如是说：

提起731部队，人们常常仅仅聚焦于它的活体实验 ，其实，它的最大目的在于大量培养感染力更强的细菌，以制造更具杀伤力的生化武器！

筱塚不仅是那种细菌的直接培养者，而且也是人体实验、活体解剖的参与者。尤其由他亲手培植的细菌撒向中国大地，伤害了更多的无辜平民。

当时我真该豁出自己这条命，拒绝做那些事，那才是做人应当具有的态度。但是我却没能拒绝，这该说是我的责任。现在我虽然无力承担全部罪责，但我愿为此竭尽全力，出庭作证便是我的行为表现。我尤其希望审判长站到受害者一方，公正地裁定此案。我深信，只有我们在日本国内广泛宣传事实，力求日本人对那段历史建立正确的认识，才能迎来众人企盼的和平世界！

筱塚目视前方，坚定地说道。

**第三章　活体解剖　悔恨无穷（汤浅谦）**

这是位于东京都杉并区的一家私人诊疗所，一些老人络绎不绝地前来就诊。在一件小小的诊室里，83岁高龄的汤浅谦医师挺直腰板，仔细地为他们一一诊治；“最近感觉怎么样？”他轻声地问一位70多岁的老人，随后拿起听诊器，聚精会神地听着，最后又开始测量血压。

迄今为止，汤浅从未当过开业医生。自1958年开始，他在杉并区参与创办了三家“民主诊疗所”，1975年前后前往神奈川县相模湖的一个诊疗所工作七年之久，其后又回到杉并区，如今两家“民主诊疗所”每周各去一次，虽然上班时间不长，却从未停止过诊疗工作。他微笑着说：“我不图钱，只是这一带的老年人还需要我，怎能置他们于不顾呢！”

如此豁达的汤浅医生，头脑中的一隅却始终抱有“无论如何都难以抹去的记忆”、“终生悔恨不已的罪过记忆”。为了终生对那些罪恶负起自己的责任，他在不遗余力地奉献着自己的余生。

一、现场，也曾有过一丝罪恶感

1916年10月，汤浅出生在埼玉县，长于东京的京桥。父亲是一位开业医生，“对于当地的贫困户，总是给予热心诊治。”汤浅兄弟姐妹九个，他排行老三。学业优秀的汤浅受父亲熏陶，不知不觉中立下了从医之志，“想当医生救助那些痛苦的人。”后入东京慈惠医科大学学习，并于1941年3月毕业，成为东京驹込医院的一名内科医生。同年10月被编入北海道旭川步兵第28联队，接受两个月军中教育，25岁便成为一名中尉军医。

1942年2月1日，汤浅被派往日军控制的中国山西潞安陆军医院赴任。从此，他总是威风凛凛地走在街头，无论哪个中国人都得给他让道，深深鞠躬。他常以“我乃日本帝国陆军军官”而春风得意。他回忆当年，口中勉强挤出几句话：“当时……我以为自己……干的是好事！”

汤浅自到潞安之日起，直至1956年被免于起诉释放回国，在中国有过许多感受颇深的亲身经历。他在回国后的40余年间，曾到全国各地作过500多场演讲，讲述自己在中国的那些经历。

在会场，汤浅把当时的情况讲述一遍后，一个一个地向听众发问：“日军侵略中国的目的是什么？”但听众们却答不出来。随后，他替众人作答：“是去掠夺资源！就是为了这个，日本人到中国去当了强盗！”

每当汤浅谈起日本发动战争的整体状况和时代背景，真可谓滔滔不绝。但一旦触及自己所犯罪行就变得沉默寡言，他说：“我的同僚谁都不肯讲这些……我说出来，就算是为那些被我杀害的中国人民超度。”这话他已讲过几百次，但每次说到这儿，他都无法掩饰自己内心的慌乱。此刻，他总是干咳不绝，喝水不断，以此控制自己的激动情绪。随后，他下了好大决心，终于语无伦次地从嘴里挤出几句话：“我曾多达七次……将14个中国人……作了活体解剖。”

汤浅对于首次活体解剖的情景记忆犹新。那是在他到达这所陆军医院后一个半月的1942年3月中旬，一天吃过中午饭后，院长说：“今日下午一点进行手术演习，全体到解剖室集合！”学生时代，汤浅就听说过活体解剖的事，他立刻意识到这次一定是用中国人作活体解剖。后来我问他：“当时你想没想到拒绝参加？”他答：“当时大脑中曾瞬间闪过不愿参加的念头，但并未想到拒绝。”他又说：“假如真的拒绝，我就会被骂作‘非国民’，不但要丧失自己的地位，还会殃及日本的家人。当时浮现在我头脑中的，是我母亲的身影。”

虽然当时汤浅并未多想，但总感到心中有块难以化解的疙瘩，他故意做了些无关紧要的琐事，拖延时间晚去了一会。最后他调整了心态：“为了战争的胜利，此举也实属无奈。”有意识地昂首阔步走进解剖室。此时他停止了一切思考，故意虚张作势，所做的仅此而已。

这所潞安陆军医院本是一座学校，被日军占据后改为陆军医院。他走出医务楼，穿过操场便到了解剖室和太平间。这一带白天常有中国苦力 在晒太阳、捉虱子，今天却不见一人。

汤浅晚到十几分钟，向持枪的哨兵回了一个礼后，推门入内。大约40平米的解剖室里，已经聚集了二十三、四名医师和护士。

这次“手术演习”的最大目的，是为了给司令部设在潞安的第36师团的军医们上一次人体解剖课，并规定由汤浅等陆军医院的工作人员协助进行。

汤浅站在门口，见右面约有十名第36 师团的军医，他心中明白在这种环境中，首先应当向军衔最高的长官敬礼。他发现左后方处有两位谈笑风生的人，正是院长西村庆次中佐和第36师团军医部长小竹大佐 。他向二位长官敬礼后，保持军官威严地步入解剖室，走向依墙而立的平野中尉。

此刻，他绝对不能心神不定地东张西望，便故作镇静地环视了室内。室内中央有两张手术台，每张手术台前分别由一位护士准备手术用的刀、剪、钳子等，在这些器具相互碰撞发出“咔嚓咔嚓”声响中，夹杂着护士和周围军医们的说笑声。陆军医院的军医，包括自己在内计有六名上下，其中五名是新任医师。

汤浅左面，站着两个中国男人，他们双手被反绑，由持枪的卫生兵看管。其中一人身穿便装、30岁上下，身体壮实，仪表堂堂；另一人农民装束，约有50来岁，个子矮小，呜呜直哭。

“手术演习用的就是这两个人。他们的表情……至今仍能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演讲会场上，汤浅话说至此，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然后闭上眼睛，强忍着泪水。

接下来，他回忆当年说：“在那蔑视中国人为劣等民族的社会背景中，我确实没感到有什么罪恶感，也没觉得内心有太大的斗争。”他也谈到其他工作人员的情况：“马上就要进行活体解剖，军医和护士们却都在满面春风地说说笑笑。如果这时有谁脸上露出怠慢嫌弃的表情，将会被打上‘派不上用场’的烙印，成为家里的奇耻大辱。”

汤浅当时一再警告自己：作为军官，切勿露出一丝难过表情。但就在此刻，他又突感疑问，问旁边的平野：“平野军医，这些人都犯了杀头的罪吗？”平野中尉毫不在意地微笑答道：“八路全该杀！”听到这话，汤浅赶紧装作无所谓地说：“啊，确是这样。”

过了一会儿，西村院长发令：“好了，开始！”30多岁、身体健壮的男子听到卫生兵喊“喂，往前走！”并被推了一下，便毫不在意地大步走到手术台前，躺到手术台上。当时汤浅心想：这个人终于向日军投降了。现在，他在悔恨中真正认识到：那人当时并未降服，一定在心中高呼：“我的同志一定会替我报仇！”然而，当时的汤浅是认识不到这些的。

另一个年纪大些的矮小男人就在汤浅的眼前，听到“向前走！”也不肯动，和卫生兵推推搡搡，汤浅心想：此时此刻我若不帮把手，会被大家视为胆小鬼；但在又担心：万一自己和这么脏的农民扭在一起，摔倒在地可就现丑了。一瞬间他不知所措，但是，他感到了此刻来自众目睽睽的压力，突然大喊一声“哎！”震慑那男人，自己又叉开双腿站稳脚跟，将小个子男人推向手术台。矮小男人停止了抵抗，老实地来到手术台前，但就在护士要那他搬上手术台时，他突然呜呜地哭了起来，抓着台子边缘不肯上去。护士“温柔”地用蹩脚的中国话说：“麻药的给，不疼！睡觉、睡觉！”听到这话，男子停止了抵抗，躺了上去。护士转过脸来，吐出舌头对汤浅作了个鬼脸。汤浅至今难以忘怀。他说：“每当我想起那天的事，就会因后悔、遗恨、惭愧等感情交织在一起而难以自拔……”此时，他显得极度痛苦，难以继续说下去。

医师团分为两组，先将中国人衣服扒光，再施麻醉，随后开始“手术演习”。汤浅参加的是年长男人的那一组。第一项是摘除阑尾手术，当时患阑尾炎的人较多，但会做摘除阑尾手术的军医却很少，死了不少士兵。因此，这个演习项目尤显重要。另一组做的是手臂的截肢缝合手术。两组分别做完第一项后，接下来将下腹部剖开，进行肠子的切断、缝合手术。当时前线士兵腹部中弹，军医须剖开腹部，截断一段肠子取出枪弹，再将肠子缝合接上。这项“手术演习”便是培养军医的开腹、截肠、接肠的操作能力。

汤浅记得：“手术演习”进行至此，男人已濒临死亡。前面两项“演习”，汤浅都是给人打下手，但接下来的气管切开手术，他却是站在前列的主刀者。一旦前线士兵，在战斗中胸部、咽喉部中弹引起呼吸困难时，必须立即切开咽喉插入通气管，使伤者恢复呼吸功能。军医们都应熟练掌握这门技术，汤浅他们做的正是这项“手术演习”。

不到下午四点，“手术演习”全部结束，第36师团的军医们立即归队。汤浅参与“演习”的那个年长的中国男人早已气绝身亡，而另一个年轻男子却仍在“呼、呼”地直喘气。眼见此状，西村院长立即为那男人心脏注射了空气，但没有效果。汤浅用双手掐住那人脖子他也不死，后来他与A医师两个人用绳子勒，那男人仍然没死。最后，他们听从了一位经验丰富的卫生下士官的话，给那男人注射了麻醉,才将他杀死。两个中国男人的尸体埋入了离主楼十多米远处的一个坑里。

汤浅紧闭双眼说：“本来完全没有必要做那种事（活体解剖）。但当时我全身心投入，认为这样做是为了自己的国家，所以就麻木不仁了。”这番话与其说是讲给会场听众们听的，到不如说是他是在自问自答。他终于又从紧闭的唇间挤出一句：“头一次很不情愿；第二次变得无所谓；到了第三次就是自己抢着去干了。”

自从那次活体解剖后，汤浅每年春秋季节，都要做两次这种活体解剖，后来他也成了一位指导新任医师和卫生兵的教官。

日军进行这种“手术演习”的最大目的，就是为了以最短时间，快速培养出一批实战中有用的医师和卫生兵。

二、这座监狱曾是……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汤浅被山西军阀阎锡山的部队留在太原的医院里，继续从事医务工作。1949年4月，中国共产党解放了太原，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1年1月，汤浅被关押在河北省永年的训练团。

开始，我还完全不明白为什么自己遭关押。那时，我已完全忘记了自己曾参加过活体解剖这种犯罪。之所以把它淡忘了，可能是因为当时我们进行活体解剖时，并无丝毫的负罪感。就像踢开脚边的一条狗、一只猫那样，自然也就完全不会把他放在心上。

汤浅回顾道。

开始汤浅并不知道这个训练团是干什么的，渐渐地他明白了这里是要他坦白交待罪行的地方。在他回忆自己的罪行时，才“首次”想起自己曾经参加过活体解剖中国人的往事。他心里想：“这下可不妙。这里有过去曾在潞安陆军医院工作、知道我曾参加过活体解剖的人……”想到这里，他就觉得与其被别人揭发，倒不如自己交待。他向领导部门坦白：“奉长官命令，我和大伙儿一起进行过活体解剖”，做些可以推卸自己责任的模糊不清的交待。他只想起七次活体解剖中的两、三次。两年不到的训练团关押期，他大体上回忆起了过去的桩桩往事，并且逐渐地承认了罪恶事实，他心想：写出这么多可能就够了。然而犯罪的具体细节仍未交待清楚，所以坦白材料中就缺乏真心实意地向受害者及其家属的忏悔内容。这便是汤浅最初的坦白和认罪。

1952年12月，汤浅被转送到太原战犯管理所，这里恰恰是日本军队过去的一所监狱，许多中国人就是在这里被拘留、拷问甚至屠杀。汤浅到达这里，顿时想起自己曾在这里参加过一次令人脊背发冷的活体解剖。

1942年4月，第一军辖区山西境内的陆军医院和各部队的军医30-40人集中到太原受训。潞安陆军医院的参加者只有汤浅一人。第二天上午下课时，第一军军医部长兵藤周吉少将说：“今天要让你们做一件有趣的活动”。当天下午汤浅等人被带到太原监狱，进入楼内一间约70平米的屋内。只见地上坐着两个眼已蒙起双手反绑的中国男人，他们身旁站着两个手持步枪的看守。看守问军医部长：“可以了么？”兵藤少将点了点头。两个士兵当即向两个男人腹部“砰、砰”各开两枪，顿时两个男人腹部血流不止， “哎哟哎哟”地痛苦呻吟，满地打滚。

汤浅等十几个人立刻将其中一人抬到不远处的一间约二十六、七平米的房间里，放到一个台子上。另一个男人则被另一伙军医抬到另一间房里。当时军医部长用带有威严的口气说：“在取出弹壳之前，别让他们死啦！”这些话时至今日，汤浅记得清清楚楚。

十来个军医围着一个濒临死亡的男人，几个人快速地切开腹部，从肠里取出弹壳后再进行缝合“手术”；同时另外几个人做截断四肢“手术”；余下几个人作气管切开“手术”。汤浅回忆当年说：“记不得那天自己究竟参加了哪个组，但隐约记得当时我参加了截断肩部的‘手术’，当时听见男子哎哟哎哟的痛苦呻吟声。”男子腹部中弹，又被汤浅等人截断了四肢，原本一个完整的人体，此刻已经七零八碎，早已气绝身亡。

正当汤浅他们忙着作手术时，又听到从那间大房子那面传来“砰、砰、砰、砰”四声枪声。很明显，又有两名中国人被杀，这是为下一批二十来名军医做“手术演习”准备材料。

时光荏苒，一晃就是十多年。汤浅这次再一次走进这座太原监狱，学习日本进行侵略战争时期的种种罪行。指导员和检察官反复要求他们：仔细回忆过去，并将自己所犯罪行写成材料，亦即要求他们坦白交待自己曾经犯下的罪行。

开始阶段，为了能走出这座监牢，汤浅只是大致罗列了自己想到的罪行，而未反省自己的犯罪根源。当他将这样的坦白材料念给同室人们听时，遭到来自众人的彻底批判：“你写的交待材料，缺少发自内心的认罪内容”、“好像在写别人的事情”。

由于中国的指导员和看守人员把所有日本战犯都当成具有独立人格的人看待，在日久天长的接触中，汤浅渐渐认识到：过去自己的所作所为确属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

三、“汤浅，是你杀害了我的儿子！”

一日，检察官递给汤浅一封中国女人的来信，信中写道（大意）：

汤浅，我就是被你杀害的人的母亲。宪兵队抓走了我儿子，我一直守候在宪兵队门前，第二天我的儿子被一辆车带走了。我拼命地追呀追呀，无奈两只脚怎能追上四个轮的汽车？后来听人说儿子被送到潞安陆军医院，活活一个人被你们大卸八块了。我哭呀、哭呀……。”

汤浅回忆当年说：“看完信后我大为震惊，心想：原来是这样，我竟干过这么狠毒的事，不仅给本人，而且还给他家人带来这么巨大的痛苦！呆立了许久，愕然不知所措。”

在那以前，汤浅一直错误地以为：“人是麻醉过的，不会有什么痛苦。”并以此为自己辩解。但当他读过这封信后，心灵受到巨大震憾，痛哭流涕，难以自持。神情恍惚地回到自己的房间，重新认真地将自己所犯下的罪行一件一件地梳理了一遍。

“承认自己是坏人，是件很痛苦的事情！”汤浅双眼紧闭，艰难地从嘴里挤出话说：“那位母亲的儿子，可能是我在潞安陆军医院第二次活体解剖时杀害的中国人，那人的面貌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第一次的两个人的面目表情，汤浅至今仍记得清清楚楚，而以后被活体解剖的中国人的长相，他已全不记得了。对于汤浅而言，随便拉过一个活活的中国人，开膛破肚，切、割、锯、剁，不过是一场“手术演习”；那些中国人在汤浅眼里，只不过是用于“手术演习”的一块“材料”，自然也就无心去看其面目表情了。

就这样，汤浅在这座战犯管理所里，逐渐加深了自己的认罪意识。此后，由于中国政府的宽大政策，于1956年6月免予起诉，准许回国。汤浅获此宽大处理，决心回国后自己站出来，讲述自己的罪行，为和平、反战事业奋斗终生。

四、人们都已“忘记”

1947年汤浅在太原成婚，妻子启子也曾一同关押在河北省的永年训练团。后来启子于1953年携三个幼小孩子回国。汤浅于1956年7月回国后，首先治好了在战犯管理所得的肺结核。其后一度在东京慈惠会医科大学工作。后来，他就一边从事“民主诊疗所”的经营工作，一边继续进行自我认罪活动。

回国后第二年，应某医院之邀前去演讲，那是他第一次宣讲自己曾进行过活体解剖的真实经历。汤浅回首当年说：“是否要在众人面前公开自己的那段经历，我犹豫了好一阵子。”当时的住院患者们听后鄙视地说：“汤浅已被中国政府彻底洗脑了”。但他并不在意，继续他的演讲活动。有时，他被听众辱骂：“行了，行了！少说这些！”“你别净说日本军队的坏话！”六、七年前，他刚结束演讲，会场立刻响起“乒乒乓乓”的爆竹声，另外汤浅还多次收到过恐吓信。但是他从未放弃过自己的信念：公开日军罪行，绝不许侵略战争再次爆发。

他在继续自己的演讲，他在继续走他认定的道路。

1981年汤浅以口述记录形式，出版了《难忘的记忆——日本军队的活体解剖记实》（吉开那津子著，日中出版）。

他的夫人启子，在那之前一直不知道自己丈夫进行过活体解剖，临近出版方知内情。开始她竭力反对，经汤浅向她恳求：“出这本书是我的终生心愿。”妻子才同意下来。

曾经与汤浅一起作过活体解剖的A医师在《难忘的记忆》一书出版前给汤浅来信写道：“直至今日，我每时每刻都怀着忐忑不安之心，恳请贵兄多予关照，勿兴风浪，也好让我们能生活得宁静些”。A亦于1997年自费出版了《自叙传》，并给汤浅寄来一本。汤浅对笔者说：“A的书里没提一句活体解剖”。

在汤浅的《难忘的记忆》一书出版之后，一次，在潞安陆军医院的“战友会”上，他被一个曾经参加过活体解剖的牙科医生N（已故）指责：“你竟敢这般公开揭陆军医院的短，还算人么？”大多数到会人员都以“算了算了，反正也确有其事”袒护了汤浅，然而这些医生，还有护士M、护士H等人，从无一人谈论过有关“活体解剖”的话题。

演讲会上，汤浅忍受着回忆带来的巨大痛苦说道：“仅仅潞安陆军医院一处，就解剖了30多名活生生的中国人，那么全中国，肯定要超出千人。参加杀害这么多中国人的日本人，也绝不会是个少数，而能讲出实情的只我一人，别人全不讲。”

汤浅向在场的听众大声地诉说：“他们把这些都彻底地‘忘记’了，日本人缺乏承认战争犯罪的勇气，他们只知羞耻，以为只要能掩人耳目，就万事大吉”。

五、追究个人责任，还远远不够

如上所述，汤浅不断深化自己的认罪意识，回国后从未间断过认罪活动。然而，最近一个时期他注意到：与自己同样进行认罪活动的“中国归还者连络会（中归联）”的人们在反复不断地讲：“都是我们不好”、“当时我们都变成了魔鬼”。对于这种完全归罪于自身、而不指责当时社会体制的行为，汤浅深深感到其中蕴含着某种危机。

汤浅对我说：“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一直认为惟有日本才是理想国家，看不起中国人和朝鲜人，精神结构也是‘惟我独尊’型。其实我们早已被军国主义洗了脑，引上了歧路而又没有察觉。只是当时我们错误地认为自己的行动是出于自发的思考”。然而，当汤浅将自己的上述认识讲给‘中归联’的伙伴们听时，他们却并不以为然，说：“残暴的事全是我们自己干的，怎能把责任推向社会？”有时‘中归联’反到要他检讨自身。

汤浅仍在继续自我认罪的同时，也从未忘记过指责最为根本的国家战争责任和当时的结构性问题。汤浅说：

当前的日本状况与战前 的日本越来越相似，假如我们不去连续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验，就会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将那段历史抹杀得一干二净。加之目前美化战争的风潮又有所抬头，我辈切不可松懈宣传历史真实的责任!

对于汤浅而言，认罪活动是他贯彻终生的举措，是他在有生之年为自己确定的赎罪之路。

**第四章　日本宪兵在亚州的滔天罪行（西谷稔）**

西谷稔（现住兵库县，84岁 ）一直在家里撰写自传。他常常因病住院，只要稍许好些，就又坐到书桌前笔耕不断。

他说：“我想这是我一生中的最后认罪，写着写着，泪水常常夺眶而出，只好躲着妻子跑进洗手间。”

每当西谷想起13岁的刘姓少年，便泪流不止。1940年5月前后，他随同野战宪兵队参加了广东省顺德县内的村庄扫荡。那次扫荡，日军抓到游击队长的儿子，年仅13岁的小刘。开始西谷让小刘干些杂务，准备以后让他为日军当密探。但是西谷的同僚们叫嚷：“不能让他活下来”，这种呼声越来越高，终于宪兵队长下令：“把他干掉！”西谷只好将另一案子的罪行裁脏到小刘身上，写成材料上报。

一天，小刘与其他十几个人一道，被日本宪兵反绑双手、蒙上眼睛，带到佛山市郊的一个墓地。由于小刘又哭又闹，难以用日本刀斩首。西谷骗他说：“你要是不哭，我就放你回你妈妈身边去。”孩子停止了哭泣，问:“真的？”西谷一边说:“还能假么？”一边绕到少年身后，假装给少年解绳，向少年头部开了枪。

“每当想起这件往事，我就觉得自己真是罪该万死。”他喃喃自语后，将手指移向眼镜后面，擦拭泪水。当然，他的罪行远不止这些，真可谓罄竹难书。

西谷之所以能够承认自己的许多罪行，并能站在受害人立场反省自身，全因抚顺战犯管理所为他提供了认真面对自身的机会。

日本战败后，西谷先是被前苏联拘押在西伯利亚地区，后于1950年7月转移到了抚顺战犯管理所。这是因为他在中国作恶多端，当作“战犯”处理。开始阶段，他觉得：“全是奉上级命令，我有什么办法”，同时又怕：“要是自己的罪行暴露了，那就糟了”，满脑子净在考虑自己的安危。西谷以本身的经历推测，要是坦白自己的罪行，只能以命抵偿，处以死刑。于是，他下定决心绝不交待。

来到抚顺两年后，西谷患阑尾炎住院手术。管理所的班长和护士们对他照顾得无微不至，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着实感动了他。他想：战时我们遇到患病的中国人，不是说：“管他是死是活！”就是说“砍了他！”……他在抚顺的病床上回忆起自己的桩桩往事，悔恨的泪水夺眶而出。

一、希望尽早出人头地

1916年8月，西谷出生在兵库县川边郡的有七反 地的农家，上面有两个哥哥，家境属中下水平。父亲在他小学四年级时就撒手人寰，但生前一直在说：“天皇陛下是活在人世的神”、“我只希望这孩子当军人，军人将来有养老金，一辈子不愁生活”。但是西谷自小就胆小：死一只老鼠都要为它超度；每遇左邻右舍办丧事，夜里从不敢走出家门一步，可以说是个心慈手软的好孩子。

高等小学 三年毕业后，西谷16岁进入“阪急电铁”公司。他当时的最大心愿是当一名电车司机，早日出人头地。但他马上得知：没有当过兵的人，是很难能当上司机的。为了能早日当上司机，19岁便志愿参加了“堺部队” 。

一日，训练中见到一个只有上等兵军衔的宪兵来到部队。一些军人，军衔虽然比那宪兵高，却都对他表示敬意。看到宪兵明显地高人一等，西谷改变了主意：与其这样当兵，每天都在脏兮兮的地方受苦，还不如当一个宪兵，又快活又能早日出人头地。他终于报考宪兵并通过了考试，1937年11月结束了东京的训练。先是分到和歌山宪兵分队，后又调到大阪宪兵队本部。

就在他当上宪兵的时候，1937年7月卢沟桥打响了日中战争的第一枪，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他无法眼巴巴地看着同期的宪兵们相继奔赴中国战场，便向长官提出申请：“请尽早派我上前线。”当时他特别希望早立战功、出人头地。他说：“没有比上战场更好的事了，因为前线能一举满足我三个愿望：为天皇而战，为门第而战，为自己早日出人头地而战！”

二、捏造罪行，肆意屠杀

1939年10月，西谷调到广东任第五师团的随军宪兵。翌年，调至广东宪兵队佛山分队。在调到中国一个多月后的一天，西谷首次杀了人。那天共杀死了三、四个中国人，西谷砍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

佛山郊外的公园一角。宪兵队长命令：“西谷，你干掉这个！”西谷双腿不停地颤抖，用力挥刀砍下，却只砍断了脖颈的三分之一不到。男人跌进事先挖好的坑里“哎唷哎唷”地痛苦喊叫，原地打滚，怒视西谷。宪兵长怒吼：“刺他心脏！”西谷站在男人左后方，对准心脏部位用力刺去。当时的感觉和拔刀时鲜血直喷手指的情景，西谷至今都刻骨难忘。因为突如其来的巨大刺激，西谷当晚饭菜难咽，整整一周时间，每晚都为恶梦所魇，难以自制。

“虽然当时并未把中国人当人看待，但是杀人之前，我确实很不情愿。然而长官命令是不能违抗的！”满面痛苦的西谷如是说。

自此，西谷每月都要监督部下杀人，而且他本人也动手砍人。被杀者全是“抗日活动嫌疑犯”。每次被杀者，少则几人，多时可达20人。实际上有的人本无证据，只要宪兵队捏造一份“坦白交待”口供报上去，就会得到广东宪兵队队长的批准。

1940年8月前后，得到“发现游击队”的情报，西谷宪兵军曹 亲率一队身着便衣的士兵，偷袭了顺德境内的一个村庄。他们抓来了十五个25－40岁的男人和一个20几岁的女人。经佛山宪兵分队西谷等人审问调查的结果，判定这些人全属无罪农民。西谷等人本想过两、三天后就放他们回家，暂且将男人们关进两间屋子，让一个女人睡在走廊角落，令一名辅助宪兵 看守。午夜这名辅助宪兵强奸了那女人，女人又将此事告到值班宪兵。

宪兵分队长陷入困境，事情如果仅仅发生在一个女人身上还好办，现在是一个日本辅助宪兵在十几个中国男人的面前强奸了那个女人 。宪兵队出现这种丑闻，一则怕传到其他部队里影响宪兵形象；再则怕中国人借机大作文章。最终分队长下令：“这伙人不能释放，全部干掉！”并命令西谷捏造送递上级的报告：“某某等组织游击队袭击村庄……，又将日军情报偷偷送给中国方面……。”西谷如此胡乱编造了一份报告，上交给广东宪兵队队长，请求处以极刑，几天后收到准予处死的批复。

两三天后，他们将这十六个中国人全部押上卡车，运到佛山郊外的一处墓地。辅助宪兵们早已挖好了一个大坑。中国人在炕沿儿一字排开，他们无一人喊叫，但是全瞪圆了眼睛怒视西谷等人。宪兵蒙上了他们的双眼，一一砍下了他们的头颅。

“因为砍杀人头也是显示胆量的机会，所以宪兵们争先恐后，竞相砍杀中国人。”西谷回忆当年说。

西谷已用战刀砍死过十几个人了，这次他只砍了一个男人。先是让那男人跪在地上，并令其微微仰头，身体前倾，西谷将含在口中的水喷向刀刃，转到那人的左后方，“嘿”地一声举刀砍下，男人顿时尸首分离，鲜血喷涌，溅向四处。最后，渡部军曹说：“让我来砍那女人。”

西谷嘴里嘟囔道：“那女人的头飞出一米多远，头发唰地一下骤然飘向四方。虽然时间已划过几十年，当时的情情景景，至今仍历历在目，永生难忘。真是太可怜了！”

完全没有任何“罪证”的十六个农民，就这样被斩首后埋入了坑里。分队长将一束香点燃后插入土堆，开始双手合掌，诵经超度。事后，他向大家说教：“不论生前干什么坏事，死后都可成佛。”

西谷回忆往事，紧握双拳、异常愤怒地说：“让别人去砍人，过后又说这种话，真是恬不知耻！”

三、拷打就像家常便饭

西谷在佛山宪兵分队的约两年时间，以审讯为由，对数百名中国人施以暴力。其中40多人遭严刑拷打，也有被强灌凉水灌死的。只要宪兵认为此人可疑，便先定罪，严刑拷打，直至提供“情报”为止。

日本宪兵对抓来的中国人，用青竹棍遍打全身，可谓家常便饭，另外还常用火刑拷问：先把裤子扒掉，两手反绑悬空吊起，只听“嘎巴”一声，两关节脱臼，双臂立刻反转180度，手从背后转向上方。只这一招儿已是常人难忍之刑，然而宪兵们还要点燃报纸，从吊在半空的人的脚掌逐渐向上燎烤，直至阴部。

西谷说：“他们之中不少人经过严刑拷问，最终被处死。即使有个别人被释放回家，但由于双臂脱臼，已成废人；严重烧伤者，放回家后也活不了多久。由我亲自拷打、审问的人，死掉的至少也有几十位，我真的是问心有愧啊！”说着说着他惭愧地垂下了头。

四、在东帝汶，也是如此

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开始对美、英、荷等国宣战。翌年1月，西谷曹长等十几名宪兵集结香港，被编为东方支队的随军宪兵。他们经过日本占领下的菲律宾棉兰老岛的达沃，1月底抵达荷属安波那岛，参加2月中旬偷袭位于荷属帝汶岛西南的古邦的登陆作战。

随后，西谷调到葡属东帝汶的帝力。一天，西谷以抗日嫌疑，抓了当地土著七、八个人。审问中因翻译水平太差，词不达意，长官气急败坏，命令西谷：“怎能如此罗嗦，给我全部干掉！”这些土著人被带到帝力郊外一处长着高大仙人掌的砂地，先让他们自己挖好大沙坑。在即将行斩时，同来的宪兵全都夹起了尾巴，无一人肯向前靠。西谷曹长只好无奈地表示：“我一个人来！” 七、八个男人跪成一行，全部由西谷一人从身后一一砍了头。同来的一伙人将尸体抛入坑中，用砂土掩埋后，扬长而去。

西谷在帝汶岛的一年期间，不时抓人、审讯、上刑施暴，做恶多端。1944年5月他被调往荷属爪哇岛的雅加达。

“在帝汶岛我也干尽坏事，丧尽天良，啊！”西谷回想当年情景，长叹一口气，瘫坐在地上。

五、无论老少，一律骗杀

1944年5月至日本战败投降，西谷调往伪满洲国牡丹江宪兵队分队。1945年8月9日，苏联红军发动总攻。混乱之中，西谷先让二月才刚结婚的妻子先行逃难到后方。

就在此时，分队长（少佐）命令西谷担任掖河宪兵分遣队队长。当他抵达掖河，看到净是从前线溃退下来、乱作一团的部队和人群。到处是黑烟，远方的掖河监狱上空也浓烟滚滚。西谷曹长来到掖河宪兵分遣队，随即带领刚刚见面的新部下来到大桥担任警戒，这时牡丹江宪兵队队长（大佐）突然前来下达命令：“押送一批掖河监狱里要犯的卡车掉进沟里翻了车，速速赶去将要犯们全部处死！”西谷带领两名军曹急忙来到翻车现场，看到十二、三个40-50岁的人，全戴着手铐、脚镣，满身血渍，伤痕累累，被围在一处。一个负责看管“要犯”的日本人向西谷说：“这里就交给你了。”

西谷心想：“这一定是一批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人物，本想押送到后方，没想到在这里翻了车。”他命令两个部下：“拔刀！”然而两个部下不知所措，迟迟不肯拔刀。西谷明白，这是两个从未砍过人头的宪兵，不能过份勉强他们，只听他喊了一声：“你们看着！”正要拔刀砍向眼前的男人时，那人突然用流畅的日语说：“宪兵先生，请救救我，拜托您了！”

西谷回首当年道：“当时他用日语求我，真叫我犯了难，假如真的留下他，再来一个说日语的咋办？我只能横下一条心。”重新振作起来，怒吼一声：“你胡说什么！”手起刀落，将那人的人头砍下。接着他又砍杀了另外四、五个人。由于天气炎热，此时他已汗流浃背，无力再挥刀，便改用手枪射穿了其余七、八个人的头颅。“犯人”们的鲜血“咕嘟咕嘟”地喷涌，周围已是血流成河。

“那时我已不是人，变成了魔鬼。我已下定决心参加敢死队，在与苏军战斗中玉碎而死 ！”然而日本投降几天后，分队长下令解散部队。西谷认为：与其当苏军俘虏，不如战死更痛快，想去投奔一个亲日派汉奸大老，在那里等待日军东山再起。他带领12人部下，但所到之处不是中国人的自卫队就是苏联红军，他们只好在深山老林里转悠，半路上偶遇敌人，便化整为零，分散行动，到后来西谷身边只剩四、五个人随从。

三天后的傍晚，他心想：身着日本宪兵服过于扎眼，便为抢夺便衣和口粮袭击了一家农户。那家农户只有一个25岁上下的男人，西谷用枪抵住那人的胸膛，厉声高喊：“举起手来！”部下为他当翻译，另一名部下则将青年绑起。他们翻箱倒柜，凡能派上用场的衣服和粮食全部抢走。出发时，西谷突然意识到：就这样撂下这个中国人不行，万一他通报出去就全完蛋了。于是命令他带路，但那人以“不认得路”为由拒绝带路。西谷气急败坏，扇了他几耳光，硬拉他一起上路。走不远来到深谷边缘，那人说再往前的路他也真的不知道。此时西谷认定：此人抗日意识太强，便喊了声“等一等！”战刀随声砍下，那人当即尸首分离，鲜喷涌血，跌落深谷。

“快走！”西谷催促部下，走了一段路，又见到一家农户。此时太阳已快要落山，西谷一行换上刚刚抢来的便装，来到这家农户。家里只有一位60岁上下的老汉，西谷等人谎称自己是迷了路的开拓团 成员，请求留宿。善良的中国老人见他们身处困境，不但允许留宿，而且还亲切地说：“家里有粮，全在这里，你们自己做些饭吃吧。”从拉家常中得知：老人的老伴三年前去世，家中只有儿子和他两个人。儿子今天到山下的一个村子去了，明日早上就要回来。西谷等人闻后大感不安，心想：如果他发现了我们的武器，通报出去就全完了。

西谷命令部下将老人绑到柱子上。老汉默然无语，愤恨得全身颤抖，怒视西谷等人。当晚西谷命令部下轮番看守老人，自己则美美地睡了一觉。

次日醒来，已是太阳高照。西谷心想：“不好！他儿子回来就要出大事”。命令部下立即做好出发准备，自己则把老汉拉到屋后的菜地里。“我让他坐下，从身后……用战刀……砍下了他的头。哎呀，罪孽呀罪孽！”西谷回想当年，饱含热泪，抽搐不已，磕磕巴巴地讲述道。

周围一片鲜血，来不及掩埋尸体，胡乱砍下些南瓜叶子覆盖在上面，匆匆逃离了现场。

不久他们为苏军捕获，成了俘虏。

如本章开始所述，西谷被送往西伯利亚关押所，在那里他一面从事超强度的体力劳动，一面遭到来自其他日本俘虏的批斗和欺负：“西谷是宪兵，让我们吃尽了苦头！”苏联方面审问西谷屠杀中国人等罪行，他一概不承认；对于由他负责过的拷问，他也只以“用棍棒稍微敲了敲”蒙混过关。1950年7月，西谷被转送到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

六、我有责任告诉子孙

在抚顺的病床上，西谷心中交织着愧疚与感激之情，泪流不止。他想：“我曾经那么无情地残害中国人，但这里的看守人员却对我如此亲切。自入院以来，他们千方百计做好一日三餐，照顾好我的身边琐事，就连我这种人都能得到如此宽待……”不能不说他的这种感激之情确系发自内心。然而这些只是他的“感性认罪”。当他病愈回到管理所房间，恰逢关于“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学习讨论进入高潮，不久认罪、坦白运动开始。

虽然西谷心中强烈感到有愧于中国，但另一方面又觉得自己罪孽过于深重，心想：“只要说出去，准判死刑。”始终跳不出这个思想怪圈。随着学习讨论的深入，他逐渐认清到以前自己一直坚信不移的“日本帝国主义思想”是个极大错误。此刻，他思想方面的两种矛盾开始了严重撞击。

对于那些没有上级命令而犯下的种种罪行，绝不可泄露出去。说了必死无疑！

你杀死了几十人，还想逃脱？难道你听不到被你杀害的人及其遗属们的呼叫声么？

这种自我问答，不停地缠绕着西谷，令他夜不能寐。

一天，一个日本人跳入粪池图谋自杀，中国看守人员不顾自己性命，跳入粪池救起了那个日本人。

消息一经传开，我非常非常感动。原来思想中的那些疑虑消失殆尽，决心将自己的罪行抖搂干净，从心底深处向中国人民谢罪，心服口服地接受任何严厉的惩处！

西谷对我讲述当年自己的思想转变过程。

不久西谷公开了自己的所有罪行，向管理所提交了坦白材料。几天后，他被召到调查官员那里，调查官员指着桌上的材料对他说：“你自己看看。”十几份材料全部来自广东省南海县、顺德县，有名有姓，全是揭发西谷的检举信件。其中有的检举材料上还贴有西谷当年所写材料的照片。虽然检举材料均为中文所写，但西谷深信其中内容真实无误。每份检举材料的最后都写有：“请严厉处置宪兵西谷稔！”这些材料，无一不是来自受害者本人及其家属的血泪控诉。

“啊！”西谷顿时头晕目眩，难以自制。他立即下跪，泪流满面，反复谢罪道：“实在对不起！实在对不起！”调查官员看过西谷的坦白材料后，和气地对他说：“虽然坦白还不很充分，但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能说明问题的。希望你今后进一步加强学习。”后来西谷被委任为室内的生活组长，在加强自我认罪的同时，还帮助室内其他同伴进行认罪、坦白学习。

1956年夏，西谷受到中国政府免于起诉的宽大处理，准予回国。此后，他一直依据自己的亲身体验，在日本国内，进行日本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真实情况的宣讲活动；同时还积极参加在中国援建希望小学和图书馆的活动。

1972年他出版了《我在中国干了什么》 的小册子，追忆自己的部分罪行和认罪的痛苦过程，并分别寄给了自己的亲友。但是，战争中失去丈夫的妹妹却对他说：“你那小册子令人作呕，我把它烧了！” 回国后一直过往甚密的原牡丹江宪兵分队上级来信写道：“你写的那个小册子，令人难以读下去，我烧了。今后你再也不要给我来信！”表明与西谷断交。

我曾经犯下那么多滔天罪行，所以有责任讲述侵略战争的罪恶，将它告诉我们的下一代。如果我们保持沉默，就会有人把它抹得干干净净，将来还会重蹈覆辙。我们应该将这些侵略事实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西谷以极其认真的表情对我讲了上面一席话。

每当西谷回想起那些累累罪行和在抚顺的痛苦认罪过程，便止不住泪如泉涌，他那本《自传》也就进展缓慢。

2001年4月23日，西谷因病离开了人世。

**第五部 军官的自豪感**

**第一章 军官的自豪感，杀害牟高轩烈士（鹿田正夫）**

鹿田正夫（家住岛根县，82岁）在鸟取市所做的侵华罪行证言，深深地震撼着每一位听众的心。

我们如果没有加害者意识，就不能体会到受害者们的心情，更无法站到他们的立场上去。我之所以能够说出自己在战争中的罪行，是因为我的良知在抚顺得到了复苏。

日本战败后，鹿田当了苏联的俘虏，在卡扎夫斯坦共和国关押了一段时期后，于1950年7月被移交到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

当初我心里恨透了苏联，心想怎么就非得把我移交到中国去呢？那些比我更残酷的家伙们却反倒都能回国，为此愤愤不平。同时一想到自己在中国所犯下的种种滔天罪行，就吓得发抖，担心会受到报复。所以暗自下定决心：无论如何，绝对不吐露半点自己的罪行！

被移交到抚顺战犯管理所约两年后，兴起了一股学习热潮。鹿田也开始热衷于学习从被压迫者的立场去看待日本历史、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等问题。这时，鹿田因得了末梢神经炎，行走有些困难，视力也有些下降。因此管理所让他住进了所内的医院，受到了大夫、护士们的精心治疗和细心照顾。

按照饮食疗法，每顿饭他都可以吃到一个鸡蛋，这样前后吃了一个来月。有一天，鹿田对温久达医生说：“大夫，把我吃的鸡蛋给停了吧，我都吃腻了！”他本以为会挨训：“你在说什么呢！”可温大夫却微笑着说：“是么？但对你来说，这可是药啊！你再稍微忍一忍吧！我让他们给你换换做法。”

这天晚上，鹿田在自己的被窝里暗自流下了热泪，心想：“迄今为止，我对中国人都干了些什么事儿呀？从来没有正儿八经地给他们吃过饭，更谈不上给过他们什么药物。岂止这些，我还杀害了那么多的中国人。可是人家反过来对我倒这么亲切，给我精心的治疗和照顾。我对人家温大夫都说了些什么呀！”

整整一宿他彻夜未眠，一直在回顾自己迄今为止的人生轨迹，回想自己在中国所犯下的种种罪行。

想当军官，出人头地

鹿田于1918年11月出生在岛根县出云地区的一个小村庄，兄弟姐妹五人，他是老小。父亲在学校当了多年教师之后，继承了祖业，酿造酱油，晚年还当上了村长，家庭生活相当丰实。他父亲还是个彻头彻尾的天皇崇拜者，对子女的教育非常严格。鹿田毕业于出云的大社中学，两年后升入东京的善邻高等商业学校（旧制）。在中学和专科学校的八年时间里，他被彻底地灌输了天皇崇拜和军国主义思想。同时还热衷于剑道，毕业时已达到了四段水平。1941年3月，22岁的鹿田毕业后来到上海，在一家日本的国策公司当了一名会计。回顾当初，他说：“我这个人出人头地的欲望非常强，心想一定要在中国干出一番事业来！”

可是那一年他却在上海接受了征兵体检，12月1日开始在岛根县滨田接受了新兵的入伍教育。在这里受尽了老兵们的欺负虐待，不知被殴打了多少次。做人的良心和自尊心，也因此受到了彻底践踏。鹿田回忆道：“新兵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抹杀他们的人性。要把他们训练成为一个唯命是从、勇往直前的机器。”

结束了三个月的新兵教育后，鹿田来到了中国湖北省荆门县，分配到第39师团232联队第1大队第4中队。这时，鹿田“想当上军官，想出人头地”的想法愈发强烈，于是参加了干部候补生的考试并顺利通过。在入伍教育的最后阶段，他们又进行了刺杀活靶子训练。一个大约三十岁的中国男人被反绑在树上，作为30多个新兵们的“训练教材”（活靶子）。鹿田因为是干部候补生，不能被人看起来显得“态度消极”，所以抢先排了在第一个位置上。可是这时班长却喊出了口令：“向右转！”这样一来，他就排到了末尾。最后，他毫不犹豫地用刺刀一次次地刺向早已血肉模糊的男子胸膛。鹿田回首当年道：“当时心想：惩处这些敢于向优秀的日本人挑衅的劣等中国人，是为了国家，也就是为了天皇陛下，甚至对自己往上爬也有好处，所以心里一点也不感到有什么矛盾。”

之后，鹿田考入了南京的预备士官学校。毕业后作为见习士官，回到原大队第2中队，当上了小队长。从1943年初开始，在湖北省一带与国民党军队作战，反复对附近村庄进行了扫荡。1943年12月初，晋升为少尉。

三光政策，确有其事

1943年12月下旬的一个傍晚，鹿田少尉等小队长以上的军官被召集到老场的联队本部，联队长滨田大佐下达命令：“明天早晨，扫荡白杨树村 ！那里是抗日根据地，村民全都通敌，你们可以杀死包括妇女、小孩在内的所有人，所有物质都要收缴过来，最后要把所有的房屋全给烧掉！”回到部队，他向自己的部下进行了传达，他们都手舞足蹈，欣喜若狂。鹿田解释说：“因为这样就可以干些抢劫之类的事儿，士兵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所以大家都盼望着执行这种去村庄扫荡的任务。”

“白杨树村”坐落在大队本部附近，是个约有百户人家的小村庄。对于活跃在这一带的抗日游击队，日军实在是束手无策，非常头痛。以第一大队为主力的部队半夜出发，确定了要攻击的各个要点。鹿田小分队承担着攻打靠近小河边七、八户的任务。拂晓，鹿田小队长命令部下分成三个班开始突击。住户的大部分人从屋里跑了出来，拼命往小河的河岸逃跑。鹿田命令轻机枪射手：“射击！”霎时间，女人、孩子以及裹脚的老婆婆们一个一个中弹倒下，20~30人相继被击倒。已经逃了出来的人，都被部下用刺刀一个一个地捅死了。接着他们把村里农民的财产——猪、牛、鸡和各种各样粮食，全都掠夺到广场上来了。

过了一会儿，鹿田和勤务兵为了查点，走进了一户人家。勤务兵报告，里面还有两个活着的中国人。拐了几步走到里面后，发现有一间仅仅六、七平米的小房间。早晨的阳光从挖出的小窗耀眼地射进屋里，里边有一个50岁左右的老农民，急得不停地打哆嗦，张开两支胳膊挡在前面。在他身后有一张小小的床，床上睡着一个20多岁、脸色蜡黄的姑娘。“太君、太君，我女儿有病，好歹留她一条命吧！”说完泪流满面地跪在地上磕头。

“要是我当时哪怕还有一点点良心，就会觉得实在是于心不忍。可那时，对于这样的哀求，我只感到非常恶心。心想：哼！敢于抵抗优秀大和民族的小小臭虫，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鹿田命令勤务兵：“用刺刀捅死她！犯不上浪费枪子儿。” 可勤务兵的刺刀却在哆哆嗦嗦，怎么也刺不下去。鹿田怒吼：“快点儿，给我干掉她！”这时那个父亲又大声哀求：“太君！”跪在地上，紧紧地抱住鹿田的腿。就在这一瞬间，“砰”的一声枪响了，满屋子里充满了火药的气味。

“我就是这样当着那个父亲的面，让勤务兵把他女儿给杀掉了。……不，不，我现在才明白：其实是我自己把她给杀掉的！”鹿田泪流满面，哽咽地继续他的演讲。

“哎呀！哎呀！老天爷呀！” 父亲爬到女儿身边，不断地哀号着，鹿田和勤务兵把他硬拉出了屋外。男人口里喊着：“日本鬼子！日本鬼子！”不停地又哭又闹。鹿田命令勤务兵：“放火烧掉！”霎时间，屋子连同姑娘一起被包围在熊熊烈火之中。之所以没有当场杀死那父亲，是因为要让他们搬运抢来的东西。

“我们把他和另外几个男人用绳子连成一串，让他们扛着我们抢来的、还在滴着血的鸡呀，其它粮食呀等东西。整个村子到处是被日军屠杀的村民，尸横遍野，血肉模糊。在这次对白杨树村的扫荡中，大约杀死了200多村民。”

“有人说三光政策 纯粹是无稽之谈，是谣言。但是我却不能否认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事实。而且我也绝对不允许有人抹煞历史！”

鹿田一面擦着眼泪，一面向会场的全体听众大声疾呼。

初试军刀……

鹿田少尉在这次白杨树村扫荡之后，很快就被提拔到位于当阳的联队本部当情报主任。他的主要任务是：领导中国密探获取中方的情报；查处抗日分子，并进行盘问审讯；同时还兼任“宣抚班” 的班长，负责驯服当地老百姓。

鹿田就任情报主任后不久，大约在1944年初左右，在联队本部驻地内的俘虏关押所（兄弟部队）负责人鹈野晋太郎少尉 来邀请他：“今天要拿两个俘虏来试刀（砍头），你也来试试！”鹿田痛快地答应说：”好，让我试试！”

在这之前，我还没有用军刀砍过人头。这让我总感觉比人家矮了一截似的。我可是个军官，还是剑道四段呢！心想总该砍上一次人头才行！

鹿田被鹈野少尉领着，来到了联队本部尽头的一棵大柳树旁边。过了一会儿，从俘虏关押所拉出来两个中国汉子。鹿田周围聚集了情报班的部下，等着看热闹。首先，鹈野少尉让一个汉子跪在地下，弯着身子，与地面基本平行，最后挥舞起日本军刀，斩下了那个汉子的首级。

轮到鹿田，他让另一个30岁上下的汉子跪在地下。

我对这个中国人没有丝毫的同情心，也不关心他是怎么被抓来的。只不过从个人兴趣出发，想试试自己的本领，想如何才能在部下面前显摆显摆，潇洒地砍下人头。其实自己心里倒并不讨厌这种砍头试验。

鹿田毫不哆嗦地挥起了日本刀，把那个汉子的脑袋完整地砍了下来。那时候鹿田只是想：闹了半天原来这么简单哪，由此信心大增。后来，又在同样地方，和鹈野少尉一起试刀，进一步增强了信心。

解剖活俘虏

到了1944年8月，鹿田已经完全习惯了这里的任务。在联队本部附近和国民党部队的一次战斗中，捕获了一个年近三十、脚部负伤的中国军官。鹿田企图把这个男人训练成自己的密探，便把他带回联队，对鹈野少尉说：“我想让他给我们收集情报，拜托啦！”于是把他收进了监狱。可是后来，因为自己忙于胡编乱造撰写“战斗详报”，加上还有其它一些琐碎杂事，就把这个男人的事情全给忘了。

过了十来天，联队本部的军医近藤中尉说：“鹿田君，那个俘虏怎么办呀？他的脚已经得了坏疽，不锯断就不行了。反正也当不了密探了，你就把他给我吧！我这儿正好需要给新来的卫生兵找个活教材。”经这么一说，鹿田这才想起他的那个俘虏。虽然多少感觉有些遗憾，不过也没办法，就回答军医说：“好吧，知道了。”

第二天，鹿田受近藤军医邀请参加“手术练习”，一起跟着去了联队本部的医务室。他们走进屋子时，俘虏已被紧紧地捆绑在门板上，还用一种“哀求似的神情”回头看了鹿田一眼。因为他的伤口并没有进行过什么处置，就那么一直搁着，所以得了坏疽，整个脚都有些发黑，肿胀得很厉害，而且开始腐烂，散发出阵阵恶臭。整个人好像也没有吃好喝好，身体显得非常虚弱。“那时候，我一点也没有觉得他有什么可怜。只是想这个家伙既然已到这一步了，还真没有什么用，这么一个大累赘，能够这样甩掉不是挺好嘛！”鹿田努力回顾当年自己的心情。

大约有十五名左右的见习士官、卫生下士以及卫生新兵们围在“活教材”的周围。近藤军医也不进行麻醉，就开始咯吱咯吱地去锯男子的那条腿。男子疼得撕心裂肺般地大喊大叫，拼命挣扎。一个卫生下士实在看不下去，忍不住说：“军医长官，这样锯恐怕不行吧！”军医说：“真没法子，那就打一针吧！”说完便往静脉里注射了空气。男子“哼”地叫了一声，一下子呼吸苦难，全身瘫软。军医也不给他止血，又继续锯那条大腿，终于把那条腿给锯掉了。鹿田问：“下面还干什么呢？”军医说：“压轴戏还在后边呐，你就等着瞧吧！”不过鹿田感到有些恶心，就离开了那间屋子。后来听说，他离开以后，那个男人被剖开肚子，内脏被拿出来给大家进行讲解说明，就这样被杀害了。

鹿田在抚顺的病床上，想起这一段历历往事，禁不住热泪盈眶，心想：“我把中国人当成虫豸一样对待，妄加杀害，可这些中国人却这样亲切地照顾我……”

杀害牟高轩烈士

牟高轩烈士的事迹更是令他终生难忘。鹿田刚刚就任情报主任的时候，牟高轩正好担任联保主任，负责管理着附近的好几个村子。听说他以前还曾当过校长，在中国人之中很有威望。鹿田早就想利用他当密探，所以三番五次找他，要他提供有关抗日分子的情报。可是牟高轩总是支吾推脱，一会儿说：“实在太忙了，干不了”；一会儿又说：“这样就会失去人们对我的信任了”等等。由于鹿田紧追不舍，有时牟高轩就搪塞道：“要是有情报，我就告诉你”，最后甚至干脆躲了起来。鹿田说：“牟高轩大概在遵守作为一个中国人的信义吧。”

不久，有消息说：“姓牟的把日本军队的情报传递给敌人” 。鹿田想：“看来这家伙还真是通敌啊！”就让部下和密探到处搜寻。几个月后，从河对面的炮兵联队传来消息说，已经抓到了牟高轩。牟被带到了联队本部，可把鹿田气疯了。他把牟高轩反绑起来，吊在天花板上，拿竹刀 使劲地抽打一通。“你干吗要逃跑？是不是你本来就是中国的间谍啊？”对于鹿田这些纠缠不休的盘问和拷打，牟高轩只是坚持回答说：“我不过是讨厌给日本人当密探，就跑了。”之后鹿田把他监禁在禁闭室里半个来月，只给他吃些残羹剩饭。对他受的伤也从不处置，就这样一次次地、反反复复地拉出来盘问、拷打。但无论如何拷问，牟高轩从不吐露半句，身体却一天天地衰弱下去。但他从不说什么“饶了我吧！”之类的话，好像已经下定了必死的决心。

考虑到如此再审问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鹿田决定对牟高轩处以死刑，并准备在以前砍过两个中国人头、联队本部的那棵大柳树旁边执行。他先让士兵们挖好一个大坑，然后把牟高轩带到坑边，双手反绑，让他跪下。周围聚集了20多个来看热闹的日本士兵。鹿田一手拿着日本刀，得意洋洋地向大家炫耀说：“普通斩首谁都会，可作为一个剑道高手，要砍得只剩下最后一层皮。你们就好好看看吧！” 牟高轩已抱定必死决心，纹丝不动。鹿田站到牟的左后方，摆好了架势，只听得他大喊一声“咳”，手起刀落，恰如他事先吹嘘的那样，头颅被砍了下来，只剩下一层皮连着，耷拉在胸前。鹿田把牟高轩那溅着鲜血的尸体，一脚踢进了坑里。

“那时候，我根本没有考虑牟先生的死活。只是一心想让周围的士兵们，观看我漂亮的斩首表演罢了。”最后鹿田并没有把牟高轩的有关情况向上司报告，“其实牟先生……在文件上并不存在！”鹿田说。

躺在抚顺的病床上，一想起那些当年往事，鹿田就总会泪流满面地哽咽道：“实在太抱歉！我应该向大家谢罪！” 应该说，当时他的这些想法并非虚伪。但是，这种属于感情上的认罪只不过是认罪的第一步。对于这一点，鹿田本人也是后来才领悟到。

站在受害者立场上认罪

因为病情有所好转，鹿田又回到十六人一间的大屋子。这时大家的学习热情进一步高涨，开展了公开自己所犯罪行，深挖这些罪行根源的认罪坦白运动。鹿田虽然也认为自己干了坏事，可心里还在想：“许多事情都是奉长官的命令才干的呀！” 同时还抱有恐惧心理：“要是把自己的罪行一下子都说出来，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国啊。说不定还要被判刑呢！”于是，他就以战斗中的罪行为主，一点点地进行“坦白”。但是，管理所外的调查官员着手审讯后，开始要求他坦白担任情报处主任时期的罪行。即使到了这个时候，鹿田还是一面察言观色，一面像挤牙膏似的一点一点交代自己的罪行。犹豫了很长时间，最后他终于下定决心，将杀害牟高轩的罪行坦白出来。

但这并不是实际意义上的认罪，只是单纯的罗列罪行而已。说心里话，当时我只是希望能够早日回国才坦白的。因为我还没能站在受害者的立场上去认识问题。

从那以后过了一个多月，没有人再来找过他。有一天晚上，调查官员叫鹿田去，拿出来一张黑白照片给他看，说：“你好好看看这张照片！”照片中间可以看见有一个挖出了很多土的深坑，旁边整整齐齐地排列着从头到脚的人骨。而且，坑边有一个女人在悲哀地低垂着头，站在那里。调查官员问他：“你知道这是什么吗？”他对这女人并不眼熟，就回答说：“不知道。”调查官员接着说：“你再好好看看，总不至于把这棵柳树也给忘了吧？”他又仔细地看了一遍，这才发现坑边有一棵柳树。

“啊！这就是杀害牟高轩他们的地方！”看到鹿田已经分辨出来，调查官员接着告诉他：“站在旁边的女人就是牟高轩的妻子！”听到这里，鹿田全身一震，身体不停地哆嗦起来，人也站不住了，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他两只手紧紧地抓着那张照片，眼泪哗哗地往下流，一次次地高喊：“实在对不起！实在对不起！”然后爬在地上说：“请狠狠地处罚我吧！”调查官员和蔼地对鹿田说：“处罚不处罚，那是由我们决定的事情。我们认为你的坦白大致上是确切的，但仅仅罗列罪行并不是真诚的认罪啊。只有站在受害者的立场上，才能开始实实在在的认罪。你好好考虑考虑这个问题再学习吧！”

从那以后，他几乎夜不能寐。“被我杀害的牟高轩这些人，以及他们的遗属们该有多么痛苦、多么愤恨、多么悲哀啊！如何才能站到受害者的立场上呢？”这种想法终日萦绕在脑际，夜以继日地不停在思考。以前坦白的时候也有过失眠的日日夜夜，但那是在替自己担心，是站在“加害者立场”上的担心和不安。而这一回和上次性质完全不同，是站在“受害者立场”上来思考。在对自己产生无比愤恨的同时，也开始反省使自己变成如此毫无人性的恶魔的根源所在。学校里的军国主义教育；使人丧失人性、助长蔑视其他民族思想的军队组织；以及最根本的罪魁祸首——天皇制。到了这时，对于所有这一些，他才真正能够理性地开始反思。

1956年8月，由于中国政府的宽大政策，鹿田被免于起诉，9月回到日本。归国后，他也常常回想自己过去的罪行，继续努力认罪。只要有人打声招呼，无论何时何地，他都愿意去提供证言。

1991年12月，一次偶然的机会，鹿田在原联队本部宣抚班的秋原隆（家住岛根县，80岁，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会员）家里，看到了牟高轩的笔迹——写在一块布上的中国汉诗。据说牟在认识鹿田之前就和秋原关系密切，这首诗是专门写给秋原的。当然，秋原不仅不知道牟高轩是被鹿田杀害的，甚至连他已死的消息也不知晓。那块布上写着如下诗句：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

联保主任 牟高轩

“怀有如此高雅胸怀和志向的牟高轩，就是被我这双沾满鲜血的双手杀害的呀！”

看到这首诗，鹿田重新反思自己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并决心要终生继续自己的认罪活动。

【相关证言】

关于对“白杨树村”进行扫荡时其他士兵的证言：

除上述鹿田所做扫荡“白杨树村”的证言外，笔者还采访到下两名日本老兵的最新证言。现以笔者提问、老兵作答的形式刊载如下，

（1） 开本德正的证言

开本德正（家住广岛县，82岁 ）当时在第39师团第232联队第1大队第2中队服役（和鹿田在同一个中队）

问：你们当时为什么要去扫荡“白杨树村”呢？

答：当时（1943年12月），我们联队本部（老场）的周围，经常有抗日游击队出没。我们认为“白杨树村”是他们的根据地，所以决定把这一地带扫荡成无人区。

问：“白杨树村”是怎样的一个地方？

答：在山的断崖绝壁处，有一座白色寺庙，叫“白阳寺”。下面山谷间有一条河叫“沮水”，河边有个小村子叫“白杨树村。”

问：对那里是怎样进击的？

答：我们第二中队半夜出发，在村前的半山腰待命。等到拂晓时分，野战炮就开始轰隆轰隆地炮击村庄，以此为信号，士兵们开始向村庄突击。我当时是中队长的勤务兵，开始的时候和连长在一起观察形势。不久，听到村子里到处是人们的哀号、呼喊，看到许多房屋已经被点着了火，冒起了滚滚浓烟。过了一小忽儿，我就和中队长一块从山坡走到村子中去了。

问：进入村子以后，情况怎样呢？

答：村民们被从各家赶了出来，集中到村子中央的广场上。几乎没有一个年轻男人，大多是女人、孩子，还有一些老人。到处是士兵们的疯狂呼骂声、村民的哀号哭喊声，还有摔坏东西的各种声音。士兵们将老百姓从屋子里驱赶出来后，把抢来的粮食和家畜都集中到了广场上。

问：开本先生，你那时都干了些什么呢？

答：我和中队长一起，查看各小队士兵们的行动。已经抢劫一空的房子，就会放上一把火。

我们走到了一间房子，正有一个新兵从房子里往外拉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头。可那个老头却两手合掌，赖着不走，嘴里用中国话说：“我有病啊，饶了我吧！你们千万别烧我的房子呀！”不停地哀求着那个新兵，赖着不出来。这时，我申斥新兵，吼道：“你这是干吗！老家伙不想出来，就别勉强他了！”说完，把那个老头推进了屋里，紧紧地关上了门。然后把高粱秸堆在门前，点了一把火。火焰转瞬间迅速升腾了起来，把整个房子给烧着了。

问：被集中到广场上的老百姓，后来都怎么了？

答：我们第二中队抓来的老百姓，都给赶到了广场的一块洼地。有几个士兵端着枪，看守着他们。村民大约有40-50人，几乎全部是女人、小孩和老人，他们互相抱成一堆，母亲紧紧地抱着自己的孩子，大家又哭又叫。

后来我和拖着抢来物资的日本士兵及中国苦力一起回到了大队本部，以后怎么样我就不敢断言了。但是留了最后一个小队，担任我们的警卫工作。听说上级命令他们：“对这些村民不论男女老少，全部干掉，然后再撤退！”我想很可能全都给杀害了。

问：其它中队都干了些什么呢？

答：我只知道我们中队的情况。我想其它中队干的大概也是同样的事儿吧。

（2） 小林武司的证言

关于小林武司（家住广岛县，81岁）的情况，请参看本文第三部第四章。

问：小林先生，你是怎么参加“白杨树村”扫荡的呢？

答：我属于第一大队的机关枪连，所以在拂晓前就来到了“白杨树村”前边约500米地，架好重机枪待命。步兵部队开进村子之后，仍在原地负责周围警戒。再后来接到联络，说扫荡已大致结束，就进入村口，并在那里架好机枪待命。

问：从那里能看到村里的广场情况么？

答：能，已经到了村口，广场就在眼前。

问：看见广场上什么情况呢？

答：看见广场上挤满了女人、孩子，还有老人，他们都坐在地上。我想总共约有150多人。旁边堆着抢来的粮食，还有鸡呀猪呀之类的家畜。大约有10多个村里的男人，肩膀扛着这些掠夺来的东西，大部分日本士兵押着他们，一起往大队（老场）方向去了。

问：聚集在广场上的老百姓，后来都怎么了？

答：剩下的士兵们用枪逼着老百姓，一群一群地被押进附近的各个屋里，然后把门堵上，放起火来。最后，各个屋子都已燃起了熊熊大火。

问：聚集在广场的所有村民吗？是你亲眼所见吗？

答：我想差不多是全部。我当时就在重机枪旁边看着，所以可以说是实际情形。后来我们马上也撤离了。

笔者：小林氏所提供的证言“在广场上聚集约有150人左右”（大意）之中，是否包括开本证言中的“第2中队所赶出来的40-50人”（大意），已经难以断定。但从现场的情况来看，应是将各中队赶出来的老百姓，收拢到了一个地方，最后一起处理（杀害）掉，这样理解比较自然。

**第二章 战争，就无法远离暴行吗？（曾田吉一）**

每年一到4月，看到我自己的小孙子，当时被我杀害的中国小孩子的身影就会叠影起来。已经过去六十多年了，要是他还活着的话，应该已有六十四、五岁了吧。但那个中国小孩的生命却被我抹杀了，当然也不可能有自己的子孙了。可我却有可爱的小孙子。真是无话可说……太对不起人家了……

曾田吉一（家住岛根县，80岁 ）老泪纵横，几次三番哽咽得说不出话来。

杀害孙子般可爱的小男孩

那是1943年4月下旬，曾田到中国湖北省担当机枪中队的小队长（见习士官）不久。大约1个月前，日本军队在天宝山和中国国民党军的战斗中，吃了个大败仗。为了报复，为了破坏“敌军”的阵地，日军向天宝山进军，决定烧毁周围的所有村庄，因为这些村庄被日军视为抗日根据地。长官下令说：“路上只要遇到老百姓，就把他们全部抓起来！”曾田自己也认为：“中队的许多战友都战死在这里，一定要替他们报仇！”心里也发起狠来。

记不清是在天宝山还是前面一座山的山麓，总之曾田他们正在行军的途中，忽然发现有六个人挤成一团，藏在一块大岩石的背后。曾田推测可能是一家子，有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以及两个小男孩儿。那俩男孩儿小的约五岁左右，大的可能是十二岁。一家六人挤在一起，特别是那个小男孩儿，把他的小脸紧紧地贴在爸爸的背上，缩在那里，可爱的小模样儿至今也令人难以忘怀。

曾田追上这个讨厌的“一家子”，把他们带到天宝山的山腰。因为“敌军”早已察觉到日军的进攻而退却，所以就兵不血刃地占领了那儿，并设立了大队本部。那里已经聚集了抓来的30来个老百姓。曾田就把抓来的六个人，全部交给了大队本部情报宣抚主任鹈野晋太郎少尉 。过了不一忽儿，鹈野少尉说：“带着这么多人，走不动啊。干脆都干掉算了！”这样就把包括曾田带来的六个人在内的30多人，分别赶进了几个中国军队所建设的碉堡 里边，然后把入口封死。本来鹈野少尉命令工兵用火焰喷射器把他们全部烧死，但工兵说太耗费燃料，于是决定使用炸药把他们炸死。往碉堡里边安装炸药的时候，里面的老百姓全都明白了，从碉堡的枪眼里听到他们的哀求声、怒骂声……。

“那时知道他们马上就要去见阎王了，我根本没觉得有什么可怜。况且我们的人已被他们杀了那么多，心想必须把这些中国猪全都干掉！”不一忽儿，连续传来两声“梆！梆！”爆炸声，碉堡里的老百姓都都炸成稀巴烂，掩埋在泥土里。

就这样，我们把跟战争毫无关系的老百姓全给杀死了。每当我看到自己的小孙子，脑海里就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个小男孩的身影，怎么也挥之不去！

曾田忍着眼泪说。

扼杀人性的新兵教育

曾田于1921年11月出生在岛根县出云市上岛町。他家是地主，耕种着约2.5公顷的水田和旱田，其余土地租给一些佃农。兄弟姐妹九人，他排行老大，家里希望他今后能继承家业。12岁小学毕业后，升入出云市的今市农业学校（学制五年）。毕业后本想报考东京的兽医学校，但因祖父反对而未能如愿。只好留在家里帮着干农活，在村里当上了青年团的头头，协助做些送村民去伪满洲国、为国家增产粮食等工作。

当时，人们常说“满蒙乃我国之生命线”。大家都相信“日本国土狭小，人口众多，今后粮食不足的问题将非常严重”。完全没有想过什么政治方面的矛盾。当时人们还认为朝鲜呀、中国呀都没有能力治理自己的国家，以为如果没有我们这些聪明的日本人来管理，这两个国家就难以稳定。于是就心安理得地认为，我们是不得已才进行战争的，只有这样才能使亚洲得到和平。”

于是，曾田迫不及待地想参军，并于1941年12月加入了在岛根县滨田的联队。出征的时候，患病在身的父亲曾贴着曾田的耳根子，悄悄地对他说：“我不要你什么建功立业，你不要太勉强自己啊！”可是儿子被功名心驱使，此后朝着军官的道路突飞猛进。在滨田接受了三个月的入伍教育。在这里，被强迫当“扒窃” ，人类最起码的良心和尊严被破坏殆尽，并被彻底洗脑，要求绝对牢记“长官的命令就是天皇的命令”这一铁的纪律。

想尽快砍人头

新兵教育结束后，曾田于1942年春天来到了中国。这时曾田已是一名干部候补生，从南京预备士官学校毕业后，1942年12月成为一名见习士官。当时，第39师团232联队第2大队的本部就驻扎在湖北省当阳县的老场。隔着一条干涸的小河，距离大队本部约300米开外，在一个叫干溪场的地方设有第二机枪大队的本部。曾田于12月末来此赴任，不久就当上了第四小队的小队长。而前任的鹈野晋太郎少尉转调到老场的大队本部，当情报宣抚主任去了。在情报班，对俘虏者可疑的抗日分子可以随意进行拘禁盘问，随心所欲，为所欲为。

当时，曾田的周围流行着“只有砍过人头，才有资格成为一名真正的军官”的说法。因为曾田还没有砍过一个人，就当上了小队长，所以他就去央求鹈野：“要是有合适的，务必让我砍一次！”他回首当时的心情说：“我只想尽早砍下一个人头，以免让手下的士兵瞧不起！”

1943年2月下旬（或3月上旬）下午4点左右，曾田正在吃晚饭，大队本部的鹈野少尉来电话：“有材料了，赶快过来！”曾田放下筷子，带着小队里资历最老的梅田上等兵，急急忙忙赶到了大队本部。一进屋，鹈野少尉对他说：“哦，曾田见习士官，你来了。要干掉的就是这个家伙，你就砍了他吧！”用下巴示意了一下桌子旁边。曾田一看，桌旁有一个肤色黝黑、一身农民打扮、大约25岁的汉子，双手反绑地蹲在那儿。看起来他是一个非常淳朴的老百姓，鹿田也有些于心不忍，不过想尽快砍个人头的念头立即占了上风，曾田高兴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鹈野、曾田和梅田三个人，带着另外两个拿着铁锹的士兵，把那个汉子带到了后边大约200米的一个小岗子。路上碰见大队长，大队长鼓励曾田：“见习士官，可要砍漂亮些啊！”被带的那个汉子一路上拼命地哀求：“太君！我可就是个老百姓啊，我从来也没有干过什么坏事啊！”可是曾田根本不去理会他。他们来到了小岗子，士兵们用铁锹挖好大约1米见方的一个大坑。然后把汉子拉到坑边上，让他跪下，曾田拔出了军刀，绕到了背后。就在要砍的时候，那个汉子又哀求说：“太君，求求你别拿刀砍，给我一枪吧！”

“当时中国人相信：如果人的身首分离，那就会真的死去；可如果是被枪打死，保留一个全尸，即使死了也还能够托生。”虽然按照武士道精神，不应该拒绝一个濒临死亡的人的最后愿望，可曾田觉得自己是为了砍头，才要来的这条汉子，若是用枪打死，就没有意义了。于是曾田绕到汉子的身后，嘴里假装着说：“知道了”，却偷偷地把手枪的弹夹退了出来放进衣袋里，然后绕到汉子前面去，把枪口对准了那汉子的前额。那汉子就那么跪着，闭上眼睛，看来已万念俱灰，唯有等死了。只听见那枪“咔嚓”一声，曾田嘴里故意说：“奇怪！怎么了？”歪着个脑袋，装作一副不可思议的样子。就这么反复了两、三次，总是没有子弹。于是曾田假惺惺地对汉子说：“我这把枪已经坏了，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再次拔出军刀，绕到汉子背后。当时曾田又紧张又害怕，两个膝盖不停地在打哆嗦。站在旁边的梅田上等兵说：“我来看看小队长是怎么砍的。”

曾田说：“我那时想，要是梅田回到大队，对别人说小队长是一边哆哆嗦嗦一边砍人的，那可就糟了。这次自己砍不好，那么将来就一定会被部下笑话。”于是暗暗提醒自己，不让梅田上等兵看见自己在打哆嗦，小肚子憋足了劲儿，用力岔开双腿，对准那汉子的脖子砍了下去。可是那棵脑袋只被砍掉了一半儿，汉子“扑腾”地一声翻了个个儿，掉进了坑里。他脸朝上，两眼恶狠狠地瞪着曾田，溅出的鲜血把他的脸染得通红。

那张好像要咬死人的脸，实在是太可怕了！……当时，一方面心里很害怕，另一方面又认为自己干得不漂亮，觉得很没面子。两种心情交错在一起。

曾田突然跳进了坑里，双手紧握日本军刀，骑在汉子身上，一次一次地捅那汉子的胸脯。那汉子呼哧呼哧地直喘气，嘴里和鼻子里不停地冒着血泡沫，从下面一直瞪着不停刺杀的曾田，终于力尽而死。曾田也从坑里爬了上来，但全身还忍不住地直打哆嗦。

就这样，我总算有资格当一名真正的军官了，当时确确实实内心有一种喜悦心情。但同时，我也终于开了杀戒……一种无法言传的恶心似乎更强烈地占据心头。还有，这次没有砍好真丢人，但愿这里的士兵不会对外宣扬说出去。种种思绪交织在一起。

带着这种复杂的心情，曾田回到自己的部队，把刚才放下的饭吃了个精光。当时，对于被自己杀害的中国人及其家属的痛苦、仇恨、悲哀，丝毫也没放在心上。倒是曾田还一直在想，下次一定要砍个漂亮的让人们看看。他对鹈野少尉说：“要是有合适的，再给我留个机会！”不过，从那以后却没有过这样“分享”的机会。

两个月后，曾田就参加了本文开头所介绍的“炸死平民百姓事件”。一个月之后，即1943年5月下旬，在一次江南歼灭作战中，对被追到一座石头山而走投无路的约3000名国民党士兵，曾田小队长率领重机关枪小队进行了疯狂扫射，一下子打死500多人。 到了夜里，曾田小队在担任作战地带警戒时，抓到一个20多岁的国民党散兵。先送到情报班审讯，然后把他带到院子里，当着梅田上等兵的面，一刀将头砍了下来。

因为这是第二次，完全没有第一次那样的心理包袱，甚至一丁点的恶心感都没有。倒是内心充满一种满足感：这下可在梅田面露了一手。

命令部下刺杀活靶子

从1944年1月开始，曾田少尉在当阳县淯溪河担任新兵教育的教官。与曾田自己过去所受的训练一样，训练目的就是要“完完全全地扼杀士兵们的人格、良心、尊严等，使他们成为绝对服从长官命令的杀人机器。”最后一关则是刺杀活靶子的训练。

曾田教官事先请求大队本部：“请给我们两个教材”。6月上旬的一个上午，他带着30多个新兵来到粉坊湾（村名）前边的大树下。记得那天天朗气清，阳光充足。士兵们在地上打下了木桩，不久其他联队的士兵押来两个中国男子。其中一人叫刘珍林，是个20多岁的青年，长期在大队本部干些零活，曾田也认识他。刘的后面跟着他新过门的媳妇，一路哭哭啼啼。另一个男子大约30多岁，据说因在日本仓库附近有可疑举动而被逮捕。曾田走到刘珍林的身旁，说：“这不是刘珍林吗？你就免了吧！坐到那边去。”

“尽管我已成了心狠手辣的魔鬼，但跟刘很熟悉，要把他活活刺死，多少还有些于心不忍。”被松绑的刘珍林，跑过去和妻子拥抱在一起，两人蹲在那儿抽泣着。

曾田教官命令将另外一人蒙上眼睛，站着绑在桩子上。这个男子有一张棱角分明、白白净净的脸，透着知识分子的气质，早已坦然面对死亡。曾田教官集合新兵训话：“不会杀人，就不配当日本兵！敢刺杀活靶子的人，排成一列纵队！”有些人争先恐后地排上来，还有些人不敢站过来……。曾田发现有一个新兵总想往后排，像是要躲藏起来，立即命令：“向右转！”于是那个排在最末尾的新兵，一下子排到了最前头。下面的事儿全都交给了助理教员。助理教员下令：“刺杀！”那个新兵开始还有些犹豫，随后发出一阵尖叫，双手握紧刺刀，向中国人冲了上去。排在后面的新兵们也一个接着一个，向这个中国人猛刺过去。男人身上被刺成蜂窝，特别是肚子上已是血肉模糊，内脏外溢，早已气绝身亡。

训练大家刺杀活靶子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连根铲除他们的良心，增加他们的胆量。

曾田如此回顾当初实行刺杀训练的目的。

是半斤对八两吗？

1945年8月日本战败后，曾田被关押在前苏联的卡扎夫斯坦共和国内从事体力劳动。在苏联的五年间，既没有机会也没有时间去反省自己的罪行，与战争期间的认识根本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1950年7月，曾田被转送到抚顺战犯管理所。最初他满腹牢骚：“我不过是在日本军队，按一般军人的常识做了一些事儿，没做什么太坏的事儿。我只是一个小小军官，只不过是为了国家利益，奉命行事而已。为什么非要把我关进这个监狱？！”

1951年，中国各地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呼吁“坦白自我罪行，社会各阶层人皆可举报社会违法、贪污犯罪行为”、“只要积极诚实地交代罪行，无论多么重大的罪行，都可得到从宽处理”。通过学习，曾田想：“要是我也把自己的所有罪行都坦白出来的话，也许就能得到宽大处理。”决定不再隐瞒什么。于是做了一份自己出征以来的“履历表”，把想得起来的罪行尽量写了进去。并且，把自己犯下的众多罪行写成坦白书，当着全屋人的面念了起来：“我在某某地方杀了多少多少人”、“我在某某地方烧了多少多少间房子”……。同屋的人听了他的讲话，纷纷指出：“你的坦白只不过是罪行的罗列而已”、“根本没有考虑受害者的心情！”……对他进行了彻底批判。曾田这才明白：这种仅仅停留在表面上、“别有用心”的坦白，一下子就会被人们戳穿，露馅儿。

曾田直到来抚顺之前，根本没把中国人当人看，认为他们只不过是些人渣，因此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杀人有什么错。但是到了抚顺，在受到中国管教人员不是亲人胜似亲人般的照顾之后，他那种蔑视中国人的思想就一点一点地消退，甚至在不知不觉之中对他们产生了感激之情。曾田逐渐认识到：“我确实是干了坏事儿，实在是对不起中国人民！”一方面随着这种感情层面发生变化，另一方面经过学习，在理论层面上同时也发生着重大变化。通过学习列宁的《论帝国主义》、野吕荣太郎 的《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等著作，他开始重新审视那场所谓的“大东亚战争”（亚洲太平洋战争）的意义。通过上述学习，他开始意识到自己一直信奉的所谓“大东亚战争是圣战”的说法简直就是一派谎言，这场战争的本质乃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

由于上述感情和理论两个方面的“觉醒”，曾田找回了自己原本的人性，重新看到了真理的光明。于是对坦白书进行了数次修改和补充。他开始渐渐明白：真正的认罪和坦白，是“站在受害者的立场上，批判自己所犯下的罪行，对于自己的累累罪行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痛苦和悲伤，进行深刻反省。”但在抚顺期间，对此他还只不过是一个大概的理解而已。

1956年夏，曾田受到免于起诉的宽大处理，被释放回国。回国后不久，他就经常参加由原中队组织的“战友会”。他是想利用这些机会，对自己担任新兵教育的教官阶段，或是当小队长阶段，命令部下犯下滔天罪行，表示真诚的道歉。但每次聚会，大家总是热衷于谈论自己当年的英勇往事，根本缺乏反省的气氛，使他无法将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于是，他就通过寄送信件或资料，向个别容易沟通的战友传达自己的思想。曾田的一个老部下被他的这种热情所感动，认真总结了一下自己的罪行，以谢罪的心情写成一本小册子，分发给大家。就这样，曾田的思想慢慢地在战友中传播开来，曾田确信这才是自己终生的认罪学习。

曾田热情洋溢地大声疾呼。他说，下面这些话，无论如何都想告诫当今的日本人民：

即使在平时，杀人也是要判死刑的大罪呀！更何况当年日本在中国罪行滔天，罄竹难书，完全是一场用残酷的铁蹄肆意践踏他国领土的侵略战争，我们曾对过着和平生活的中国人，进行有组织而大规模的残酷屠杀。有人用“那是战争，没有法子”之类的话来推脱责任，但若是站在受害者立场上，能这么说吗？而且，就算你杀的是中国士兵，就能说“因为这是战争，所以责任应是半斤对八两”吗？我也是个农民，如果没有我们这些人践踏他们的家园，他们作为农民应会过着和平的生活吧。然而，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亲人被日军杀害，自己的家人被日军强奸，自己的粮食被日军掠夺一空，自己的房子被日军焚毁，才被迫放下铁锨，拿起了枪，跟我们进行战斗的啊。如果我们这么想，半斤对八两的诡辩就根本站不住脚！

**第三章 “一门心思想当军官……”（山本成美）**

我从爱媛县松山市近郊的高滨港乘坐渡轮，穿行在濑户内海的岛屿之间，大约45分钟后到达了终点——爱媛县中岛的大浦港。

山本（原姓三井）成美（81岁 ）面带微笑，前来迎接，他说：“欢迎你来到我们这个偏僻的农村！”大约四年前，山本的妻子因病去世，从那以后，他就一个人过日子。不过他女儿女婿就住在隔壁，各方面都可得到他们的照顾。

1956年夏，山本在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受到宽大处理，被免于起诉，立即释放。回国后，他就来到这个中岛，一直过着种植橘子的果农生活。“过去我一门心思想当军官，所以才会犯下那么多难以挽回的滔天罪行。可是回国后，我就不再梦想当个大官、出人头地了。而是想做一个普普通通的果农，做些从‘无’到‘有’的生产工作。”山本闭着眼，点着头，静静地对我说。

小兵卒子，多叫人瞧不起呀！

山本（原姓三井）于1920年7月，出生在位于濑户内海的大岛（山口县）的一个贫穷寺院，在五男三女的八个孩子中排行老小 ，并在那里度过了他的童年时期。从小父母就教育他们要注重礼节、信奉佛祖、慈悲为怀。对中国人和朝鲜人并没有多么蔑视的感情，但当时周围都在说：“我们日本多山，国土狭小，真是太穷了！在对过的大陆有一块辽阔的满洲。‘满蒙乃日本的生命线！’”。对于这些叫嚣声，他却毫不怀疑地加以接受。

山本从小就想当一名船员，小学六年毕业后，本来打算报考当地的商船学校，但因父亲的反对而未能如愿。于是就离开了家乡，前去投靠远在朝鲜大邱的大哥。在大邱上了普通高小两年，公立大邱师范学校五年。高小期间，朝鲜人占一成日本人占九成；到了师范学校则反过来，朝鲜人占九成日本人占一成，朝鲜人占据大多数。山本说：“那时候，我丝毫没有瞧不起朝鲜人的想法，相互间的交往也纯粹是人与人之间的正常相处。”但对于日本在朝鲜推行的殖民地政策，虽然也多少有些疑问，却没有进行过太多的思考，而是照旧信奉天皇，不断被灌输军国主义思想，逐渐坚信：“日本的皇军才是正义的！”

1940年3月，山本由大邱师范学校毕业后，直至11月，在朝鲜的一所小学给朝鲜学生教日语。他回首当年说：“当时的目的就是要培养和日本合作的朝鲜人，我教他们一些‘皇国臣民誓词’ 之类的东西。当时认为这样做既对他们有好处，也对日本有好处，并且对此深信不疑。可是现在想来，却觉得毛骨悚然！”

山本于11月底回到了日本内地的山口县，从12月1日开始接受为期三个月的新兵教育，快结束时报名参加了干部候补生考试。他之所以报考，是因为有三个哥哥都已当上了军官，亲戚当中也有不少人当上军官，自己则在师范学校的军训时期，渴望成为一名军官。“三个哥哥都已当上军官，如果我一个人还只不过当个小兵卒子，多叫人瞧不起呀！岂不被周围的人笑话？心中有着一种小资产阶级意识。这才是当时的思想根源！”山本回顾道。

“不要杀害不抵抗的人啊”

1941年3月，新兵教育结束后，山本来到了中国湖北省，分配到第39师团233联队第3大队第10中队。在荆门的联队本部，他接到了干部候补生考试已经合格的通知，到师团司令部所在地当阳接受了六个月的教育，以优异的成绩合格通过。同年10月1日，进入位于九州久留米的预备士官学校，1942年3月毕业，成为一名见习士官。4月被分配到湖北省古老背的同一联队第1大队第2小队当小队长，担负起周围的警戒任务，7月被任命为少尉军官。

在这个古老背，大约10月前后，山本接到中队长命令，出任新兵教育的教官，开始忙于各种准备。有一天，他接到大队长通知：“今晚要在长江边上进行‘试刀’（砍头），你先准备一下！”

当时心想，担心的事最终还是来了，那就走一步，看一步吧！内心既有些忐忑不安，又必须做好精神准备，可以说是喜忧参半吧。

半夜里接到中队长命令，于是山本带着日本刀，和卫兵一起走到长江边上。周围一片漆黑，河堤下面，江水滔滔流过。他们来到指定地点，往附近望去，看到地里长着一大片白菜。中队士兵大约有40~50人，围成一个马蹄形状，将今晚的“主角”山本少尉围住里面，只留下面向长江的那一面空着。大家坐在地上，或许因为就要进行非同寻常的表演，所以士兵们都鸦雀无声，屏住气息，一声不响地等着。山本追述说：“当时仿佛时间都已凝固，那种令人窒息的气氛，至今难以忘怀！”

“怎么样？我们开始吧。把人拉过来！”站在马蹄队形中央的中队长对部下发出了命令。这时大队本部情报班的士兵带过来一个男俘虏，中队长说：“我先来！”说罢将那个男人从田地的一边带到了河堤附近。那男人双手被反绑着，双眼被蒙住，值勤士兵让他跪在地下，脖子向前伸着。山本在距离四、五米的地方仔细地观看着这一切，心想：马上就该轮到自己了，要好好看看该怎么干。

中队长高高举起日本刀，“咳”地大喊一声，向下挥去。可是砍得不太准，只砍中了男子的后脑壳。中队长大发肝火，对部下吼道：“给我拉走！”被砍伤的男子被拽到江边。山本回顾当时的情景道：“因为四周一片漆黑，看不太清楚。但从声音判断，我估计是连长或别的士兵开了一枪，把尸体扔进了江里。因为我听到了一声枪响之后，好像有什么东西被扔进江里。”

随后中队长说：“再来一次！”第二个被拉过来的俘虏，脑袋被完整地砍了下来。

“看到刚才发生的一切，我心想：哎呀，这实在是太残忍了！不免心里有些害怕起来。”山本说。

中队长总算心满意足，对当时还姓三井的山本命令道：“三井少尉，这下该你了！”山本心想，终于轮到自己了，就答应了一声：“是！”说到这儿，山本闭上眼睛，回首当时情景，勉勉强强地挤出几句话：“那时，我心里真的很讨厌，可是已……。”

三井（山本）少尉来到被士兵们围成马蹄状队形的中间，这时已被拉来的第三个俘虏就在他眼前。由于天黑，从远处虽看不清楚，但走近一看，发现这是个30岁前后、中等身材的壮实汉子。他眼睛被蒙了起来、两手被反绑在背后，似乎已经完全绝望，丝毫没有反抗。值勤士兵粗暴地让他跪了下来，狠狠地把他的背往下按，使他的脖子向前伸。

山本稍微定了一下神，担心自己没有信心完全砍下这个男人的头颅。他想，要是不砍掉这颗脑袋，就能度过这个难堪的场面就好了……，但他知道那是绝对不允许的。就在这仅有的几十秒钟——最多也不过几分钟的时间内，山本的脑海里浮想起各种想法及缤纷往事。他首先想起刚当上见习士官，再度开赴中国战场时，父母亲和自己说过的话。

当僧侣的父亲说：“成美啊，一旦上了战场，说白了，也就是你死我活的残酷厮杀。有时为了保护自己，为了保护国家，少不了也要杀人。”母亲接着说：“成美，你好好听妈妈一句话。你可是个从小就吃老佛爷饭、在寺庙里长大的孩子，这一点千万不要忘记呀！今后你大概会遇到各种情况，但不管怎么说，绝对不要杀害那些手无寸铁、毫无抵抗的人呀！这样才算是有佛祖心肠。你可千万千万要遵守这一点！”山本答应母亲说：“明白了！”手提着军刀出征去了。

“那个时候，老母亲的面容啊……叮咛啊……哎，真是交错在一起，难受极了。……”回忆当年情景，山本拼命忍着热泪，满脸通红。

山本当上见习士官回到了战场，现在则作为一名少尉军官被中队的士兵围在里面，一举手一投足都受到大家的密切关注。他用眼角扫视了一下四周，虽然因为是深夜没法看清每个人的面孔，但从那数十双闪烁着光芒、往这边凝视的眼光中，就可完全察觉出来大家都在屏息静气、不声不响地注视着。山本想：“这些家伙在注意地看着我啊，他们心里一定是在想：山本少尉有足够大的胆量么？他能够成为我们这些士兵把自己生命相依托的指挥官么？。”这时他想：‘如果我干得不漂亮，就会羞愧终生！无论如何，一定得把它干好！”可实际上，在这么想的另一面，脑海里却也浮想起父母亲的面孔和声音，总在扰乱他的思维。可是事已至此，再也无法逃脱。他暗暗下定决心：“没有办法，在这个场合要是砍不好，得不到部下士兵的尊敬和信赖，那我这一辈子可就甭想再抬头了，还能有什么脸面呢？干脆唰地一刀砍下去，给他们做个好榜样吧！”

他先给那把日本军刀给洒了点水，心想：“可绝不能像中队长那样失败呀！给他一个毫无痛苦的超脱吧！”双手高高举起军刀，瞄准男人的脖子，憋足了力气，“啪”地挥舞下去。男人脑袋“噗”地一声滚落下来，喷着血沫子的身体“忽”地一下倒了下去。

那个时候，我的心情非常复杂，一方面觉得总算完事了，这下可放心了，另一方面内心也很后悔，觉得自己干了一件不可宽恕的事情。身心的疲惫仿佛一下子侵袭过来。

山本注意到周围的士兵们开始嘈杂起来。“他们会怎样评价我呀？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这是我首先关注的事情。说老实话，当时……我根本没有考虑那个被砍死的中国人如何如何。”山本低着头，拼命忍住泪水，努力地继续他的证言。当时，他根本不可能想到被自己杀害的人会有多么痛苦、多么愤怒！但对自己没能遵循母亲的教诲，却产生一种“后悔”的念头，并为此悔恨终生。他解剖自己说：“我想这可能是因为在我心灵深处，蔑视中国人和崇拜天皇制的思想依然根深蒂固的缘故吧！”

在山本之后，据说还有下士官继续用俘虏进行“试刀”，不过以后又杀了多少人则不太清楚。因为山本在现场，渐渐觉得有些恶心，于是就和别的军官提前离开了那里。

回国后边干农活边……

山本在此后的小队长、中队长时期，都曾担任过新兵教育的教官。但据他说，对于用中国俘虏进行刺杀活靶子训练，无论周围多大压力，他都坚决不予许可。因为他非常后悔，自己违背了对母亲发过的“那个誓言”。

日本战败后，已经升任中队长的山本中尉和部下一起在伪满洲国被苏联俘获，后被关押在卡扎夫斯坦共和国的卡拉干达，从事挖煤工作。直到1949年，苏联方面才开始对他们进行审讯，山本将自己的罪行一五一十地和盘托出。然而不久，周围其他士兵都相继回国了，只有他所带的原来那个中队的20多个新兵被留了下来。

原来，山本中队长因为执行任务，曾经离开过中队几个月。临出发前，他对中队干部严加命令：“新兵教育时，绝对不允许再进行刺杀活靶子训练！记住，这是命令！”但结果，在他离开的这段时间内，还是实行了刺杀活靶子训练。山本猜想：可能是其他老兵为了自己能够回国，作为交换条件而向苏联方面告了密，致使这些新兵被扣留下来，不得回国。山本对此感到愤慨，认为这只是自己作为长官的责任，于是欺骗苏联方面说：“当时我就在部队，绝对没有下达过刺杀活靶子的命令！”就这样，总算让自己手下的新兵们搭上了最后一班回日本的船。虽然只剩他自己被留在苏联，但当时能够把新兵们送回国，山本也就感到心满意足了。

1950年7月，山本被移送到中国的抚顺战犯管理所。他回首当时的情形说：

我当过中队长，已经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打算担负起作为军人的责任，无论枪毙还是其他处罚，我都甘心接受。当然，这并不说明我当时对自身的罪行有了多么深刻的认识。

此后，通过认罪学习活动，山本也开始深入地挖掘自己罪行的根源，并站在受害者及其家属的立场上，深深反省自己的罪行。

在抚顺期间的认罪，只能说明自己当时的认识高度。回国后对它已经不能满意，于是我就在这儿一边干农活，一边继续学习。

山本回首自己的一生，如是说。

采访结束后，山本陪我一块儿步行到大浦港。我登上了渡船，离开中岛，发现山本久久地伫立在码头上……。

**第四章 难忘老婆婆愤怒的目光（金井贞直）**

金井（原姓田村）贞直（家住千叶县，82岁 ）总是那么笑眯眯的，待人接物都显得和蔼可亲。也许你根本想象不到，就是他，在战后的西伯利亚及抚顺战犯管理所里，一直被称为“反动军官”。

比起那些平平庸庸的普通士兵，我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帝国陆军的军官要更了不起，这种想法确实强烈支配着我。……不过，在抚顺战犯管理所里，最终我深切认识到：与这些士兵相比，我才是个地地道道不折不扣的大坏蛋！

金井闭着眼，一句、一句地低声说道。

“要彻底大扫荡！”

金井（田村）于1919年1月出生在山梨县的甲府市郊。兄弟姐妹共有五男三女八人，可到金井成人时，上面的一个哥哥和两个姐姐都已夭折。家里虽然约有六反田地，但仅靠这些全家还是食不果腹，父亲只得到山沟里的农家买些木炭，运到甲府城里卖，以此换来些现金。据说他父亲还当过村议会的议员，“确实是位严父，总是说‘绝不允许做出有辱门庭的事！’对我们教育很严。母亲在结婚前曾做过小学教师，所以也特别严厉。”金井高小毕业后，按父亲的希望考入甲府的山梨县立农林学校。19岁毕业后，就职于东京的林业厅，同时还在中央大学上夜校。

1940年1月10日，金井20岁时在甲府应征入伍，仅仅一周后就被送往伪满洲国，在靠近苏联边境的神武屯接受了三个月的新兵教育。在那里报名参加干部候补生，四月底又返回内地，在甲府的联队接受了五个月左右的基础训练。后来进入盛冈的预备士官学校，于1941年4月毕业，成为一名见习士官。此后，在甲府的联队担任新兵教育的教官，不久晋升为少尉。

1942年6月，金井来到中国的山东省，担任第59师团第54旅团第110大队机关枪中队的小队长。在这里，主要是对莱芜县和章邱县的村庄进行“扫荡”。回首当年情形，金井说：“刚开始的时候，看见小孩子光着屁股在拼命逃跑，还觉得怪可怜的。但马上自己说服自己：反正中国人是劣等民族，就是应该被日本统治！”

在师团规模的作战中，师团经常下达命令；“要彻底大扫荡！”所谓“彻底大扫荡”，意即“彻底铲除一切，摧毁一切”，也就是说这时可以“随心所欲，胡作非为”。这其实和前述的“三光作战（杀光、抢光、烧光）”完全就是一回事。袭击村庄也好，无论往那里去也好，所到之处老百姓都已逃亡一空。在作战行动中，途经所谓的“敌性地区”的村庄时，经常命令部下原地“休息”。只要田村（金井）小队长（后升任大队长）下达命令：“原地休息两小时！”部下的士兵们就会欢呼雀跃，因为这就意味着他们可以随意掠夺财物，宰杀家畜，破坏房子，可以为非作歹，胡作非为。金井说：“所谓休息，就等于说你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吧！如果让他们‘休息’两个小时，那么这个村庄就会遭到彻底毁坏，好几年都缓不过气来。”

难忘老婆婆愤怒的眼光

这时犯下的一桩罪行，令金井终生难忘。那是1943年春展开的一次连续作战中，从莱芜县吐丝口镇通往鲁村的一座山谷里，有一个三、四十户、名叫白泉的小村庄 。得到那里藏有敌人的情报，田村（金井）机关枪中队三更半夜就爬到山上架好了机枪，做好掩护射击的准备。这次出动的并非是整个中队，只有其中的一个小队，外加一个分队参加。

拂晓时分，其他步兵中队的士兵们攻入村庄时，发现那里的敌人都已跑光，机关枪中队的二、三十多人随即闯进村里。步兵中队负责一半、机关枪中队负责另一半的扫荡。这时所谓的扫荡，虽说目的在于逮捕那些可能潜藏的八路军以及搜索武器，但士兵们却怀着个人的目的，那就是抢夺粮食、金钱和财物，以及掠夺猪羊鸡狗等家畜。村里早已是人去屋空，连个人影儿都没有。士兵们闯进屋子肆意抢夺，弄得到处鸡飞狗跳。然后他们用抢来的东西，开始做早饭。

田村（金井）中队长和警卫员、指挥班的四、五个战士，闯进一户人家，把桌子、椅子拿到院子里，然后点燃了一堆火，烤着抓来的家畜，在准备早饭。太阳已冉冉升起，早饭也快准备好。就在这时，发现其他中队扫荡的地方冒出了浓浓黑烟。大概已经抢夺完毕，士兵们开始放火。院子里的士兵们见别处起火，也都兴奋起来，喊道：“我们也来放把火吧！”虽然金井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可转眼一想，既然别的中队放了，自己的中队也不应落后，于是下达命令：“放火！”士兵们早已习惯，把墙边的高粱捆点燃，走到院子里的房子旁边。

就在这时，不知从院子里的什么地方，踉踉跄跄地跑过来一个六十多岁的缠足老婆婆。大概她刚才躲在院子的犄角旮旯里，一直在偷偷观察日军的动静。老婆婆个儿不高，长得颇为秀气，虽然头发已经花白，却梳理得整整齐齐，穿着一身染成蓝色的棉布衣裳。她双手合掌，走到金井身边，用中国话拼命地在哀求着什么。金井问翻译：“她在说些什么呢？”翻译告诉他：“到了春节，我儿子就要娶媳妇了。这个房子，给我们留下吧，千万不要烧掉！”

“这时，我想起了自己的老母亲，他和我母亲大概差不多年纪。”

金井往屋子门口一看，发现两扇门上都已贴有六十公分大小的红纸，上面写着两个大双喜字。旁边的门框上则分别贴着两张鸳鸯图样的剪纸。

老婆婆跪在地上，紧紧地抓住挂在金井腰上的军刀刀鞘，呜呜地痛哭，哀求道：“我只不过是个上了岁数的老百姓，求求你们就别烧这间房子吧！”金井觉得，作为堂堂的帝国陆军军官，自己的刀鞘竟让这么一个“劣等民族的中国臭老婆子”抓着，实在是有损自己的尊严。这时对母亲的联想早已抛到九霄云外，大吼一声：“滚开，你这个臭老婆子！”狠狠地往老婆婆的腰部揣了一脚。老婆婆被踢翻在地，仰面倒在那儿。他命令勤务兵：“喂！开枪！”勤务兵马上端好枪，对准老婆婆就是一枪。子弹打中了她的身子，老婆子滚倒到地上，用尽全身力气转过脸来，狠狠地瞪着金井。

老婆婆用那种凝聚了仇恨的眼光瞪着我时，我突然感到一种发自内心的恐惧。不过当时我并不明白，她为什么不去瞪着那个开枪的士兵，反倒紧紧地瞪着我。

老太婆扑通一声倒在地上，咽了气。金井命令部下：“喂！把她拖到一边去！”最后下令放了一把火，房子马上就被熊熊烈火包围。金井和手下的士兵们一边谈笑风生，一边大吃大喝，完全没把刚才的杀人放火当回事。那一天，整个村庄几乎全被烧毁了。

命令者的责任

后来，金井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坦白过程中，写了一首题为《木偶》的自由诗，其中对杀害老婆婆的过程描述道：

我高高在上，俯视着老婆婆，

这时，脑海里突然涌现出一丝念头：

“久经考验的这把名刀竟被玷污，多不吉利！”

于是夺过毛瑟枪，

对准老婆婆的太阳穴，

怒吼：“你就死吧！”

砰地一声响彻天空。

1945年日本战败后，金井被关押在西伯利亚约有五年时间，期间一直被称为“反动军官”。他对自己的罪行没有丝毫反省，一直充满着对苏联的憎恶之情。

1950年7月，在移往中国抚顺的列车中，吴浩然指导员用流畅的日语和蔼地对他说：“你在西伯利亚吃了不少苦，现已来到中国，就像回到自己家里那样，慢慢来吧！”金井听到这话，心里非常高兴，当时他心想：“对呀，正因为中国受过日本照顾，他才会这么说！这是因为我们日本建设大东亚共荣圈，推行五族共和的缘故吧!”

进入抚顺战犯管理所后的一段时间，金井尚未察觉到自己的这种错误认识。过了两年，同屋的人们开始出现学习热潮，后来认罪坦白运动逐渐高涨。然而对于这种运动，金井从不参加，只是在角落里一个人背对着大家，把叠好的被子当成桌子，独自翻看毛泽东的著作。他也不参加唱歌、跳舞、体育等一切文化活动。即便如此，中方也从不强制他参加，他们更多地注重他的自主性。与西伯利亚时期不同，这里没有集体批斗，因为中国方面绝不允许他们这样做。

现在想起来，我当时实在是有些奇怪。开始我觉得所里的日本军人都是些混蛋糊涂虫。但到了后来，渐渐地觉得自己一个人非常孤独，有些心虚。如果依旧被关在苏联，我想也不会有什么变化吧。

就这样，金井从“反动分子”，逐渐转变成“顽固分子”、“落后分子”。或者说表面上虽然看起来像“顽固分子”，但随着中国管教人员无微不至的关怀，他的心灵受到了震撼。加之通过个人学习，逐步认识到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性，开始反省自己犯下的罪行。对于杀害老婆婆一事，也表示衷心的道歉和忏悔。他开始认为：“这本是按我的命令干的，跟我自己开枪打死她没有什么区别”，于是在1955年5月所写的上述自由体诗《木偶人》中，描述成是自己亲手杀死的老婆婆。

当时我认为，比起下达命令的人来说，实际打死老太婆的人罪行更加深重。我想，光写“我下令……”，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认罪，而这一切全都责任在我，跟我自己亲手打死没什么两样，所以我就如此描写。

感情层面上的认罪意识，金井比以前有了显著的进步。除了这一个部分与事实稍有出入外，总体上来说，全诗基本上还是实事求地按事实描写的。

这时，吴浩然指导员向他建议：“在大家面前认罪，如何?”于是就在这个月，在大家集合的礼堂里，金井用了一个多小时，泪流满面地向大家讲述了自己的滔天罪行，以及对这些罪行的谢罪和反省。并对自己过去的态度表示了道歉。对于杀害老太婆一事，这时候他也说是自己打死的，主动承担起应有的责任。

自从那次在大家面前认罪以后，我就常常泪流不止，哭了好长时间。我终于明白，自己实在是对不起中国人民。我想，即便被被判刑，我也是罪有应得，是自己的应有下场！

金井回想当时情形，接着说：

当时的认罪态度仅限于此，认为下令杀死老婆婆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谢罪，只有下手开枪的人才最为可恶。对于老婆婆为何不盯着打死她的士兵，而是恶狠狠地瞪着下命令的我，当时根本不明白。现在我才深切地认识到：那充满仇恨的目光中，表达的正是中国人民的愤怒之情！

金井说，他自己并没有亲自下手杀害过中国人民。即使是当机关枪中队的小队长甚至中队长时，命令部下用机关枪扫射平民百姓，自己并没有直接开枪，因为他总是处于发布命令者的地位。

有时，所内其他人的坦白也使他重新认识自己的罪行。比如说，在自己当中队长时，大队送来两个中国俘虏，他曾经随意命令部下：“那就干掉吧！”于是那两个俘虏，就被新兵拿来当活靶子，在刺杀训练时给活活刺死。

金井于1956年8月被免于起诉，9月回到日本。此后他继续思考着自己作为命令者的责任。金井现在已经确信：

比起实际执行者来说，下达命令者的罪恶更为深重！

**第六部 他们为何会犯下如此滔天罪行？**

本书所述的“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中归联”）成员中，既有前日本陆军军官和士兵，也有军医和宪兵，他们都曾参加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犯下了滔天罪行，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

然而他们在出征之前，本性上绝对谈不上是一群穷凶极恶的大坏蛋。和其他大多数日本国民一样，他们都是些极为普通的“善良的皇国臣民”。只不过当时日本的国家本身并不“善良”，对国民灌输“先占朝鲜，再占中国！”的思想，并不断付诸武力，这在民主主义社会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对统治者方面而言，应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的事。但当时的日本政府却千方百计地愚弄百姓，使他们不能明辨是非，并反复用振奋精神的标语口号鼓动国民，极力强调国民主体精神的重要性，全国上下弥漫着一种“唯精神主义”的气氛。这样一来，整个社会便朝着反理智、反理性的方向上越滑越远，越陷越深。当然，有一部分人开始意识到这种错误思想的危险性，也进行了抵制，不过他们到底势单力薄，效果可谓杯水车薪，最终还是淹没在时代的滚滚潮流之中（参见第二部第一章）。

尽管如此，包括本书所介绍的日本老兵在内的大多数日本国民，在日本的传统农业社会中，都曾经拥有过一些极其普通的道德观念，如“不可杀人”、“不可偷人家财物”、“不可强奸妇女”等等。但是这些道德观念，并非是基于社会的民主化、成熟化的产物，相反大多数人一则惧怕这样做“会被警察逮捕”，而更多的是出于一种因袭性、情绪性的理由：惧怕这样做会“败坏家规，有辱门庭”，或会“被全体村民断绝往来，陷入孤立”。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会轻而易举地上当受骗，认为：“‘以天皇为中心的神国日本’统治作为劣等民族的朝鲜人和中国人，有什么不对！”并认为这样做不仅不会“有辱门庭”，反而是“光宗耀祖”的事，为此出征中国，犯下了滔天罪行。

而且，正如书中屡屡介绍的那样，在日本国内或在中国的新兵教育当中，通过对他们精神上、肉体上彻底地施加暴力，以达到“扼杀正常人的人格、良心、尊严，使之绝对服从长官命令”的目的。如此在日本军队中，已经不再存在什么人类的正义、理性、道理等普世价值。这些被送上战场的士兵，大多没有明确的大义名分，这种新兵教育也就必然导致侵略战争的恶果。他们都是从青少年时期开始，就在弥漫着蔑视东亚民族的风潮中，在以天皇为中心的军国主义、帝国主义思想飞扬跋扈的社会中成长的，后又经过新兵教育以及此后的军队生活中，渐渐地变成了一部丧失人性的“杀人机器”。这时，他们被禁止用“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判断，被彻底灌输“长官命令就是天皇命令”的思想并加以施行，因此犯下了累累的滔天罪行。此可谓典型的“洗脑”也！

那么为何又在上述教育下，日本军队会在中国犯下如此多的滔天罪行呢？关于这一点，著名的历史学家藤原彰教授曾就当时日本陆军的整体政策和方针做过准确的归纳，现引用如下：

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与此前近代日本所经历的战争有很大的不同。日清战争 、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三次战争中，天皇发表的宣战诏书都宣称要“遵守国际法规”，即遵循作为一个近代文明国家的惯例。然而，这次侵华战争，尽管它是最大规模的战争，却没有进行宣战，一直说什么这不是战争，只是一次“事变”。

直到日军侵略华北的战争已经白热化的1937年8月5日，在由日本陆军省向“支那派遣军”发出的《关于对本次事变有关交战法规适用之文件》的通告里，明确规定：“有关陆战法规惯例之条约及其他交战法规各条约之具体事项，悉遵循而行动，皆不适当”，并且指示不要使用“战利品、俘虏等名称”。这类所谓本次事变不适用国际法的通告，其后陆续下发到陆续派遣的各个侵华部队手中。而且，日本并未按照国际法的规定，设置俘虏关押所和俘虏信息局，实际上对于在战场上被俘的中国士兵，全部交由战场上的各个部队自由处置。这样做，最终导致大量俘虏被屠杀的恶劣后果 。

依据日本陆军省的上述方针，在中国的各战场上，“粮食在当地征用”、“俘虏不用带走”成为部队的大前提，从而使掠夺粮食和虐杀俘虏（包括一般的平民百姓）演变成常规化行动。甚至对于日本官兵本身，也绝不允许他们当俘虏，军队内部毫无基本人权可讲，更何况对于那些“劣等的中国人”的人权，更是无暇顾及。如此看来，正是日本陆军整体的这种非人道主义政策和方针，才是底下各个士兵对中国人民犯下累累罪行的根本原因。

以上情况是原因的一个方面，加之来自上级的“强制的一面”等因素，最终导致新兵的种种野蛮行为。不过，大多数场合原因似乎不仅于此。正如本书中屡屡述及，虽然具体情况因人而异，但有不少人为了受到上级重用、以便尽早飞黄腾达，为此欲望所驱使，显露出“个人积极主动的一面”。为了让来自这两方面的“压力”在自身内部找到心理平衡，往往有很多人就会搬出一些其他的所谓理由，如“就是因为你们这些中国人，才让我们来这里受苦受难！”、“你们这些劣等的中国人，不听皇军的话，惩罚你们是活该！”

过了两三年，随着这些新兵变成老兵，在上述日本陆军的根本政策和方针的打磨下，慢慢地“个人积极主动的一面”占据了上风，所占比重越来越大。正如本书中所述，造成野蛮罪行的思想根源五花八门，因人而异，诸如感觉麻木、逞强好胜、“不干白不干”的意识、消愁解闷、出人头地、为天皇国家尽忠尽孝……等等。虽然他们从小就接受过“要设身处地地替别人考虑”的教育，但深受民族歧视的流毒之害，便将中国人从这个“别人”之中排除在外，加之在军队的生活又渐渐使他们丧失了原有的人性。

另外，本书的第五部介绍了关于军官“试刀”（砍头）时的心态。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逞强好胜，故作卖弄，如“一定要给部下做个好榜样！”、“可不能让身边的老兵们小瞧了，让他们看看我的厉害！”等等。正像鹿田正夫（第一章）和曾田吉一（第二章）所做的证言那样，他们都被灌输了“只有砍过头，才算得上够格的军官！”之类的顽固思想，根本没有“站在受害者的立场”来考虑，孜孜追求的只是自身作为军官的自豪感。

如此看来，在当时的日本军队之中，更多地是重用那些胆量大、魄力大、逞强好胜的人，而轻视那些“用自己的头脑冷静地思考判断”的具有理性的人。这也可以说是作为侵略军队的一种必然吧！

这些老兵，在日本战败的5~7年后，分别被关押在中国的抚顺和太原的战犯管理所。在此需要提请各位注意的是，正如第一部所述，派遣到中国的大部分将士已于1946年6月之前回到日本，而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大多将士，只因为1945年战败时期，恰好驻扎在朝鲜北部或是伪满洲国境内，才最终沦为苏联的俘虏。这些宪兵也因为身在伪满洲国而被捕。再者，据“中归联”许多成员的证言，他们开始接受苏联方面审讯，大多是在1949年之后，当时并没有什么直接证据，主要依靠审讯官的个人判断，这些人就被人为地划分成“允许回国者”或“留在苏联者”。 另一方面，太原战犯管理所关押的日本老兵，也是因为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尚残留在山西省境内而被逮捕。由此可以看出，与其他日本陆军将士和宪兵们相比，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一定是犯下了比其他日本军人在二战期间所犯的更大的罪行，才被关押进战犯管理所的。也就是说，本书所介绍的这些日本老兵的罪行，并非属于特殊个案，而是二战期间全体日本人及日本社会所犯滔天罪行的缩影和体现。这里所说的“他们”，恰恰也可以说是我们每一个日本人本身。

如前所述，抚顺和太原战犯管理所进行的管理和教育，可谓世界史上罕见的历史性伟业。毋庸讳言，中国方面高度的政治现实主义思想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另一方面，它又是革命理想主义（同时也是现实主义）的真正体现——他们从抗日战争之前，就一直实行优待俘虏的政策及革命人道主义的政策。

通过在这两个战犯管理所中的生活和学习，大多日本老兵都能自觉地站到“受压迫者的立场”上，认识到日本侵华战争的非正义性，并且开始认真反省自己罪行的根源。因此，在战犯管理所进行的教育能够取得巨大成功，从某种意义来说也是一种必然的结果。多数老兵本来就具备“原本的人性”，只是被“以天皇为中心的日本军国主义”彻底洗了脑，因而，只要他们恢复到正常生活，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问题，了解世上的许多事实，他们就能够迅速恢复人性，认识到站在“受压迫者的立场”的必要性。这，或许可称之为“脱离洗脑”的过程吧！特别是当他们终于意识到，他们自身在日常社会中，以及后来在军队中，都一直处于“受压迫者的立场”，但不久却加入了日本军队的“压迫方面”，欺压同属 “受压迫方面”的中国人民，他们不禁感到愕然，大惊失色。

如上所述，抚顺和太原的战犯管理所实行的既非魔术，亦非催眠术，更不是什么洗脑，其结果也绝非偶然。这一切恰恰是因为推行了脱离洗脑的教育，其结果也是可想而知。有人批判说：“这就是洗脑！”但我想在此提请他们注意，究竟是在从前的日本军队里被训练成“毫无头脑”的杀人机器，还是在战犯管理所里改造成“用自己头脑”思考问题的人，哪一个更可称之为被‘洗脑’呢？

当然，在抚顺和太原的战犯管理所进行的认罪学习，只是他们迈出的第一步，而非真正意义上的认罪完成。在此的学习认罪活动只不过是他们回国后，进行终生真正认罪的基础演习。三尾丰也好（第四第一章），筱塚良雄（同第二章）也好，都是在进行终生认罪活动的过程中，认罪意识不断得以深化的。其他大多“中归联”的成员也提供证言说：“在战犯管理所时的认罪意识还处于初步阶段，那只不过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也有一些人像金子安次（第三部第三章）那样，在管理所期间的认罪学习未见成效，直到回到日本以后，认罪意识才逐步深化。由此看来，虽然我们可以充分评价战犯管理所教育的伟大实践，但也要注意不必过分地加以夸大美化。

对于这些终生继续认罪活动的日本老兵，笔者很难直接对他们说：“你们可真了不起啊，真伟大啊！”因为笔者觉得这样做似乎对他们太失礼。笔者清醒地认识到：对于那些真正悔恨自己罪行的人们来说，无论怎么认罪谢罪，都难以使他们的累累罪行“付之东流，一笔勾销”。笔者同时还认识到：即使他们拼命地将自己的罪行告诉下一代，努力不让后辈重蹈覆辙，也只是完成了他们所尽责任的一小部分而已。如果站在“被杀害、被压迫方”的立场上，他们犯下的滔天罪行，实在是“天理难容，不可饶恕” 的。不必说他们很了不起，毋宁说，对于那些参与过那场战争的大多数日本国民，我想追问一句：你们是否还有“尚未完成的任务”呢？

**原 书 后 记**

本书终于得以出版，笔者内心充满了喜悦和感激之情。在此我要特别向那些多次接受我采访，并耐心地一一作答的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中归联”）的各位成员表示深切的谢意！除了本书所提到的各位以外，我还采访了其他不少成员，得到他们的大力协助。但由于篇幅关系，他们的经历未能撰写成文，谨此表达我的深深歉意！然而各位所提供的证言，或多或少对本书的执笔都起了很大作用，我想这些采访素材今后也会大有裨益。

另外，2000年7月，我曾面向“中归联”的全体成员，做过一个问卷调查，并得到多数成员的回答。虽然书中未能详细加以介绍，但它对于本书的写作也是功不可没的，对此我深表感谢！

再者，“中归联”自1967年2月至1986年10月间，分裂成“中归联”和“中归联（正统）”两个组织，但本文在行文中并未加以区别，统称为“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中归联”)。

对于事物的认识和理解，多年以来承蒙牧野纪之先生谆谆教诲，先生是位哲学家，在深入研究黑格尔哲学的基础上，长期从事“生活之中的哲学”研究。另外，文中所述“受压迫（被杀害）方面的立场”、“压迫（杀人）方面的立场”等术语，多得益于著名记者本多胜一先生的著作，在此一并致以谢意！

本书不少章节曾刊载于《星期五周刊》，此次出版便是在当时拙稿的基础上，经过大量修改补充编辑而成（刊载期号及年月日附后）。在《星期五周刊》连载之际，承蒙编辑部的糟谷广一郎先生大力支持，谨此致以谢意！